

2024

武汉社会科学 (第2辑)
SOCIAL SCIENCES IN WUHAN

责任编辑/朱梦珍
封面设计/闻 风

总第32辑

武汉社会科学

总第32辑

2024
(第2辑)

武汉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WUHAN

总第32辑

主编◎樊志宏

- ★ 长江文化
规划“万里长江第一桥博物馆”，赋能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 傅才武 李越
- ★ 经济发展
新质生产力推动未来产业变革的实践逻辑 / 刘文富
- ★ 超大城市空间规划与治理
“AI大模型+政务”的现状、趋势与思考 / 孟庆国
- ★ 文化发展
物候传播：“叙事”视角下的跨物种传播探讨 / 王涛 陆锦华 薛嘉文
- ★ 法学研究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非版权性的法律思考 / 杨异 何琦
- ★ 党的建设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
——邓小平在武汉关于发展理论的思考探索和当代启示 / 熊俊潇



武汉出版社

武汉出版社

武汉 社会科学

2024

(第2辑)

SOCIAL SCIENCES IN WUHAN

总第32辑

编委会主任/吴天勇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田祚雄 朱哲学 刘水平 刘江涛 李春洋 吴天勇

汪涛 陈进 陈颖 陈雪松 周阳 袁超越

陶维兵 董实忠 樊志宏

主编/樊志宏

执行主编/周阳 陶秀丽 林丽 陈雯

版 武汉出版社

长江文化

- 1 规划“万里长江第一桥博物馆”，赋能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 傅才武 李越
- 6 长江流域农耕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 /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联合课题组
- 16 武汉诗路形成的路径、内涵与价值特征 / 赵煌

经济发展

- 24 新质生产力推动未来产业变革的实践逻辑 / 刘文富
- 35 以新质生产力重塑发展新优势，打造千亿商业航天产业集群 / 新洲区委政策研究室课题组
- 44 知识产权赋能武汉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 武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课题组
- 52 武汉网络直播发展现状及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 刘靖 陈强

超大城市空间规划与治理 (武汉市规划研究院合办)

- 60 “AI 大模型+政务”的现状、趋势与思考 / 孟庆国
- 64 武汉市第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回溯及启示 / 方可

文化发展

- 71 物候传播：“叙事”视角下的跨物种传播探讨 / 王溥 陆锦华 薛嘉文
- 81 元宇宙赋能下武汉城市文化数字博物馆设计路径研究 / 陈为铮 涂戈尔

CONTENTS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武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社会发展

- 89 Z世代大学生就业心态及其引导策略
——基于武汉部分高校的调查分析 / 邹梦瑶
- 97 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和压力来源研究
——基于武汉市六所中小学师生的调查分析 / 张玉

法学研究

- 107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非版权性的法律思考 / 杨异 何琦
- 118 《民法典》视域下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研究 / 胡可一

党的建设

- 127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
——邓小平在武汉关于发展理论的思考探索和当代启示 / 熊俊潇
- 136 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实践动因、困囿及进路
——K媒体田野调查带来的启示 / 杨轲

投稿邮箱: whshkx@163.com

“大江学术”微信公众号: WHASS_1983



规划“万里长江第一桥博物馆”， 赋能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傅才武 李越

摘要:武汉占“山”“水”之优势,成“江汉朝宗”之形胜,但长江文明的标志性符号——武汉长江大桥及其周边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新时代以来,武汉市围绕自身山水形胜特色,以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为机遇,启动新一轮文化营城实践,积极打造世界级长江文化体验区和世界黄金旅游区的“长江文明之心”。以武汉长江大桥为主体,以“贯古今、通南北、联东西”为理念,规划“万里长江第一桥博物馆”,打造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武汉段)旗舰项目,为丰富国家文化公园内涵提供了有益思路。这对于完善“长江文明之心”文旅融合功能、复兴“大武汉”文化、带动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弘扬长江文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关键词:武汉长江大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汉朝宗;文化营城

武汉市具有6000余年的文化史^①、4300年的筑城史^②和3500年的文明史^③,是国家中心城市之一、科教基地与综合交通枢纽、中部地区规模最大城市、长江经济带上的工业重镇、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在中国的地理版图、文化版图与经济版图中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衢之地理、厚重之人文、蓬勃之经济,成为推动武汉市创新发展的重要“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则成为其中的核心动力源。

城市文化软实力既是城市地理的、人文的与经济的正外部性得以释放的外在表征,更是城市文化战略、愿景与规划变为现实的结果。近年来,武汉市提出做足做好“长江”这篇大文章,努力打造“历史之城”“当代之城”“未来之城”,重点打造“长江文明之心”,建设世界级历史人文集聚展示区^④。特别是2022年以来,国家正式启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为武汉市文化腾飞与经济腾飞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由此,武汉市以地域文化助力城市发展的路径逐渐清晰,以“江汉朝宗”为城市文化脉络、以武汉长江大桥为核

① 武汉市博物馆:《洪山放鹰台遗址97年度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98年第3期。

② 刘辉、郭长江、张君、谢育新:《武汉市黄陂区张西湾新石器时代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8期。

③ 张昌平、孙卓:《盘龙城聚落布局研究》,《考古学报》2017年第4期。

④ 钟晟、李俊辰:《文化软实力视域下武汉长江文明主题文化战略建构》,《文化软实力研究》2022年第2期。

心、以“江汉关枢、长江文眼”为符号特征、以“贯古今、通南北、联东西”为总体理念的武汉文化营城实践逐渐变为现实。

一、“江汉朝宗”——武汉市的古今形胜

武汉是一座蕴含“山”“水”基因的城市,其地脉与文脉反映出城市与环境的总体关系:依山水而生——武昌与汉阳隔江对峙,傍山水而长——明、清武昌、汉阳与汉口三镇发展,环山水而兴——民国以后的大武汉形成^①。这里的“山”“水”是狭义的“自然山水”,在向广义的“文化山水”——“山水”“胜景”与“舆相”——扩展过程中,形成武汉市的古今形胜。

从“山水”角度看,武汉历史上的两座功能性城池——武昌城和汉阳城——分别依托长江南北两岸的蛇山和龟山而建,凭山御水,防洪与军事两便。长江与汉水相汇,加之后来汉口兴盛,武汉呈三镇鼎足之势,独得两江之便,居于长江文明传承发展的枢纽位置。史料记载“江汉朝宗于海”,书中把“江”“汉”描写为两位水神,描述他们见面后久仰东海海神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雅量,于是相约一同前往东海朝见。宋人王十朋有诗曰“江汉西来于此会,朝宗东去不须分”。长江和汉水的交汇,创造了“江汉朝宗”的壮丽奇观。

从“胜景”角度看,远古时代大禹疏江导汉,禹稷行宫、晴川阁、龙王庙凝聚了武汉千百年人水共生的历史与文化。起源于高山流水传说的知音文化作为武汉特有的文化资源,在汉阳有古琴台作为文化古迹见证。三国时期东吴鲁肃屯兵驻守龟山,在龟山留下了鲁肃墓等遗迹景观。以清代“同治楼”为原型,建成于1985年的黄鹤楼是武汉“胜景”中的杰出代表,是城市标志性建筑,因唐代诗人崔颢登楼所题《黄鹤楼》一诗而声名远播,享有“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天下江山第一楼”等美誉。

从“舆相”角度看,武汉处长江中游、江汉交汇之区,西接河湖纵横的江汉平原,东承大别山余脉,恰好位于中国山水地理格局的天元节点。在空间维度上,“江汉朝宗”是武汉乃至整个长江堪舆所得最优之处,具有打造成为代表长江文明的世界级景观核心的肌理。清末湖广总督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记载了1909年乘兵舰来访的英、美水师提督称赞武汉“龟蛇锁江”的地理形势:“游行几遍地球,水陆形势之佳,未有如兹地者,推为环球第一。”当时汉口、武昌与汉阳的三镇格局,正好隐喻了宏观上巴蜀文化区、荆楚文化区与皖赣文化区的衔接与过渡,成就了日后“大武汉”的文化气魄。

从现当代角度看,武昌红巷是留存武汉红色记忆的代表。位于武昌红巷13号的武汉革命博物馆,包括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武昌毛泽东旧居纪念馆、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陈潭秋烈士纪念馆和武昌起义门旧址等革命旧址。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在此过程中,武汉数次站在时代之巅,经受洗礼,锤炼品性,将革命基因深深植根于城市精神之中^②。在文化记忆保存与传承方面,武汉各类科技馆、传统技艺博物馆、建筑纪念馆、事件纪念馆等公共文化场馆,集中展示了武汉市的科技文化发展成果。“汉阳造”文化创意产业园、青山区“红房子”历史文化风貌街区成为武汉工业文化遗产创新改造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基地的典范。

长江文明所蕴含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包容精神、筚路蓝缕自强进取的开拓创新精神、舍生取

① 李长安、张玉芬:《武汉城市形成发展及人地关系演变》,《地质学报》2021年第3期。

② 王光艳:《历史视域下城市精神的演化研究——以武汉精神为例》,《文化软实力研究》2022年第1期。

义敢为人先的爱国奉献精神是凝练武汉城市价值的核心载体。新时代,复兴“大武汉”文化是传承城市价值的有效方式之一,这对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弘扬长江文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二、“江汉关枢、长江文眼”——武汉长江大桥的文化特性与符号象征

(一)武汉长江大桥的文化特性

武汉长江大桥是江汉“关枢”,是长江“文眼”。它坐落于长江与汉江交汇之处,既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建筑景观、科技景观、旅游景观,又是汇聚武汉城市历史、荆楚人文传统、长江文化记忆及长江国际旅游核心载体的多维文化空间,是湖北省乃至中国长江流域的代表性文化符号。长江大桥从显性的城市景观维度凸显地理“关枢”特征,从隐性的文化价值维度展现长江“文眼”属性,具备支撑起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旅产业形态与深厚文化内涵的有利条件。

从武汉城市空间格局看,武汉长江大桥作为城市长江主轴和山水人文绿轴的交叉点,在竖向轴线上,北向连接龟山、南岸咀,轴线穿越汉正街、中山大道江汉路历史风貌区,并向北延伸至盘龙城;南向连接蛇山—黄鹤楼片区、辛亥首义旧址片区、武昌古城片区,并向南辐射至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光谷片区;在横向轴线上,武汉长江大桥跨江而来,连接汉阳“江汉朝宗”核心区、武昌滨江文化景观带、汉口历史风貌区、青山—武钢工业片区、长江新区—阳逻港片区等。

从武汉城市历史格局看,百余年前,武汉迅速由一般城市转变为“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近代大都会,被誉为“东方芝加哥”,得益于湖广总督张之洞抓住清政府修建京汉铁路的历史性契机,迅速布局建设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和武昌“纱、布、丝、麻”四局等,极大地推进了武汉城市的近代化进程。武汉长江大桥串联着武汉的过去、当下与未来,它于中国长江流域人文地理格局中居于“天元”地位,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战略性标识之一。

(二)武汉长江大桥的符号象征

武汉长江大桥承载了国家记忆,是新中国的代表符号,是中国人“站起来”的标志性象征。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结束了中国长江干流上没有现代化桥梁的历史。武汉长江大桥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和“中国第一批工业遗产”,承载了新中国的国家记忆。

武汉长江大桥是中国外宣场景中和国家级传媒平台上出镜率最高与识别度最强的现代文化景观之一。新中国的现代化桥梁设计与建造技术从武汉长江大桥起步。20世纪60年代以来,长江上又修建了南京长江大桥、九江长江大桥、芜湖长江大桥等。进入新世纪,以港珠澳大桥、平潭海峡大桥、孟加拉帕德玛大桥、坦桑尼亚基甘博尼大桥等重大桥梁工程为代表,我国桥梁建筑事业跨越江河湖海,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武汉长江大桥与这些大桥一起成为新中国的国家名片。武汉长江大桥向全世界展现了新中国的气象与人民精神风貌,已经成为最能体现“生态长江”“文化长江”“经济长江”与“科技长江”的国家符号。

三、“贯古今、通南北、联东西”——规划“万里长江第一桥博物馆”

武汉市历史悠久,占“山”“水”之优势,成“江汉朝宗”之形胜。武汉长江大桥作为江汉“关枢”与长江“文眼”,不仅成为长江文明的标志性符号,更成为新中国的象征之一。但是受长江和汉江穿城而过的地理条件和武汉长江大桥交通优先的双重限制,本应成为世界级长江文化体验区和世界黄金旅游区的“长江文明之心”的潜力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武汉段长江的世界级影响力尚未充分展现。因此,应当抢抓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时代机遇,把“万里长江第一桥博物馆”作为构建武汉先行示范区的重点项目,优先予以论证规划建设。

(一)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时代机遇

2022年1月,国家正式启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这是长江流域各省人民的一件文化大事,标志着弘扬长江文化、赓续长江文明上升为国家战略。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课题团队提出,将武汉长江大桥改造成为“万里长江第一桥博物馆”(中国桥梁博物馆),打造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核心体验区和世界级长江文明传播高地,是构建新时代国家文化标识的重要举措,意义重大。

近年来,武汉市委市政府高标准规划“长江文明之心”,高水平建设“两江四岸”百里沿江生态文化长廊,同时提出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武汉先行示范区的战略构想,一定程度上为“万里长江第一桥博物馆”的规划建设准备了条件。

武汉长江大桥以“桥”点题,以“点”串线带面,形成江城武汉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是“长江文明之心”的文旅融合载体。“江汉交汇、三镇鼎立”既是武汉这座城市的内涵与结构特征,也是支撑长江文明向世界传播的超级地理媒介,还是全国和全世界游客体验长江文化的独有文化场景。武汉长江大桥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有条件成为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与“长江文明之心”文化高地的“点睛”之笔。“万里长江第一桥博物馆”(中国桥梁博物馆)将为全世界深入了解长江流域人文地理和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

(二)规划“万里长江第一桥博物馆”的具体策略

第一,应将筹建“万里长江第一桥博物馆”(中国桥梁博物馆)列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任务清单。围绕武汉长江大桥实施汉阳龟山与武昌蛇山周边的立体交通优化,研究规划武昌阅马场—汉阳琴台“以隧代桥”交通改造工程。通过规划过江下穿隧道替代业已运行60多年的大桥;恢复山体原貌,疏通蛇山两侧、龟山两侧、阅马场、武昌古城片区、琴台知音片区、汉正街片区道路微循环;在三环线外另行选址规划建设普客与货运列车绕城铁路专线。以“万里长江第一桥博物馆”(中国桥梁博物馆)为中心,步道环绕,整合汉正街和江汉路片区、南岸咀琴台片区、龟山电视塔、蛇山黄鹤楼及武昌古城阅马场片区、户部巷、昙华林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使地脉与文脉浑然一体,文化与旅游相济相融,推动建设武汉“两江四岸”复合型文化空间。

第二,将武汉长江大桥(公路桥部分)规划为“长江文化旅游体验区”,充分释放以“桥”为“轴”的文化空间属性。以汉阳南岸咀为圆心、3.5公里为半径的“两江四岸”,包括汉阳龟北琴台片区、武昌黄鹤楼阅马场

片区、武昌古城片区和汉口历史风貌片区等,借南北走向的长江主轴、东西走向的山水人文绿轴实现带状连通,构成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武汉段)中的“长江文明之心”文化高地。融合长江“水文化”和武汉地方特色文化,在大桥上规划建设画廊、书店、创意咖啡馆等公共文化消费空间,能够实现武汉三镇的长江文脉、文化体验与旅游景观的有机融合,构建现代复合型文旅休闲场景。借助“万里长江第一桥博物馆”(中国桥梁博物馆)的旅游辐射功能,“活化”长江主轴文化资源,释放“长江文明之心”的文化价值与旅游价值。

第三,实施“一主两副+主分馆一体化”的“长江国家博物馆群工程”,将已经建成的武汉“长江文明馆”和正在筹建中的“万里长江第一桥博物馆”等作为“长江国家博物馆”分馆,形成“一主两副”的武汉“长江国家博物馆”规划建设方案。武汉市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具有建设“多馆联动”展陈体系的独特优势,以水为“核”、以桥为“媒”能够更加完整呈现长江在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空间中“汇”与“通”的文化内涵,厚植长江文明的历史之基,形成长江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互文机构,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新地标。

四、基本结论

在长江经济带中,武汉市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敢为人先”的革命与创新精神,形成了“江汉朝宗”的宏大形胜气魄。武汉长江大桥有“万里长江第一桥”之美誉,成为彰显这种形胜气魄的“关枢”与“文眼”。它不仅是湖北省与武汉市地标性文化景观,更是中国人“站起来”的典型象征,是新中国的代表性符号。新时代,推动武汉长江大桥转型,以“贯古今、通南北、联东西”理念打造“万里长江第一桥博物馆”,为武汉市围绕自身的长江文化底蕴开展文化营城实践提供了思路。同时该项目将成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体系中的亮点与文化制高点,为赓续长江文明提供有益启示,为更好对外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提供了有益借鉴。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文化和旅游融合视野下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研究”(项目编号:21ZD04)。

作者简介:

傅才武,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文化政策;

李越,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空间治理。

(责任编辑:陶秀丽)

长江流域农耕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联合课题组

摘要:中华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和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与传播提供了独特的文化魅力。长江流域是中华农耕文化两大起源之一,为中华农耕文化提供了多样化选择,为中华文明赓续不绝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撑。为了促进长江流域农耕文化传承与创新,有必要规划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系列农耕文化园:通过整合农耕文化资源,激活农耕文化“基因”;通过构建农耕文化IP体系,凝练长江文化重要标识;通过打造“工农文旅研”融合品牌,促进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长江;农耕文化;传承;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长江流域是中华农耕文明育成的两大摇篮之一,是世界农耕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千百年来留下了大量的农耕文化遗产,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耕文化的记忆空间日益边缘化、破碎化,很多只能深藏于山高水远处、僻野乡村里、古道驿所旁、传说习俗中,部分甚至有“休眠、失活”的风险。

长江流域在水稻、茶、中药材、桑蚕、淡水鱼及蔬菜等的驯化和繁育过程中都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大力发掘农耕文化记忆片段,构建农耕文化IP体系,凝练长江文化重要标识,开发其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旅游价值、科教价值,有利于推动长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激发文化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为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①

一、研究综述

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基,胡泽学、付娟(2022)通过总结提炼中华农耕文明所具有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乡土民间性等基本特征,认为中华农耕文化的基本特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深

^① 樊志宏、傅才武:《武汉应为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作先行探索》,《长江日报》2022年1月6日第6版。

刻影响。^① 崔唐凯、李波(2022)通过调研发现,在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优秀农耕文化面临着传承主体流失、话语体系缺失、价值认同危机的生存困境。^② 潘雨晨(2022)认为我国农耕文化灿烂辉煌、源远流长,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当前农业现代化发展正全面推进,保护传承农耕文化有利于总结现代农业发展经验、促进农业生产增收、保障粮食安全、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际认同感。^③

农耕文化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王艳(2022)提出应该通过发掘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农耕文化理念、拓展农耕文化产业链条,创新乡村振兴新模式。^④ 包滢晖等(2022)提出要从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三方面传承农耕文化的路径。^⑤ 曹志政(2022)提出要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助力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和价值弘扬,让农耕文化赋能乡村振兴。^⑥ 郑斌、罗祖俊(2014)认为既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提升农业,也要保护农耕文化遗产,将传统农业知识与经验系统地整理出来,为今后农业文明发展提供参考。^⑦ 戴君虎等(2021)认为利用物候学规律和理论可帮助揭示物候旅游资源的时空变化特征及与气候因子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提高区域旅游资源评价环节的科学性、丰富旅游产品的内涵,从而促进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⑧

长江流域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赵耀、陈家宽(2018)梳理了起源于长江流域的农作物资料,分析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植物遗存信息,发现长江流域农耕文明以稻作农业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先民们同时还驯化了大量果树和水生蔬菜。^⑨ 邓先瑞(2002)认为长江流域温暖多雨的气候条件和优良生态环境,使得这里成为以种植水稻为主的水田农业区,魏晋以后中国农业经济的中心逐渐从黄河下游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长江流域成为朝廷和军需粮食及布帛的主要供应地。^⑩ 黄国勤(2021)认为长江流域稻作农业文化遗产是我国乃至全世界重要的农耕文化遗产,要实现稻作农业文化遗产的世代相传和永续发展,应该采取提高认识、增加投入、加强研发、开展合作、严格保护和严加管理等积极措施。^⑪ 朱志平、王思明(2021)认为在当下将农耕文化遗产研究与乡村发展路径的探索联系起来,方有意义,要古为今用助推农业生产的结构转换、精神重塑唤醒遗产地居民文化认同、价值协调构建乡村振兴的内生机制。^⑫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农耕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至今留下了许多成体系的农耕物候遗产,近些年来,全国各地都逐渐认识到农耕文化传承保护的重要性,都开始挖掘、修复和保

① 胡泽学、付娟:《论中华农耕文化的特质决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古今农业》2022年第2期。

② 崔唐凯、李波:《中华优秀农耕文化的当代价值、生存困境与传承策略》,《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

③ 潘雨晨:《浅析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耕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价值》,《中国农技推广》2022年第8期。

④ 王艳:《传统农耕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分析》,《北方经济》2022年第5期。

⑤ 包滢晖、陈晨、伍国勇:《乡村振兴背景下农耕文化的传承路径》,《教育文化论坛》2022年第3期。

⑥ 曹志政:《新媒体语境下农耕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探析》,《全媒体探索》2022年第4期。

⑦ 郑斌、罗祖俊:《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农业的发展——屈家岭遗址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价值评估》,《中国农学通报》2014年增刊。

⑧ 戴君虎、高新月、刘浩龙、陶泽兴、马翔、曹丽娟:《物候学在旅游地理理论与实践中的应用基础和前景》,《中国生态旅游》2021年第2期。

⑨ 赵耀、陈家宽:《长江流域农作物起源及其与生物多样性特征的关联》,《生物多样性》2018年第4期。

⑩ 邓先瑞:《长江农业文化的自然生态条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4期。

⑪ 黄国勤:《长江经济带稻作农业文化遗产的现状与价值》,《农业现代化研究》2021年第1期。

⑫ 朱志平、王思明:《价值挖掘与路径选择:长三角地区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与利用研究》,《中国农史》2021年第6期。

护农耕文化记忆空间。规划建设长江流域农耕物候文化系列公园,有利于保护农耕物候文化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打造若干农耕文化线路,推动农耕文化焕发现代化的新活力,为中华民族、为人类社会留住农耕文明历史记忆传承,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提供农耕文化的新贡献。

二、中华农耕文化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在古代漫长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人民在完善农业技术的同时,还围绕农业生产活动产生了内涵丰富、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

(一)中华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

农耕文化是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形成的文化综合体,不仅包含农业技术,更广泛地涵盖了与劳动人民生活相关的社会形态、礼仪习俗、信仰崇拜、民间文艺、物候历法等各个方面,并与儒学和宗教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哲学思想和道德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

农业生产和农耕文化不仅是国家经济和民众生存的基础,更为中华文化提供丰富的滋养。中国传统农业形成“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朴素观念,其核心要义就是认识自然顺应自然爱护自然、因时因地因物制宜、遵守准则规范秩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些观念对中华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因为古代的农业基本“靠天吃饭”,人们面对大自然心存敬畏,所以农耕文化形成的古代哲学思想强调“天人合一”,在此基础上形成核心的“仁爱”思想、“和合”思想,“仁爱”思想“泛爱万物”,包含“爱天、爱地、爱人”,即热爱自然、热爱土地、热爱民众,“和”包含了“和谐、和平、祥和”,“合”包含了“结合、融合、合作”,以此为基础,孕育出中华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很多学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天人合一”思想。游牧文化逐水草而居,其文化源头是“征服”,很难产生这种基于“仁爱”的思想。

(二)中华农耕文化内在特质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征

中华文化是原生文化,也是早熟的文化,其根基在于农耕文化。很多考古资料证明,大约在1万年以前,中华大地上就有人类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发明并使用了各种天然材质的生产工具,驯化并种植作物、饲养动物。1万多年的中华农耕史,使得农业史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三大农业起源中心。本土起源的农耕文化决定了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早的几大原生文化(文明)之一,既不是后生文化,也不是舶来文化。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连续几千年不间断的文化,其决定因素是绵延不绝的农耕文化。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组织结构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结合儒学思想形成“耕读传家”的传统,由此形成家族化、宗族化的稳定乡土社会结构体系,不管是王朝更替,还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基层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虽然受到

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从未崩溃,一直延续下来,以此为根基的中华文化历经战乱与分裂的洗礼,不仅没有间断,反而不断升华。

中华文化具有独立自主发展和兼收并蓄的特点,这种特质深受中华农耕文化的影响。中国独特的半封闭地理环境造成中华农耕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之前,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中心的文化交流较少,在坚持和保留文化传统方面,比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更加坚决;但中华农耕文化一直在求新、求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引进大量作物,外来作物不仅改变了农业生产,也深深影响了生活,原有的文化习俗中逐渐产生了许多新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现象,也融合了多个民族、多个区域的优秀文化,中华农耕文化的多元性,同时也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三)中华农耕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基础性思想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与中华农耕文化“以民为本、富足社会、耕读传家、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①②}

“以民为本”的思想起源于先秦诸子百家,儒家的孟子为集大成者,将“爱民保民”作为君主的道德修养和政治原则,由此形成系统的“仁政”思想,农耕时代的“民”主要是农民,“以民为本”就是要解决广大农民的疾苦。

古代先贤在试图解决民生疾苦的时候,也考虑到建立富足社会,其实质就是构建全民富足的“小康社会”,追求“天下共富”的美好愿景。

“耕读传家”历来被中国传统家族所重视,是古代农业农村发展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通过耕作获得衣食以立性命,通过读书修身养性充实精神世界。

农耕时代的古代哲学强调“天人合一”,其实质还是“敬天、畏天”,认为天地运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能心存敬畏,人类活动必须顺应自然、遵循自然的规律,由此提倡天地人的和谐关系。

中国自古就有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思想,古代先哲们通过对天地自然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作大量观察和探索,逐步形成“和而不同”的观念,人与人、国与国、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可以客观地承认有不同之处,但是可以“求同存异”地将不同的事物有机整合为一体。^③

三、长江流域农耕文化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长江流域是世界稻作文明的起源地,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在中华文明史和世界稻作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稻作农业为长江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促进了中华文明的长久繁荣和持续发展。

① 潘丽嵩、范晓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传统文化底蕴研究——在“两个结合”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② 宋才发:《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逻辑、丰富内涵与世界意义——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党政研究》2022年第6期。

③ 韩保江、李志斌:《中国式现代化:特征、挑战与路径》,《管理世界》2022年第11期。

（一）长江流域是中华农耕文化两大起源之一

农耕文明的诞生与发展是人类依赖环境、适应环境并逐渐改造环境的渐进过程,尽管农耕文明的萌芽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出现,但真正发展成为成熟的农耕文明并对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屈指可数。这些文明一般位于北纬20°至北纬40°之间的大河流域,如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两河流域)、埃及(尼罗河流域)、印度(印度河流域)和中国(长江黄河流域),后世称之为“大河文明”。这些大河流域光照充足、土壤肥沃,再加上河流的冲刷,地势平坦,适合作物生长,独特的自然环境为人类农耕文明创造了良好条件。

根据已发现的考古遗址分析,长江流域很早以前就出现了“水田”稻作农业,如澧县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出土了约8000年前的水稻,还发现了古老的稻田。目前,全国考古发现早于8000年的水稻农业遗址共有16处,其中14处遗址位于长江流域。^①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并非一蹴而就,早期是以渔猎采撷为主,随着人口增加、生产工具的改良,人们尝试驯化野生的植物和动物,经过长达数千年的发展,逐步过渡到以种植为主、渔猎采撷为辅的农耕文明时代。^②

（二）长江流域农耕文化为中华文明发展路径提供了多样化选择

长江稻作文化与黄河粟(麦)作文化分隔南北,差异互补,形成了“(长)江(黄)河互济”的稳定性格局,构建了同一文化系统的内部大循环,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纠偏功能。

人类四大文明发源地,唯有中华文明是“二元文化”结构,北方以黄河文化为标识,南方以长江文化为表率。^③从文化起源看,长江流域稻作文化与黄河流域粟(麦)作文化差不多是同一时期,但传说中的中华民族先祖“三皇五帝”大都诞生和活动 in 黄河流域,其嫡系子孙也繁衍于此,而长江流域活动的人类,是中华先祖的后世支脉和一些少数民族,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儒家文化,也产生于黄河流域。从文化特点看,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是以农耕文化为主体,但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吸收了游牧文化的重要成分,而长江流域的农耕文化是从渔猎采撷发展而来,其农耕文化中有大量渔猎文化的元素。^④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是两条自西向东的平行经济带,两者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更多的是互助,特别是自秦代建立大一统的王朝之后,两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互动互补。如黄河流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侵扰时,长江流域的各种战略资源就会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输送,提升战争能力,扩大战略纵深;当一方发生天灾时,政府就会从另一方调集资源进行援助赈灾,民众也会自发从灾区迁徙到平安地区;如果一方的发展出现问题,文明走向岔道,也有另一方进行对照,成为避风港和蓄水池,不至于文明全体断绝。

（三）长江流域农耕文化为中华文明赓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撑

在新石器时期,长江流域的人类驯化了品种多样的野生动植物,如稻米、茶叶、水牛、猪、狗、吐丝蚕、

① 傅才武:《长江:稻作文明与鱼米之乡》,《光明日报》2022年12月28日第11版。

② 向安强:《长江中游史前稻作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江汉考古》1995年第4期。

③ 郑敬东:《长江——人类文明的摇篮》,《职大学刊》1998年第1期。

④ 王进:《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之比较》,《社会科学动态》1997年第11期。

中药材,以及草鱼、鲢鱼、鳙鱼、青鱼等水生动物和菱角、芡实、茭白等水生植物。^①在稻作农业发展成型之后,长江流域的畜牧业和纺织业开始出现并逐渐繁荣,这从年代较晚的农业遗迹中出现驯化兽骨和石制纺织器械得到证实。

在中华文化发展早期,长江流域很多地方没有充分开发,到秦汉大一统时期,长江流域发展加快,最主要的作物水稻逐步传播推广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但两广、云、贵、闽等地开发程度仍然不高。直到隋唐之际长江流域才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唐朝中期以后,黄河流域战乱频繁,不少地区萧条衰败至“千里无人烟”,很多士大夫及民众逃往江南避祸,稻作区在整个长江流域全面铺开,南方的水稻生产赶上并超过北方的粟麦,从此,长江流域就开始取代黄河流域成为国家最重要的人口集聚和社会生产场所。

相较其他主粮,长江流域的水稻单位产量高、营养价值丰富、容易消化,所以稻作农业更容易推广。随着稻作区不断向南延伸扩展,甚至漂洋过海,茶叶、丝绸、药材等随后也传播出去,长江流域农耕文化以这些物品为载体不断向周边辐射,影响了整个中华地区,还对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②

四、建设长江流域农耕文化园的意义重大

建设长江流域农耕文化园是传承创新长江农耕文化的有效途径。本质上是在发掘、整理和保护长江流域中华文明的“基因库”,并在适当情况下激活这些文明“基因”,使之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创造新的价值,更好地传承弘扬长江文化,促进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

(一) 传承弘扬长江文化

长江流域农耕文化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演进历程中留下了成体系的记忆空间,它们所浓缩形成的人类文明基因长片段,已经作为基础性部分深深植入了人类文明生命体中。建设长江流域农耕文化园,能够有效发掘和整理这些农耕文化的基因片段,并通过现代技术加强保护,使之传承下去,并不断发扬光大。对于长江流域农耕文化的保护,就是保护文化生态多态性,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导致的概率风险的有效战略措施。

长江流域农耕文化是一个具有集体互助观念,追求和谐、道德与社会责任感的文化,与“共享价值”的创造具有天然的契合度。在大河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长江流域农耕文化的价值也在不断演变,在保留与传承勤劳、人与自然和谐、遵从集体秩序以及重视子女教育等积极特质的同时,通过建立新的价值取向,以“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内化个体行为,有助于创造面向智能社会的“共享价值”。重新审视农耕文化的现实意义及发展方向,赋予其新时代的新内涵,有利于在新的发展条件下我国新的文明形态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二) 促进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是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并联发展,由此为高质量发展提供

① 刘雅丹:《说说长江渔文化》,《中国水产》2022年第11期。

② 公婷婷:《中国水稻起源、驯化及传播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2017,第50—68页。

动能,但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农业农村发展,而是要同步实现城镇化与农业农村一体现代化。^① 农耕文化为农业农村农民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历史底蕴支撑。通过优秀农耕文化的现代化,将人文地理、遗产保护、创新驱动、产业发展、文化旅游等相关的发展主题融合在一起,探索出新时代农耕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新技术、新模式、新路径,有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精神世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②

农耕文化蕴含的生产经验、传统技术,至今对现代农业发展仍然具有积极借鉴意义。一些“农遗良品”,是打造地域产业品牌、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资源。

传统的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格局及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背景,使得农耕活动需要与自然高度配合,高度重视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促成了人与自然之间必然建立的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继而衍生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农耕文化的重要特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出“天人合一”的思想,渗透着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类型。农耕文化中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生产生活范式,能够有效带动绿色产业发展,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促进城镇绿色可持续发展。

农耕文化与面向智能经济的绿色发展方向具有一致性。未来的经济将越来越重视绿色增长,这就要求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实现低碳、绿色生态化发展,要以智能化技术创造低碳、绿色发展的技术支撑和更有效的手段,打造以环境友好型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技术为特征的未来绿色产业。

根植于乡土社会的农业生产系统,几千年来不仅为人类繁衍提供食物供给,还形成了诸多历史文化和景观,极大地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形成一系列农耕文化IP,这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要素,能够丰富人民群众精神世界。

农耕文化在塑造中华文明和社会生活习俗中发生的作用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铭刻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根基和社会内聚力之所在。农耕文化形成的公序良俗,有利于推动全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增强文化自信、历史自信,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民族自豪感。

由农耕文化衍生出来的“天人合一”“和合共生”哲学思想,有利于整体展示中华文明的“文化底色”,体现“中国范式”,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全球和平与发展。

五、建设长江流域农耕文化园的策略建议

农耕文化目前是一些零散的、庞杂的记忆空间,这些文明的“基因”不少都在“沉睡”中。应该通过建设系列主题公园、物产公园、品牌记忆园、农耕物候展览场馆和研究机构,激活这些优秀“基因”,开发其时代价值。^③

(一)建设农耕物候人文地理主题公园

长江流域独特的人文、地理、气候等条件,使得人类农耕活动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因而也形成了诸

① 胡鞍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征和意义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② 耿鹏鹏、罗必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建设农业强国——从产品生产到社会福利的发展模式转换》,《南方经济》2023年第1期。

③ 范玉刚:《以文化价值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赋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3月20日第4版。

多独具特色的农耕文化景观和物候现象,如长江三峡生物多样性、湖泊和湿地、高原农耕、特色民居、宗教农业等。根据这些特色选定有代表性的民间传说、历史典故、地形地貌、山川河流、气候条件等,规划建设相应的主题公园,以“农耕剧场”等形式将物候现象和农耕文明有机融合为一体,留下一批代表长江文化的珍贵记忆符号。

如三峡垂直海拔物候公园。长江三峡地区是我国中部低山向西南高山和青藏高原过渡的地带,土壤有明显的垂直分布,自下而上分别为山地黄壤、山地黄棕壤、山地棕壤,且温度、湿度也随海拔的变化而不同,不同海拔梯度分布的植被和活动的动物都各具特点,形成物种丰富度随海拔梯度变化的生物多样性垂直格局。^①如有的峡谷地带海拔高差近2000米,虽地处亚热带,但随着海拔不断上升,气候垂直差异明显,山脚主要分布着亚热带常绿植物,山腰出现落叶阔叶林向寒温带针叶林的过渡带,山顶则主要是寒温带植物,不同海拔梯度的动物也呈现出类似的分布,可以说,这些地方同时存在着不同纬度才有的动植物。根据这些特点,选择典型峡谷地带建设物候公园,海拔间隔200米或500米建设若干物候生态点,种植标识性作物,展现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地理格局。

如湿地农耕物候公园。我们在建设湿地公园并大力开展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同时,还应该留下湿地曾经滋养人类的农耕物候记忆,建设若干农耕物候场景公园,展示候鸟、江豚、中华鲟、猿猴等物种的生存环境,展示先辈们进行农耕种植、渔猎取薪等生产生活的场景。

如乡村民居主题园。乡村民居集中展示了前人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些保存完好的传统民居反映了特定区域内不同时期的社会制度、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各地建设农耕文化园的过程中,要尽量保护其历史身份、文化特征、地域特色,激活乡村民居的文化“基因”,实现适应性保护和价值的传递。展现乡村民居主题,要兼顾保护历史原貌和提升生活品质,兼顾更新保护和生态宜居,兼顾传承文化和创造经济效益。

(二)打造农耕物候物产公园

精选起源于长江流域的作物,以县域为单位,策划物种文化项目,开发经济、生态、文化价值,纳入乡村振兴项目库,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形成可持续、可推广的运营模式。如稻、茶、药、丝、麻、鱼、水生植物等,整理完善这些作物与相关名人(神农、嫫祖、陆羽、李时珍等)的典故,与武汉国家农创中心合作攻关改良种子(种苗),园区集成种植、养殖、加工、科研、互动体验、观光旅游等多种功能,放大经济、生态、文化、科教效应。

如传说中炎帝神农开启了璀璨的农耕文明,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随州境内的桐柏山下,现今保存着远古岩画以及其他历史遗迹,要保存好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围绕炎帝神农这个IP,打造一系列品牌景区和产业园区,如体现人类新石器活动时期原始部落景区、展示农耕起源的体验式田园景区、体现神农发明渔猎的养殖体验区、农耕文化“非遗”博物馆、体现中华道教与炎帝神农文化一脉相承的宗教景区等。

(三)建造地域特色产业品牌记忆园

围绕主题和功能筛选长江流域的标识性产品,突出生态学、乡土品牌产业链、原产地和业态,通过与

^① 李巧燕:《三峡库区物种多样性垂直分布格局》,硕士学位论文,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2013,第9—30页。

地理标志、物候标志认定相结合,给地域产业品牌赋予文化内涵,结合特色城镇、特色村庄的建设,形成综合性的地域特色产业品牌记忆园。^①

完善品牌发展政策和品牌保护机制,加强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保护。建立有特色的区域品牌产地市场,为地域品牌构建完善的信息网络、物流体系、产品推广和销售服务平台。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扶持优质产业品牌基地建设,放宽金融信贷政策。

(四)建设农耕文化博物馆

农耕文化博物馆是传承发扬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征集保存大量农耕文化遗产,在开展研究的同时还可向社会大众提供科普宣传、教育实践、藏品展示等一系列服务。目前我国农耕文化博物馆在东部地区建立较多,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少,且大部分农耕文化博物馆规模较小。

长江流域农耕物候文化遗产丰富、类型多种多样、传承悠久、功能价值独特、影响辐射全国,通过建设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的农耕文化博物馆,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掘与保护农耕文化遗产,聚合形成农耕文明的“基因库”。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指导作用,主动加强与相关涉农企业、文化企业、高校院所、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联系,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创新完善农耕文化博物馆经营管理模式。

博物馆的形式不仅仅局限于场馆,要以传统农耕文化精髓,赋予实体空间深厚底蕴,可结合山、河、田、林等自然条件,遵循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和乡土化原则,集中展示语言、戏剧、民歌、风俗、祭祀、礼仪、政策、理论、宗教等的各类农耕文化元素,揭示农耕文明中“人”“物”“事”“技”的历史脉络、文化底蕴和功能原理,展出内容包括传承人、角色丛、乡土手工艺、传说故事、乡土标识、声色光景。还可深层次展示农耕文明认证体系,包括传承人认证、农耕空间认证、农耕馆藏创新传承体系认证、农耕居民认证。

(五)组建农耕文明研究机构

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但是,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国农耕文明缺少应有关注,既有的研究也多注重其原始性、落后性、保守性等等,未能深入发掘其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要组建农耕文明研究院或学院,传承与研究农耕文化。包括农耕职业技术学院、农耕手工艺传承体系、数字传承体系、导读导游与体验体系、从业人员培训等。组织一批相关研究人员和农耕文化爱好者,结合考古探索,分析农耕文化功能原理、历史底蕴、发展脉络和传承体系,创新发现农耕文化的时代价值,促进乡村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并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宣传推广活动,使最新研究成果迅速传播、广泛应用。

(六)建设线上农耕文化园

深入挖掘农耕文化的时代元素和艺术元素,开发文创产品,延伸周边产业链,以新科技新业态促进传

^① 朱哲学:《脱贫攻坚成效评估与接续乡村振兴研究——以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为例》,《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11期。

统农耕文化焕发生机活力。开发农耕文化周边产业,如相关影视、戏曲、民间艺术、手工技艺、动漫游戏、工艺美术、创意设计等,促进农耕文化产业鲜活发展。搭建农耕特色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创作与交流平台,为农耕文化感兴趣者提供一个活动内容丰富、交流畅通、体验便利的文化艺术空间。

建设线上农耕文化园,推进农耕文化数字化现代化产业化。运用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AI(人工智能)等技术,将有深刻农耕文化烙印的人际交往理念、风俗制度、文化教育、国家政策等文化内容,融入虚拟系统模型设计,形成以广大青年人群为主要受众的互动式虚拟展厅或网上展厅。将农耕文化遗产中的农业景观、物候现象、农耕技术、农耕藏品、文创产品等转化为数字藏品,实现永续保存和快速传播。运用电子商务、远程设计、互动体验等形式,推进农耕文化产品的设计、制作和销售。

基金项目:2022年度湖北省长江文化公园建设研究课题“荆楚农耕和物候文化园策划研究”(项目编号:HICYK222Y01)。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联合课题组成员:

朱哲学,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农村与生态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蒋天文,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樊志宏,武汉市社会科学院院长;

陈进,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政治与法学研究所负责人,副研究员;

曹莹,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农村与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

肖朝晖,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陶秀丽)

武汉诗路形成的路径、 内涵与价值特征

赵煌

摘要:诗路是城市文化资源的特有表现形式。武汉诗路的形成,既与优越的城市自然人文环境有关,也与城市商业功能密不可分。在这种背景下,武汉诗路集中展示为诗人行迹、城市生活和交通线路等内容,并形成了家国天下、珍视友谊、诗性审美的情感价值特征。应充分挖掘诗路文化价值内涵,彰显诗路中的诗歌意象和城市意境,打造诗性城市。

关键词:武汉;诗路;内涵;特质;意境

诗路文化是以历代诗词为主线所串联起来的文化带,是反映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变迁的重要视角。近年来,诗路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热点,特别是地域诗路文化研究成为关注的焦点。钟晟梳理了长江诗性文化生成过程,认为长江诗歌滋养出中国人特有的精神世界,这种诗性气质推动长江内化为中华文化的符号象征。^①李世忠、王梦旒考察了清代西域诗路,认为具有“创作题材的纪实性、创作趣味的好奇性及书写内容的系列化等突出特色”^②。卢盛江、李谟润认为初唐时期是浙东诗路发展的初级阶段,它的形成与初唐士风、政风及漫游之风的发展有关。^③罗时进认为开展清诗研究,应“重视清代诗人天下观、国家观、民族观的变化”^④。学者们从内涵、形成原因和对象等不同层面的考察推动了诗路文化研究的深入。武汉地区是诗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域。武汉地区山水风光秀丽,诗词文化底蕴深厚,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诗路文化具有地域性和独特文化性。本课题将从成因、内涵、特点以及传承创新的路径等方面对武汉诗路建设进行全方位剖析,以期为城市特色文化资源创新利用和打造武汉诗路提供借鉴。

① 钟晟:《长江:诗性文化与家国情怀》,《光明日报》2024年1月24日第11版。

② 李世忠、王梦旒:《清代西域诗路论略》,《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③ 卢盛江、李谟润:《初唐浙东诗路的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④ 罗时进:《清代诗歌的复杂性生成背景与可能性研究进路》,《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一、武汉诗路的形成

诗路是历史诗人们在特定活动空间下所形成的文化带,体现出自然景观、生活方式和人类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一种集合。以浙江诗路为例,它是基于江南自然山水和生产生活方式上的一种“江南独特山水关系的诗性景观与诗意生活的文化耦合”^①。武汉诗路的形成,既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也与文人活动有关。同时,城市商业、军事等功能特性也对诗路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自然地理、诗人活动和城市功能三者作用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武汉诗路。

(一)秀丽的自然景观是武汉诗路形成的地理因素

武汉城市山水相连、河湖相济,景色优美。城市美景吸引着诗人们纷纷留恋相聚于此,为诗人激发诗性灵感创造了条件。早在西周时期,汉水一带的楚地就是人们歌咏的对象。面对汉水的广阔和乔木的茂盛,人们诗兴大发,留下了《汉广》等佳作。春秋战国时期,屈原流放至武汉地区,面对龟山景色和汉水入江之势,也发出了“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的感慨。宋代,武汉山水就深受文人雅士们的喜爱。姜夔曾说“爱郎官大别山水,客居久之”。清代汉口得地理之便,更是吸引各地文人前往,每当停舟此处,无不流连忘返,直抒胸臆,正所谓“好景一过须记取,拟同儿女话灯前”。

除市内遍布山川美景外,就城市整体形势来说,也令人诗兴大发。武汉山水相依,烟雨缥缈的独特城市风貌,容易激发人们的乡愁和凭吊之情。通常人们喜欢“由土垠买舟溯湖而上,出桥口到小河,携酒乘凉,亦一快事”。如果在雨季,这种烟雨缥缈之感,更容易激起诗人的情感。文宾门在雨中渡汉江,面对“沙岸惟栖鹭,春城不放梅”的景色,亦有“有怀空击楫,怅望济川才”的感慨。

(二)城市特殊功能是武汉诗路形成的城市因素

武汉地区位于汉水和长江的交汇处,水运交通便利。借助便捷的城市交通,城市的商业功能和军事功能得以强化。长江水运推动了商品人员流通,促进了商路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诗路。同时,交通的便利也成为纷争之地,激发了人们的创作欲望和对时局的感慨,由此也推动了城市诗路的形成。

从城市商业功能来看,武汉诗路与城市商路融合共生。发达的商业贸易既带动了城市商路形成,也促进了武汉诗路的兴起。长江商路是城市诗路形成的重要载体,城市诗路也通过艺术化方式展现出城市商路的线性状态。一方面长江商路构成了城市诗路的重要空间载体。汉口长江水运的便利,吸引了商人们纷纷聚集于此。人们通过水运商路进入城市,并将沿途所见创作成诗歌,既通过诗歌方式展现出了商路,也为武汉诗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明清时期汉口呈现出“商贾毕集,帆樯满江”和“五方杂处,百艺俱全”的繁荣景象。发达的商业吸引着商人士贾来此经商生活。在旅途过程和日常生活当中,人们将所见所闻和日常生活体验通过诗歌形式表达出来。这种基于行走路线上创作的诗歌,形成了武汉特有的诗词之路。

另一方面,武汉诗路也影响着城市商路的形成。城市诗路的形成也与商人们热衷于作诗有关。清代

^① 施俊天:《江南诗性文化:浙江乡村建设的灵魂》,《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汉口居民主要由外地商人组成,正所谓“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实际上这些外地商贾、寓公都具有很高的文学造诣,“以文学科显者颇多”。盐商巴慰祖,不仅“为汉上盐鹺中第一”,而且“工隶书,兼善技勇”。这类客居群体中有关诗歌的技能最为突出。以安徽歙县商人为例,《汉口丛谈》记录了28位安徽歙县商人,擅长作诗的人员占到67.8%。其中,一名叫吴澹止的商人“客汉数十年,诗数千首”。事实上,商人们和诗的地点也会相对固定。在汉口,天都庵因人们聚会宴饮而出名,正所谓“景览天都客似云,宝林筵宴日纷纷”。除天都庵外,后湖茶馆也是人们消遣和吟诗的场所。《汉口丛谈》中就记录了范锴与好友黄承增等人经常在茶楼进行和诗。由于外地商人热衷吟诗,乾嘉时期武汉诗社呈繁盛之势。甲辰吟社、新雨联吟社等都是当时最为出名的诗社,其中新雨联吟社的吟诗活动“倡和极盛”。与此同时,社员们的作品也不断被刊印出来,如《淮上题襟集》《吴下朋笈小录》《大梁偶成倡和诗钞》等均已梓行。至1807年,作为集大成者,新雨联吟社的《新雨联吟》正式付梓,总共四十集,“亦极一时风雅”。人们在特定场所宴饮作诗,既推动该地成为诗路的标记之地,同时也借机联络感情,开展业务交流,推动该地成为城市商路的重要节点。

从军事功能来看,特殊的军事战略地位也是城市诗路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武汉地理位置特殊,历代均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三国之战、岳飞抗金、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在此地上演。处于交通枢纽位置的武汉,吸引着众多心忧天下的文人墨客聚集于此,而在时局动荡和风光秀丽的城市美景的冲击之下,难免会引起诗人们凭吊江山之感。正因为如此,从屈原的行吟泽畔,到岳飞驻守武昌七年抗金,再到晚清以来大量有关忧国忧民诗歌的出现,城市诗路不仅以历史时间线性方式沉淀生成,也奠定了家国天下的创作基调。

(三)独特的人文环境是武汉诗路形成的文化因素

武汉遍布大量人文建筑和名胜古迹,它们构成了文人们凭吊吟诵和郊游互动的空间,从而演化为诗路上的重要节点。这些名胜古迹中一类是人造名胜,其中以黄鹤楼最具代表。黄鹤楼因唐代崔颢题诗和历代诗人不断造访吟诵,推动着黄鹤楼诗性文化的沉淀,塑造着诗路上的重要文化标识。除名胜外,城中寺庙也是人们吟诗作赋的主要场所。寺庙不仅是宗教场所,还带有强烈的文化属性。王笛认为这种文化属性是与士人阶层密切相关的。通常生活在寺院中的僧人,“在文章、书法、诗歌和绘画等文化艺术的造诣上”^①往往很高。这些僧人在与士人阶层相互交往中吟诗作赋,加深了寺庙的文化属性。汉口的回龙寺历史悠久,黄阁曾在寺庙题诗描述其荒野僻静之状。而至嘉庆年间,该寺“已阡陌喧阗,无复秋山寒水之状矣”。寺庙环境变化引发了人们对世间变幻的感慨,激起了诗歌创作的欲望。有的寺庙僧人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他们与文人品评雅集,构成了城市诗歌的重要生成方式。范锴曾携好友毛燧传等人经常与宝树庵僧人“留饭香积,听琴试茗”,集体创作诗歌。这类雅集活动让寺庙成为诗路产生的重要标记之地。

第二类是具有人文景观的湖泊。一些湖泊风景优美,人文历史丰厚,也是文人歌咏相聚的场所。以清代武昌城为例,该城“其山则复岭,泽为巨浸”的山川地貌,塑造了当地士绅“深自养重,唯与亲戚话旧,山水娱情,鲜杂宾、他嗜”的习俗。正是在这种生活习俗浸染下,武昌城郊一带的湖泊隐秘文化盛行,众多

^① 王笛:《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全2册》,中信出版社,2022,第383页。

隐士聚集于此。如清代隐士胡从化跟从父亲“喜吟邵康节诗”。这些隐士以吟诗自乐,推动着武昌城周边的山水成为诗路重要的形成之地。

二、武汉诗路面貌

诗路因地域不同表现出内涵上的差异。如浙江诗路是一种“江南独特山水关系的诗性景观与诗意生活的文化耦合”^①。因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和创作群体的不同,武汉诗路展示出独特的文化面貌。武汉诗路由长江、汉水以及其他支流所组成的主要水系,龟山、蛇山、梅子山等山系以及古道、水陆驿站相互交织而成的诗歌文化路线图。这一文化路线图包含了历代诗人行迹、沿途山水景色、城市风貌、人文遗迹以及民俗等元素,是一种集城市景观、自然风光、诗意生活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路线。

(一) 武汉诗路是诗人的行迹路线

诗路的诞生与诗人行走歌咏息息相关。历代诗人在城市中访名山古寺、聚会交游以及赴任途中创作出了大量诗篇。这些诗篇不仅是诗路的重要载体和内容呈现,更是他们人生轨迹的真实反映。武汉诗路主要反映了诗人以下几种行迹。

一种是人生际遇的行迹。人生际遇的起伏,不仅对诗人们的心理造成冲击,也促使诗人在地理空间上不断迁移。诗人沿途创作诗歌。这些诗歌不仅为诗路的产生提供了基本元素,也为诗人行迹标注着较为准确的参考信息。如李白在流放夜郎途经武汉地区创作的大量诗歌,就是对其行迹的体现。

另一种则是诗人交游行迹。这类行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诗人们在武汉开展交友活动留下的行迹。诗人们在城市中结交,他们或一起前往特定场所聚会宴饮,或相邀游玩名山古寺,或在自家住所集体和诗。其间,他们创作的大量诗歌作品无不反映出活动的轨迹和交友的内容。清代的范锴在汉口期间就与众多旅汉寓公在后湖、白楼、汉江口以及怡园等地集会作诗,清晰描绘出诗人的行迹和活动内容。另一方面,武汉城市山水景色也吸引着众多诗人前往,由此构成诗人的山水寻觅行迹路线。唐代李白在眺望黄鹤山时,发出“观奇遍诸岳,兹岭不可匹”的赞叹,也激发“结心寄青松”的情感寄托。宋代袁说友游览东湖时,面对野木迢迢、渔舟点点的美景时,也激起了“如何不作钱塘景,要与江城作画图”的感慨。诗歌中有关诗人交游行迹的描述,不仅清晰地反映出诗人活动的地点,也侧面反映出当时武汉作为城市交通节点的联络状况。这些都说明了武汉诗路是诗人在城市中一系列时间地理上的标记。这种连续性标记点,清晰地勾勒出诗人们游历武汉的行迹。

(二) 武汉诗路是城市历史风貌的展示之路

众多诗词都是诗人们对城市风貌观察所产生的诗性灵感体现。历代诗人吟诗在历史时空中相互叠加,为探究武汉城市变迁提供了一种考古类型学式的样本。诗人们的诗歌主要从以下几个维度来展示城市风貌。

^① 施俊天:《江南诗性文化:浙江乡村建设的灵魂》,《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一是城市的整体风貌。武汉山川形势独特,长江汉江交汇,龟山蛇山相锁。独特的城市地理轮廓,加上城市的繁华风貌,自然吸引众多诗人歌咏赞叹。清代诗人查慎行就被汉口城市的气势所折服,发出了“巨镇水陆通,弹丸压楚境。南行控巴蜀,西去连鄢郢”的感慨。

二是日常城市生活风貌。武汉城市商业、娱乐业发达,生活便利,人们在安逸生活环境下,将城市作为歌咏的对象。一方面是歌咏市井的繁华。城市发达的商业面貌,让诗人们深受触动,并激发了内心的诗性灵感,由此产生了大批以城市风貌为歌咏对象的诗歌。如,清代叶调元在面对汉口城市商业发达、市内道路密集时描述,“四通八达巷如塍,路窄墙高脚响腾”。另一方面是歌咏城市的民风民俗。汉口民众临水而居,河流、街道是重要的生活空间。诗人行走城市山水之间和街衢巷道,自然会见到城市特殊的日常生活场景。这种特有的城市生活场景,激发了文人的诗性,并通过诗歌形式记录下来。清代诗人赵有成看到城市“士女习巴讴”的习俗后,激发了“始信湖湘美”的感慨。除城市生活习俗外,城市节庆习俗也是武汉诗歌反映的主要内容。武汉城市风俗独特,节庆类型众多,以元宵节、端午节为盛。元宵节前后,汉口灯市最为出名,常常是“人集江头语沸腾”。一些文人长期居住在城市,热衷于城市庆典活动。这种庆典活动不仅为文人们提供了娱乐方式,也为诗人们提供了独特的创作素材。

(三) 武汉诗路是城市的地理交通图

武汉诗路也是城市地理交通图。诗路的产生与城市交通密切相关。武汉水陆交通发达,众多诗人沿着交通要道进入城市。他们沿途不断歌咏,创作了大量诗歌。这些诗歌从艺术层面揭示出当时武汉的交通线路,体现出了以长江、汉江、后湖、郎官湖、月湖等主要水系湖泊构成的水系交通和以陆路驿站为主体的陆上交通网络。

首先水上交通沿线美景激发了文人的诗性。武汉历代水运交通发达,以长江与汉江为主要的水运线路勾连起了武汉与外界的联系。一些文人沿着长江、汉江等水运航线纷至沓来,纵览沿途美景、城市习俗和风貌,既是诗人行走丈量城市的方式,也激发了诗人创作的欲望,进而形成了武汉诗词线路。

除水路外,沿江街道也是诗歌创作之地和城市联通的重要通道。汉口的杨林口是位于马王庙以下数里的沿江街市,因交通便利,常常是人们乘船上岸的地方和相遇的场所。清代诗人王孟谷就曾在此处多次遇到龙星襄、许谦次等人。他们在江边一起饮酒作诗,正所谓“鄂渚市楼梧竹影,枕流沾酒待同倾”,在城市光影和水光映照下,诗人们的创作情感油然而生。

除水路外,城市的陆路交通线也是文人富商频繁来往之地和诗歌创作的汇集之地。汉口马王庙附近的骡马店,经常“以驻陆路往来富商贵客也”。这些驻店客商文人纷纷以骡马店为主题赋诗,使得骡马店成为诗路中的重要节点。如当涂的黄田钺就曾作《骡马店诗》描述该店残破现状。下关的蔡公祠是士大夫经常送别饯饮之处,正所谓“西客店中催骡马,壶觞争饯蔡公亭”。诗人将生活经历与眼前环境融为一体,构成了以陆路交通线为主的诗路。

三、武汉诗路的价值特征

武汉山水景色秀丽,自然景观独特。自唐宋以来,无数文人墨客将人生体验、日常经历和城市美景孕育在诗歌当中,在历史时局映衬下,不仅为武汉诗路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内涵,也塑造出鲜明的地域诗路文

化价值内涵。

(一) 家国天下的情感价值

武汉之地,深受文人歌咏,无数迁客骚人在此慷慨歌咏,以至“景则靡涯也,情则何极也”。便利的水运交通也满足了人们迎来送往的需要,山水相依的城市形势容易让人产生缥缈之感,在时局动荡下更加容易激发人们忧国忧民之感,以至于屈原、温庭筠、卢纶、岳飞、康有为等历代名人纷纷吟诗作赋于此。这些不同年代创作的诗歌奠定了武汉诗歌家国天下的情感创作基调。

一方面是乡愁的体现。武汉诗歌关于家国情怀的体现最初来源于乡愁意境。武汉地理位置特殊,异乡人众多,正所谓“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在汉漂泊的异乡人面对武汉山川美景容易产生乡愁之感。其中以崔颢名诗《黄鹤楼》最具代表性。该诗不仅吸引着后来诗人不断造访黄鹤楼,也在持续强化着武汉城市乡愁的基调。至清代,随着城市水运的发达和与外地联系的加强,前往武汉的文人更多,乡愁诗歌也大量出现。清代饶蔚宗、范锴、黄承增等人就聚集在汉江边和茶馆饮酒饮茶吟诗作赋,既排解了心中乡愁的苦闷,也催生了一大批乡愁题材的诗歌。

除此之外,武汉诗歌家国天下的价值呈现是与当时时局动荡激发人们内心情感分不开的,并推动着武汉诗歌主题从乡愁到国愁的升华。纵观武汉诗歌有关家国天下情感主题的创作高峰,无不是与当时历史事件存在着关联。春秋战国时期、三国时期、唐宋时期、晚清以来等历史阶段,均是这类主题诗歌创作的高峰。如南宋时期的《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以及抗战时期有关国家忧愁的大量诗歌的出现,都反映出了这一特点。换句话说,由于城市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时局对城市影响巨大,而时局的动荡正是塑造武汉诗歌家国天下价值情感的重要推动力。

(二) 珍视友谊的情感价值

武汉交通便利,是好友相聚送别的重要场地。正所谓“江号烟波,往来尤多伟士”。正因为如此,历代众多诗人在此迎来送往推动武汉诗路凝聚出一种珍视友谊的价值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特殊的情感价值主要体现在特定场所的标记上。一方面,某些特定场所是迎来送往的标记之地。城市中重要的码头、名川因是诗人与好友相聚送往之地而不断被歌咏。如城市中长江、汉江沿线的黄鹤楼、鹦鹉洲等地就是不同时空的诗人集中造访送别和歌咏之地。除此之外,城中山川美景也是友谊价值凝聚的重要场地。梅子山是诗人们经常聚会的场所。清代熊士鹏就同陈愚谷一起游月湖、登梅子山。诗人们一同游览创作,形成以山川为地点的重要交往空间。

另一方面,一些特殊送往场所已幻化为人们寄托友谊情感的文化标识。由于诗人们的不断歌咏,某些送别场所逐渐被文本化、符号化,演变成为寄托哀思和呈现价值情感表达的文化符号。黄鹤楼历代都是诗人们迎来送往之地。在历代诗人反复吟唱和造访下,黄鹤楼已成为诗路的重要文化节点和见证友谊情感的记忆之所。随着诗人不断造访吟唱,以黄鹤楼为代表的送别场地逐渐被文本化。黄鹤楼已幻化为文化坐标,吸引着诗人们去造访凭吊吟唱。同时,送别地点的文本化还造成了文化上的压力。黄鹤楼因崔颢诗作闻名后,在吸引后来者争相造访的同时,也制造了一种创作上的压力,以至李白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而汉江则是人们迎来送往的重要通道,也成为诗人寄托友谊情感的重要载体。

苏轼在寄给时任鄂州太守朱寿昌的诗词中,由江汉联想到锦江春色,产生了“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的情感诉求,并劝勉好友“还赋谪仙诗,追黄鹤”。这种跨地域的情感诉说,让武汉诗歌的友谊价值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三)诗性审美的情感价值

武汉秀丽的自然美景,容易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以至“大有合于吟怀者也”。众多文人墨客面对城市美景,见景而现心性,因心境而歌咏美景,呈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这种诗性情感价值呈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种是见景而现诗性。汉口城市繁华、生活便利,诗人们在行走城市之中激发灵感,以诗歌形式歌咏城市生活,展现出了一种诗性的审美情趣。这其中以歌咏后湖一带美景的诗歌最具代表性。后湖原是旧汉水故道,又名潇湘湖,是清代汉口城市的主要娱乐场所。后湖景色优美,茶馆众多。人们沿后湖一带赏景、饮茶、作诗,推动着后湖诗路的形成。后湖美景四季各不相同,所谓“四时晦明之殊景,可以游目骋怀”。人们以后湖美景、茶馆场景为主题进行和诗创作。诗人常艺仙与范锴和诗中就描绘出春季茶馆内“参差几幔谈医卜,高下楼台弄管弦”的真实景象。这些诗歌正是诗人对日常城市生活的诗性表达和情感体悟。除了处在城市内部的体验外,城市之间的行走丈量和差异化体验也激发诗人的诗性表达和创作灵感。宋代陆游乘船“触热行万里”,而到了鄂州(今武昌地区)尤觉炎热,“终日如炮燔”。诗人行走于不同地域中随着环境变化而产生的不同情感体验,为城市展现出了一种特殊的审美情感表达。

另一种是以诗歌彰显城市美景。城市美景呈现与诗歌产生相互而生。诗歌因美景而生,而城市美景因诗歌而流传。正所谓“文章借山水而发,山水得文章而传,交相须也”。当诗人们身处城市美景当中,将景观的诗性感悟付诸文字,美景的美感得以升华,并实现了传播。武汉山川美景众多,诗人们眼见不同山川美景,由景心生创作灵感,以诗歌形式彰显了独特的城市美景。梅子山因远处“摩挲石字细如蚕”而成为登高远眺的佳地。仙女山是“水枯湖荡渔舟少,霜落郊原草木稀”的一派景象。龟山景色变化则是大地回春的象征,“日落龟山山更清,原头啼鸟已春声”。这些诗歌为我们展示出不同历史时空下城市的山色变化。

四、结语

诗词文化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内涵,诗路是城市文化的特有空间形式。武汉景色秀丽,容易引发诗人的诗性。不仅如此,武汉人文环境优越,历史名胜、寺庙景观,以及人文遗迹丰富的湖泊也会引来诗人们造访和集中歌咏。再者,城市突出的商业功能、军事功能,也激发了诗人们的创作灵感,推动了城市诗路的形成。就内容看,武汉诗路是依托城市水系、山系以及交通线路所构成的文化线路。这种文化线路其实也是诗人行迹之路、城市风貌之路和城市交通线路。在此基础上,武汉诗路孕育了丰富的价值内涵。交通区域优势、发达的商业以及特殊历史事件,激发了诗人对家国的忧愁,从而凝聚成胸怀家国天下的价值情感。黄鹤楼、鹦鹉洲、梅子山等地不仅是历代诗人集中送别和交游之地,也因为被不断吟唱而成为诗路节点和友谊情感价值的呈现之地。同时,面对城市美景和城市诗意生活,诗人们以诗歌形式展现其美感,也呈现出诗性审美的情感价值。

武汉诗路的形成与长江密不可分,并在中华文明的诗性特质生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演进中,诗性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诗性文化不仅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品质之一,同时也以独特的文化样式承载道德精神的传承。正因为如此,“一部中华文化史也是诗之历史”^①。而在中华文明诗性特质形成过程中,长江则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长江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更是中华文明诗性特征的重要推动力量。长江两岸美景不仅构成了人们歌咏的对象,同时作为文化交流的通道,历史文化的积淀也让长江具有了诗性的美学意象和精神境界。由此,这种诗性特质不仅丰富了长江文化内涵,也“内蕴着中华民族共通的情感记忆和精神家园”^②。武汉诗路是长江诗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长江诗性的特征和品质。一方面武汉诗路反映出长江作为文化交流的通道功能。正是有了长江的通道作用,诗人们才能更加方便地进行交流。借助于长江,唐代白居易也才能与武昌当地官员卢侍御及崔评事在“江边黄鹤古时楼,劳致华筵待我游”,宴罢一同远眺。宋代陆游也才能与青城道人“大醉赋诗黄鹤楼”。远在鄂州的明代诗人童冀才能给武昌的好友吴广文频繁寄送诗歌。诗人们与官员、道人宴饮和书信交往,不仅形成了较为稳固的社会网络,也推动了长江诗性特质的形成。另一方面,武汉诗路的价值呈现构成了长江诗性的情感底色。武汉诗路体现出珍视友谊的情感价值,既展现出地域性特色,也进一步丰富了长江诗性的文化内涵。同时,武汉诗路体现出的家国天下和诗性审美的情感价值,既融入长江文化诗性整体表达当中,也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情感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晚清以后,在追求现代化和国家富强的背景下,武汉诗路呈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张之洞在湖北新政时期创作的诗歌,以及民国时期汉口市政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汉城市建设等主题的诗词,既呈现出城市的近现代化进程,也体现出时代变迁下武汉城市的地位作用,从而进一步丰富了武汉诗路的时代价值内涵。

武汉诗路文化极具代表性、地方性,应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创新价值呈现方式,实现创造性转化利用。一是突出诗路标志性意象。黄鹤楼、鹦鹉洲、梅子山、龟山等地均是武汉诗路的重要标记之地。应加强这些代表性标记地的改造提升,打造全国知名的文化地标。二是创新表达诗路的文化意境。武汉诗路展示了城市特有的民风民俗和城市风貌。应通过塑造新消费场景,展现城市古风古意,打造沉浸式的诗意体验模式,带动城市发展。三是彰显诗路的价值情感。就武汉诗路而言,其核心主题意象突出表现为家国离愁之感。应加强对武汉诗路中有关爱国主义情感的提炼表达,以诗性的艺术表达形式增强价值认同。

基金项目:武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3 年度一般课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视域下的武汉诗路创新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324)。

作者简介:

赵煌,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市史、文化史。

(责任编辑:杨莉)

① 杨吉成:《灵心诗性——诗性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论坛》2012年第5期。

② 钟晟:《长江:诗性文化与家国情怀》,《光明日报》2024年1月24日第11版

新质生产力推动未来产业 变革的实践逻辑

刘文富

摘要:新质生产力关乎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其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聚焦产业发展,特别是未来产业的打造、传统产业的升级等方面,关键还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激发新动能,强化科技领域创新;开发新场景,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打造新队伍,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新工具,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塑造新关系,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来推动未来技术进步和产业变革。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未来产业;新质战斗力;发展逻辑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新征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是推动生产力迭代升级、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推进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必然选择和重要途径。如何把握发展契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还是要以科技创新为推动力、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激发新动能,开发新场景,打造新队伍,创造新工具,塑造新关系。

一、激发新动能,强化科技领域创新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紧紧抓住创新这个“牛鼻子”,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需要重点关注企业创新主体、国家实验室、科学机构、科学城、新质战斗力等关键因素。

(一)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新动能的核心要素

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是核心要素。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必须充分发挥企业在发展新质生

产力中的主力军作用,通过企业发展加强自主创新,积极拓展市场,参与国际竞争,起好带头作用,引领高质量发展。无论是从0走向1的原创性技术创新,还是稳定高质量大规模的工业应用,企业的每一步突破都需要付出艰辛探索。

努力建立企业研发的新路径、新机制。一方面,可以通过创建先进制造研究所等新型研发机构,带动中小企业创新。例如,美国先进制造研究所可为企业提供在新兴技术领域进行产品原型设计、开发生产的设备,同时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专业知识和技术网络支持。当前,越来越多的公司正使用研究所的设备,进行原型设计和生产制造。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模式,实现了“一个研究院,带动一批创新型企业”的局面,促进创新、实体经济、产业资本、高校四链融合,探索建立基础研究转化为应用研究的通道,推动科学家转变为企业家。另一方面,大公司应加强对科创公司的投入,扩大研发部门和研发支出。美国微软、谷歌、苹果和亚马逊等大型科技公司纷纷表示,愿意大幅削减各部门的成本,以便将更多的资金转向人工智能研究,继续在内部投入资金开发自己的模型。

(二)科学机构是新质生产力新动能的创新源头

抓好科技创新策源。加快科技创新资源转化为生产力,需要靠改革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上做很大的改革,实现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工厂,再到市场的挑战,将创新变为造福人类的价值。要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在科技创新策源地方面的引领作用。当前要特别注意建立国家实验室与中小型企业联合创新的体制机制。把科学机构、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紧密结合起来共同发展。比如,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吸纳全世界五百强企业入股美国实验室,鼓励实验室带动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

(三)科学园区是新质生产力新动能的创新载体

纵观各国科技创新载体的演变,成功的科学园区,包括科学城、科学园、创新街区、创新园区、创新湖区等,已经成为创新、科学、商业和尖端设施的“大熔炉”,因而也成为新质生产力新动能的创新载体。根据美国智库的研究,世界各地工业园区的发展都在向科学园区转型,关键是要引进并充分发挥科学机构的创新引领作用。例如,哥本哈根科学城是欧洲教育和研究活动最集中的区域,利用医学、健康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独特资源,正成为创新、科学、商业和尖端设施的“大熔炉”。参照哥本哈根科学城等世界上一些好的科学园区的做法,一般都是在科学园区创建强大的创新载体,从而吸引商业人才和投资。其做法可以归纳为三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品牌和吸引力。品牌塑造指围绕什么是科学城的主要特点、主要优势,以及故事讲述和品牌建构的主要方法,以此来吸引海内外人才和企业。第二个支柱是创新、教育和创业,关键是促进科学园区内部实现更多协作。例如,瑞士医疗科学城形成了科学机构、大公司、初创公司与中小公司之间的融合机制,德国等欧洲一些国家,围绕特定主题组织活动,通过参观新机构或设施等建立合作网络。第三个支柱是城市发展。好的科学园区一般都会关注世界上其他创新城区的发展并从中汲取灵感,各级政府和私人投资者通力合作,加强城市品质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宽容和谐的创新社区,为创新企业和人才营造更好的环境。

(四)新质战斗力是新质生产力新动能的强大引擎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乘势而上,把握新兴领域发展特点规律,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新质战斗力是军队在未来战场上赢得胜利的关键能力,它既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有效需要、前进方向,也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了新领域。国家安全驱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变革,不断革新“新域新质作战力量”,进而形成新军事变革的发展方向。例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相继发明并推出现代互联网、星球大战计划,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深海战略等,在带动多个领域新质战斗力提升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高科技的发展。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化战争已成为高技术条件下的多维战争,战场空间也在不断演变拓展。

美国在通过新质战斗力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被称为“延伸管道”的科技创新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一些美国研发组织,特别是国防部,推动创新在每个创新阶段的移动。这意味着研发组织不仅支持前端研发,而且支持每个接替的‘后端’阶段,从先进原型到论证、实验平台,甚至经常进入初始市场创建阶段——国防部将购买第一批产品。政府在管道模式中的支持作用与创新系统的其他部分没有关联,但在延伸管道模式中,它们之间有深度的联系。过去四分之三世纪的主要创新浪潮,如航空、核能、电子、航天、计算机和互联网等,大多由这个系统演化而来。延伸管道有助于弥合在先进研究和实用技术之间的‘死亡之谷’。”^①这种“延伸管道”科技创新模式值得去研究和借鉴。

二、开发新场景,开辟新领域新赛道

以深空、深海为代表的深度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并给未来产业、未来生活、未来社会、未来治理带来很多的新场景,应当据此积极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开辟新质生产力的新赛道。

(一)未来产业新场景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

未来技术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现在对未来产业的议论、规划很多,但真正的未来产业应具有高端、尖端、极端等特质,应从深空、深海、深地以及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中引申而来,应该紧密结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一是深空探索。兰德公司研究发现,近年来,人类利用太空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获取和使用空间已成为现代数字社会和日常生活许多方面的关键。太空经济不仅仅是火箭和卫星,它是一个由天基和地面市场、活动和用户组成的广泛生态系统。对空间未来的预测反映了空间经济的多方利益攸关者性质以及天基和地面活动的日益一体化。预计上游部分(与将航天器和卫星送入太空有关的活动)和下游部门(利用空间数据提供产品、服务和地面部分应用的活动)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将会产生广泛的产业应用前景。

二是深海开发。当前,材料科学、人工智能及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等前沿科学领域的发展带动了深海

① 威廉姆·邦维利安、彼得·辛格:《先进制造:美国的新创新政策》,沈开艳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3,第9—10页。

先进技术的发展。深海建设环境勘测、防腐耐高压材料、水下自主导航、远程水声通信、机动与预置平台、能源保障等关键技术攻关,不断为深海开发提供重要科技支撑,也会产生很多新的产业场景。比如深海波浪中储存着大量能量,海洋中部波浪中产生的能量足以为世界提供充足的电力。

三是深度分析。深度技术正在改变世界,企业和组织必须积极应对挑战。西蒙·罗宾逊教授认为,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一个新的数字经济正在出现。企业和组织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通过深度分析技术和能力,将战略、平台、数字运营、人力资源等整合到单一的系统运营模型中来,并充分发挥其潜力。

(二)未来生活新场景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范围

在新技术的带动下,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都将发生量的提升和质的飞跃,涌现出大量适应未来生活的应用场景。

一是未来衣食住方面。未来衣服将会和人工智能芯片有机结合起来。未来食品科技将软件、硬件和硬科学应用于从农场到消费者的食品供应链中,传感器、机器人、人工智能、生物等技术被用于改善食品生产过程、增加食品营养、减少生产对环境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提高消费者满意度等方面。随着各种新型的太阳能电池板与建筑材料的有机结合,未来住房将会更加绿色环保低碳,智能化设备和家庭智能化生活空间将成为标配。

二是未来交通方面。未来交通将是多模式、一体化、门对门的,多种节能交通方式将与出行服务平台产品结合起来,交通的三大问题(拥堵、污染和事故)都被有效消除。超高速的高铁、飞行器、智能汽车、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等将成为个人出行的主要方式。未来学家和行业思想领袖萨万特·辛格认为:“智能出行方式、旅行的未来不仅仅是更快,而且更智能。想象一个没有交通烦恼的世界:多模式、一体化的系统提供实时动态指导,其发展顶峰是几乎瞬间完成旅行。如果超音速出行成为现实,从伦敦到纽约可能只要两个小时。”

三是未来生活方面。未来生活的好多设施设备将成为新的终端,例如智能镜子可以从脸部看出身体的状态,智能马桶可以化验出身体的基本数据,智能鞋子可以测量出身体锻炼的进展情况,智能穿戴设备将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可以测量出人的主要身体指标,成为人的身体健康的检测仪、报警器。家庭用机器人将成为人的生活的重要帮手,成为老年人可靠的生活助手、精神伙伴、游玩工具。

(三)未来社会新场景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涵

随着人工智能等关键新技术的突破,将会产生很多文化消费、教育培训、医疗救护、高端服务(保险、法律)、市场营销等新的场景。

一是文化创意方面。随着新一代互联网的深入发展,移动媒体不断引爆新的要素,带来未来文创产业发展的新场景。社交媒体时代的媒体要素是“内容+形式+社交”;Web3.0时代的媒体要素将会是“内容+形式+社交+场景”。沉浸式技术将会与戏剧、旅游、文创等密切结合,开发出更多的场景和产品。“有远见的商业领袖和技术传播者们已经开始利用这些原力来发展,推出新的场景工具和相关服务,为顾客

和粉丝带来愉悦的感受。”^①

二是医疗健康领域。未来生物技术的突破,对现在的一些顽固疾病,将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一些癌症、心血管疾病,甚至一些罕见病也都会找到治疗的方法。人的寿命将进一步延长。在医疗设备和医疗保健领域,元宇宙正在促进医疗实践的完善。这是医学成像技术、诊断和治疗的未来。

三是其他服务业领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会开发很多未来高端服务业新场景。在保险业,同样的数字孪生正在通过远程监控促进承保和加急理赔。人工智能将会在法治社会建设方面产生很大的作用。

(四)未来治理新场景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范畴

未来的智能化社会定会出现很多智能化运用的新场景,元宇宙、人工智能技术将广泛服务于政府决策、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政府服务将可以更为主动和智敏,政府的社会服务将会有更多的沉浸式应用场景,营商环境将会进一步得到提升,居民生活将进一步便捷安全。而这些场景反过来也会促进技术的进步、商业模式的更新,因此,法制建设和科技伦理如何与未来产业场景紧密结合也更加重要。

“未来的社会将会是一个高度复杂性的社会。如何建立一个复杂适应系统来构建新的公共治理机制,将会是一个重要课题。”^②这一机制包括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两个方面。“大数据时代正在呼唤下一波社会化的浪潮: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一个权力更分散的社会,一个网状的大社会。”^③为此,需要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思考,即从文学、哲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三个维度来探讨智能时代公共治理的内在机制,从机器、平台和大众三个维度来构建未来社会的外部治理机制。

在智能时代,超大城市治理理念强调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这既是我国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新要求,也是改革的新境界。可以从“建立集体用户价值,激活网络效应,通过社会网络工作,强化动态联合能力,鼓励开展重组创新等五大发展策略入手,探讨构建多元治理、互动治理、无缝治理、柔性治理、智慧治理相结合的社会治理协同创新路径”^④。

当然,未来虚拟空间的智能社会治理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例如,新型造假、犯罪行为,网络水军以及网络意识形态渗透,大数据杀熟、大数据算法干预选举结果等。需要从“全场景、全渠道、全环境”三个维度进行治理。

三、打造新队伍,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提升新队伍的创新思维能力

培养新的创新思维方式,要学会提出问题,让你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价值。传奇企业家和投资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曾经提出一个相反的前提,即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停滞的时代,即使我们被闪亮的移动设备分散了注意力而没有注意到。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但没有理由将进步局限于计算机或硅谷。

① 罗伯特·斯考伯、谢尔·伊斯雷尔:《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赵乾坤、周宝曜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第11—12页。

② 刘文富:《网络社会与公共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第181页。

③ 涂子沛:《大数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313页。

④ 刘文富:《网络社会与公共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第108页。

任何行业或业务领域都可以取得进步。它来自每个领导者必须掌握的最重要的技能:学会独立思考。做别人已经知道如何做的事情,将世界从1变为N,添加更多熟悉的东西。但是当你做一些新的事情时,你会从0变成1。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迫使人类需要思考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之间共生协作的关系。这就需要有更多的创新思维能力,包括跨界与融合的能力。数字化、万物互联使人、物、领域、组织与社会各类界限越来越模糊,跨界成为解决复杂问题和创新的关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实现技术、研究和产业之间的无缝衔接;成功的跨界离不开深度和智慧的融合,包括科学与人性、东方与西方、理论与实践、人类与机器,以及人的智慧与数字智慧的融合。融合的最高境界是营造创新生态,从而实现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二)构建完善人才自我实现发展动力机制

培养科技创新的核爆点,需要人来实现。当前需要再来一次解放思想,消除一切束缚人的积极性的障碍。针对科技创新人才建设这样一个难题,努力解决人才不归,或者是归而难用的体制机制及其相应的配套保障政策措施。优化顶尖人才的使用环境,给专家更多的施展才能的空间和舞台,让科学家有真正的科研自主权。应该更多地相信企业家,倒逼科学家,建立企业家与科学家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联动产生更多的内生动力。改变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解决国内人才培养与企业发展需求度匹配不高的矛盾。

(三)培养新队伍的科研领导能力

随着技术发展和科研要求的变化,科研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对国际参与的要求更大,更加依赖合适的研究、开发和创新生态系统,这也给科研机构带来了关于科研领导力的挑战。若缺乏科研领导力,政府投入的研发资金将难以充分发挥潜力,科研失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科研领导力并不限于学术界,还存在于许多组织和职业环境中。英国将设计和实施一个以“3A方法”为基础的新战略,即灵活性(Agility)、协调性(Alignment)、雄心(Ambition),来提升科研领导力。日本学者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组织领导应当具备三项能力:“第一,不断学习最前沿的科技。第二,率先垂范应用人工智能。第三,引导公司内各类成员参与人工智能的各类事业。”^①

(四)积极吸引优秀人才回国创新创业

积极吸引掌握尖端技术的海外人才回国效力。例如,在人工智能方面,根据美国保尔森研究所(Paulson Institute)开展的一项新研究显示,美国拥有60%的顶级人工智能机构,迄今为止,美国仍是精英人工智能人才的主要目的地,占全球总数的57%,而中国只有12%。但中国在培养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以本科学位为基础)方面领先美国,中国为47%,美国为18%。此外,在美国机构工作的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中,38%的人来自中国,而37%的人来自美国。因此,我国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人才政策,鼓励和吸引优秀人才回国创新创业。

^① 藤野贵教:《2020年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幸福的工作方式》,崔海明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第87—88页。

(五)加强新队伍的技术运用能力

加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高科技制造产业需要企业家、优秀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还需要高技能的劳动力。面对西方对我国高科技产业的打击,以及为了向产业价值链攀升,现有职工素质需要大大提升,也需要培养更多适合未来产业发展和现有产业提升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在智能制造、大数据、区块链、集成电路等领域夯实人才基础。当前,高技能人才收入不高、待遇保障较弱问题长期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技能型岗位的社会认可度,不利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应鼓励企业吸收高技能人才参与管理经营决策,鼓励企业为高技能人才制定职业发展规划,实行年薪制,提供股权期权激励,并在评选劳模等奖励时予以倾斜,充分体现大国工匠精神。例如,当前火热的AI应用背后都离不开的新兴岗位——人工智能训练师,作为人工智能的“老师”,训练师们通过向AI“投喂”海量文本和图像数据,经过不断的训练和调整,让AI模型变得越来越“聪明”,更加理解人类的世界。

(六)培育新队伍的组织管理能力

面对数字化、智能化社会的兴起,需要培育具有创业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下一代人才,持续推进组织管理变革,向扁平、敏捷管理模式转型。与资深企业家、风险投资家、各种专家等建立联系,营造创业者可以轻松获得支持的环境。支持建立以私营部门为主导,支持创新和初创企业成长的平台。发展高中生实践创业教育。实施以高中生为对象的实践型创业教育项目,培养创业意识。为年轻人创造互动交流的机会。为企业家和准备创业的学生提供交流场所。实施创业培育计划,学习在世界范围内通行的创业思维和商业战略。

促进初创公司和大公司之间的业务合作。鼓励大公司将人才借调到创业公司,为初创企业匹配来自大公司的人力资源。支持科学园的研发企业和公共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促进先进技术的研发。面向未来,必须缩小技能差距。世界经济论坛表示:从现在到2027年,预计44%的核心技能都将被颠覆,因为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企业设计和扩大培训计划的速度。终身学习和技能提升是“面向未来”提高就业机会的关键,必须采取积极的政策来确保建立正确的技能体系,以提高生产力并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

四、创造新工具,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新工具做支撑。正如21世纪著名的未来学家和思想家库兹韦尔所指出的那样,“智能可被定义为利用有限的资源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制造工具,而工具让我们走得更远”。^①

(一)运用元宇宙工具,增强技术进步

元宇宙成为重要的技术进步工具。元宇宙是互联网的下一代迭代,是一个身临其境的、三维的、虚拟的、共享的世界,可以在扩展现实服务的帮助下开展活动。元宇宙越来越被认为是网络的下一代演变,并

^① 雷·库兹韦尔:《人类智能的未来》,盛杨燕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第270—271页。

根据其他下一代技术的概念化,包括先进的网络和物联网、区块链和不可替代的代币(NFT)以及人工智能。虽然大部分元宇宙仍在开发中,但一些科技公司已经在展示一系列商业合作伙伴关系和创新用例。例如,像西门子这样的德国公司处于该技术的最前沿,它允许汽车制造商和其他制造商在虚拟世界中复制他们的物理设施,利用实时数据和模拟来优化他们的运营。

陶大程等专家认为,“产业元宇宙重塑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改变现有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加速人工智能发展;形成产业元宇宙变化发展的底层逻辑与产业元宇宙行业共性价值路径,揭示了产业元宇宙的本质是连接建立效率的提升与程度的加深,产业元宇宙可以分为数字孪生、数字伴生和数字原生三大能力”^①。考虑到元宇宙的中心地位,特别是考虑到其对工业4.0的影响,建立采用相应的数字战略。解决技术的整体资金缺口,建立专门的基金,用于对元宇宙至关重要的技术(如光学、物联网、微发光二极管显示器和电子数据采集设备)的商业化。激励投资和推出数字孪生技术,以提高中小企业和制造业的生产力。加强相关的国家标准制定工作。将沉浸式技术纳入工程和技术学位课程,以快速提升我国工业的技能。

(二)运用人工智能工具,打造生态系统

建立人工智能运用生态系统。英伟达的人工智能芯片无疑开创了世界新局面。用华尔街的话来说,英伟达是一家“锄头和铲子”公司,在人工智能淘金热的早期提供基本的底层产品。现在还只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将重点关注英伟达以外的那些参与构建人工智能所需基础设施的公司,包括半导体公司、云提供商、数据中心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硬件和设备公司、安全软件股票和公用事业公司。第三阶段将重点关注人工智能“支持”的公司,其商业模式可以将人工智能纳入产品中以增加收入。这一阶段与许多软件和IT服务公司的管理层评论和股票表现一致。第四阶段将重点关注所有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生产力的公司,其中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潜在效率提升最大,这些行业的工作更容易受到人工智能自动化的影响,软件和服务以及商业和专业服务通过劳动生产率广泛采用人工智能,对收入的推动最大。

(三)利用数字孪生工具,改造传统产业

“数字孪生”是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区块链等技术,来创建整个制造流程的模型,并找出可以改进的地方。欧盟制造商越来越多地采用数字技术来提高敏捷性。如今,虚拟工厂的想法正在欧洲流行,从飞机制造商空客公司,到电气设备专家施耐德电气等制造商,都在探索“数字孪生”技术并建立虚拟制造设施,建设简化实际生产的虚拟工厂(Virtual factories)。欧盟已创建了一个价值11.5亿欧元的名为“未来工厂”(Factories of the Future)的公私合作项目,来推进制造业的研究和创新。韩国三星重工正在建设“智能船厂”,在设计、采购、生产等造船全流程利用数字技术推进业务革新的“智能SHI”(Smart Samsung Heavy Industries)数字化转型战略。英国政府制定了先进制造业计划(Advanced Manufacturing Plan, AMP),将先进科学技术(包括数字化和自动化)融入生产流程。有了先进的工艺,制造商就能制造出先进的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制造商都有成为先进制造商的潜力。

^① 陶大程等:《产业元宇宙》,人民出版社,2022,第1页。

(四)开发下一代网络技术,提升国家主导地位

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快速发展,对网络信息技术创新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互联网正在演进革新,未来互联网架构的研究已成为世界性的技术难题,是决定未来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关键。2023年9月,美国兰德公司发布《创造选择性优势:发展网络空间选项以维持美国对修正主义大国的主导地位》报告。提出在网络作战域中创造“选择性压倒性优势”,努力开发四个新能力领域,拓展网络空间行动范围。一是集成网络(Integrated cyber),融合网络技术、有机的情报、与特定信息相关的和电子战能力;二是整体网络(Integral cyber),包含如加密通信、位置、导航和授时、传感器集成、多平台瞄准等网络组件;三是扩大网络(Expanded cyber),扩大的网络可跨越和平时期的限制,在最大化竞争象限中,其行动范围更加自信;四是扩展网络(Extended cyber),超越以作战为重点的技术网络,涵盖包括供应链、生命周期和应急网络等层面。

五、塑造新关系,激发经济发展活力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赖于新质生产关系的突破,并由此提供新的发展动能。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涉及技术、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多重因素,需要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高回报的创新前景、强大的“政府—大学—产业”联系,从而刺激创造力,鼓励创新,促进创业。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新产业的突破与发展,需要打开思路,与创新创业、人文艺术等领域有效结合,迸发火花。

(一)塑造政府、社会与市场之间的新型关系

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为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具有特别的作用。政府不能包揽一切,而是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引入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发挥政治逻辑、政策逻辑、市场逻辑、技术逻辑的综合作用。在增进市场、激活社会,亦即在市场治理、社群治理和行政治理如何互补嵌入并相得益彰上做好文章。

坚持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宏观层面:二者协力推动科技创新;尊重市场规律,使企业不断迸发活力和创造力;依靠政府引领,推动重大基础性、关键性技术的研发攻关。中观层面: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强发展新动能;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微观层面:充分发挥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导作用。

充分发挥社会的协同作用。“一个社会的经济竞争力和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新兴科技的最大获益者只可能会是这样的社会和企业:他们不仅在已有的事业上加倍努力,还能够引导人民去适应正在发展的工业。”^①

坚持把市场逻辑置于核心地位。短期内,政治逻辑可能是显性的。长期而言,市场逻辑是压倒性的。政策逻辑,就是要在长期的、决定性的市场逻辑,和短期的、阶段性的政治逻辑当中,找到动态适配的均衡点。

^① 亚力克·罗斯:《新一轮产业革命》,浮木译社译,中信出版社,2016,第35—36页。

(二)建立科技创新举国体制与市场化联动的新型关系

以科技创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通过企业创新来推动高质量发展。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到了改革的关键时刻,要敞开大门办校办所,加深大院大所与社会企业的密切合作,进一步活化大院大所,形成以企业为中心的创新集群。学习瑞士的“四合一”生物制药创新机制,也就是大企业、科学机构、创新企业和小企业的有机结合、互相渗透、相互融合的这样一种科技创新机制。

支持企业稳定经营。支持制定业务连续性加强计划,以便中小企业在发生自然灾害时也能继续开展业务。建立多层次融资体系,推进小微企业融资多元化。对于企业面临的管理、知识产权、法律、金融等问题,提供专家窗口咨询支持,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指导,改进生产技术。抓好产业生态,做强产业集群,以头部企业 and 创新领航企业协同周边,带动上下游的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形成跨区域的产业生态。

(三)建立软实力与硬科技的新型关系

创建科技创新的优秀软环境。体现在政府表率(政府作用与效率、民主与法制化进程)、社会担当(不同民族、人群、阶层的和谐程度)和企业责任三个层面,着力提升政府软实力、社会软实力、企业软实力,传播影响力和形象塑造力(这里的影响力既包括区域影响力,更包括国际影响力),做到外化于行,综合善治,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

采取明智的产业政策。根据日本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的研究,产业政策涉及各种经济政策工具,范围涵盖创新项目、税收政策、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等,其核心是指任何类型的选择性干预,试图将生产结构转向经济增长前景更好的部门。在制定成功的产业政策时,应坚持面向未来,行业和技术驱动,发挥竞争力量,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降低风险。英国剑桥大学名誉教授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在《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达斯古普塔评估》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更具经济性和政策性的资本方法。“资本法不仅考虑了市场经济提供的服务,而且考虑了市场以外的服务,包括环境,并考虑了作为提供这些服务基础的私人资本、社会基础设施、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结合,作为政策目标。”

(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格局

深刻理解并处理好党治国理政视域下发展和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有利于正确认识新安全格局和新发展格局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不仅是重要历史经验,也是重大理论问题,更是重要实践要求。

新质生产力催生了军民融合新机制。例如,美国的星链公司为军事情报信息提供了新的渠道,大型人工智能公司、无人机制造公司、深水器制造公司、宇宙航行公司等应运而生,为提升战斗力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而科技企业也为自身发展开拓了新的场景和领域。兰德公司刊文认为:“如果世界领导人只从乌克兰战争中吸取一个教训,那应该是快速创新的能力可以对战斗结果产生深远的影响。”

新质战斗力为未来产业提供了新方向和新空间。军方为项目的牵头人,是新技术变革的新动能,新

质战斗力的提升,又为未来产业的开发提供了新方向和新空间。为了提升美国太空部队的新质战斗力,兰德公司提出“将技术从空间获取社区过渡到运营社区”。以互联网技术为开端,以人工智能为新的起点,新质战斗力带来的未来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罗马大学经济学家马格纳尼(Magnani)认为,新技术“海啸”正处于重新布局我们经济体系的开始阶段,未来最重要的工作技能是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

六、结语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新征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是推动生产力迭代升级、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推进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必然选择和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

到2035年,深度科技将得到极大的发展,我们将看到神经形态计算、DNA计算和量子计算等新计算科学的出现并进入我们的世界,它们将进一步挑战摩尔定律,并加速从通用人工智能到超级人工智能的转变,这意味着机器将变得比人类更聪明,从而实现技术奇点,更多的先进工具将会运用到我们的生产生活中。总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还是要聚焦到产业发展,特别是未来产业的打造、传统产业的升级等方面。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这一产业战略部署,已让人听到来自未来的敲门声。未来已来,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作者简介:

刘文富,博士,教授,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公共治理、区域经济。

(责任编辑:周阳)

以新质生产力重塑发展新优势， 打造千亿商业航天产业集群

新洲区委政策研究室课题组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度提出打造商业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商业航天产业发展迎来了黄金机遇期。本文在探讨国内外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武汉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现状,认为武汉商业航天产业存在先发优势,但在区域协同机制、产业生态培育、创新体系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应通过加强资源要素协调联动、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等举措,从而实现以新质生产力重塑发展新优势的目的。

关键词: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武汉市

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系统部署了2024年经济工作,其中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明确提出要打造商业航天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本文认为,武汉市应当抢抓国家战略重大机遇,拥抱商业航天黄金时代,加快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发展,推进“中国星谷”保持领先优势,抢占航天赛道制高点,助力湖北商业航天产业走在全国前列。

一、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战略意义和主要趋势

(一)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战略意义

航天产业到今天已繁荣发展了近70年。^①20世纪社会整体工业化、智能化程度较低,生产力与今天相比有较大差距,传统航天产业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能由政府主导。从诞生起,航天产业就肩负着带动整体科技进步和国防建设的重要使命。但传统航天产业囿于体制机制的原因,在管理、效率、成本和技术等方面在发展至一定程度后出现瓶颈。即使采用举国之力发展航空航天,航天产业对整体经济的带动作用也比较有限,且会高度挤占其他领域的科研资金和人员精力。冷战时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财政支出一度到了美联邦财政预算的5.3%。因此,航天产业若想多点开花、打开新局面,发挥市场主

^① 包为民、汪小卫:《航班化航天运输系统发展展望》,《宇航总体技术》2021年第3期。

体作用则是必然选择。

随着冷战结束和航天技术逐步成熟,一些军用技术解禁,进入经济和民生领域发展;一批科研人员也不断从军工企业和高校流入商业航天公司,商业航天从“计划航天”手中接过接力棒。^①在市场经济这个“看不见的手”的推动下,低成本、可复用成为商业航天公司的主要研发方向,快速试错和迭代是当前商业航天快速发展的最主要优势之一。例如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测试其新一代可回收火箭时,并不以成功入轨作为其首飞目标,首发火箭还未升空,同型号第二发火箭已经就绪,且火箭主体由价格较低的不锈钢制成,通体无任何涂装,该型号火箭研发成本仅为美国载人登月计划“土星5号”火箭的5%~10%。^②同时,商业航天公司往往不寻求掌控全产业链,倾向于研发设计通用化、模块化的卫星元器件结构,生产制造广泛采用标准工业化的零部件,有助于细化社会分工,也善于引入各方资源力量共同参与,进一步优化了社会资本的配置。因此,商业航天在推动航天器和相关技术快速迭代的同时,也很大程度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③

(二)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

随着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当前有三个方面的应用前景和需求因素,成为商业航天产业快速发展的主要趋势。

一是卫星星座大规模组建。在移动网络基站、光纤等难以覆盖的区域和偏远地区,采用卫星互联网通信成本相对较低。其中以载人航天和太阳同步轨道为主的近地轨道更是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④2019—2022年期间,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已发射了2300余颗卫星进入近地轨道。^⑤2020年4月,国家发改委明确“新基建”范围,卫星互联网首次被纳入信息基础设施范畴,卫星互联网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二是基础科研向纵深推进。相较于地面,太空的微重力、高辐射在生物育种、空天科技等方面有巨大潜力和优势。“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在量子信息、生命健康、生物育种、空天科技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重大项目。目前,一些有条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根据科研需要发射了微小卫星,主要用于开展航天新技术、新体制、新产品等空间试验,对于推动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通导遥应用前景广泛。未来,“通、导、遥”卫星融合发展,提供天体一体化通信和数据传输服务,可以应用于移动通信、智能终端设备、高级别自动驾驶、城市共享交通等领域,有助于拓展大众消费应用场景。

二、国际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历程与经验启示

(一)世界商业航天的发展历程

世界商业航天的发展历程从20世纪60年代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开始,到民营航天公司的诞生,再到可

① 廖小刚、方勇、侯勤:《美国加速争夺太空资源的主要动向及影响》,《国际太空》2021年第1期。

② 何慧东、张晓萌:《SpaceX公司“星舰”综合飞行试验任务分析》,《国际太空》2023年第12期。

③ 郭文成、崔彪:《中美商业航天发展脉络对比分析》,《卫星应用》2021年第2期。

④ 李明、龚自正、刘国青:《空间碎片监测移除前沿技术与系统发展》,《科学通报》2018年第25期。

⑤ 韩槌夏、张丽艳、陈状、张伟:《美国商业航天发展带来的启示》,《科学》2023年第1期。

复用运载火箭技术的突破,商业航天公司目前已成为空间载荷发射的主力。1962年,美国的卫星通信法授权成立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开始提供国际卫星通信服务,这标志着商业卫星通信服务的开端。2001年,企业家丹尼斯·蒂托乘坐俄罗斯联邦航天局的“联盟 TM-32”飞船访问了国际空间站,成为首位进行太空旅游的民间人士。随着商业通信和地球观测需求的增长,以及发射成本的大幅降低,航天公司开始提供商业卫星发射服务。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设立了一系列的奖励和激励计划,以鼓励私人企业开展太空科学实验、资源勘探等方面的创新工作,促进商业航天技术的发展和應用。2008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签署了第一份商业补给服务合同,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供16亿美元资金,支持其12次“龙”货运飞船飞行任务,为轨道科学公司提供19亿美元,支持其8次天鹅座货运飞船飞行任务。2011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提出了商业载人航天发展计划,该计划旨在开发载人太空飞行器,并提供运送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的服务。其中,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和波音公司的星际飞船就是商业合作伙伴计划的重要成果之一。2015年底,由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研发的世界第一枚可回收火箭猎鹰9号火箭测试成功,最大重复使用次数已经达到19次。目前,猎鹰9号运输成本约为每千克3000~4000美元;正在测试中的星舰,已将运输成本压缩至每千克900美元左右,如回收技术验证成功,运输成本将进一步压缩。^①

(二)世界商业航天发展的经验启示

市场导向是推动商业航天快速迭代进步的重要因素,商业航天领域既存在竞争,也存在合作。相较于政府主导的“计划航天”,分布式的产业链为不同零部件提供了可替代方案,企业之间的竞争推动了技术的创新和成本的降低。而合作则可以共享资源和经验,生产部分标准化的零部件避免了重复开发,提高了产业整体的发展效率。商业航天市场包括通信、地球观测、导航、科学研究等多个领域,企业可以选择不同的市场领域进行发展。分工带来效率,并降低风险,拓展商业机会。

商业模式创新是商业航天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政府引导仍然不可或缺。卫星应用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也是商业航天不断催生的结果,卫星商业运营模式和产品服务模式相应地发生颠覆式变革。^②商业航天公司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使用风险投资,而不是政府投资及政府财政货币手段,降低了整体投资风险。但政府仍然在商业航天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提供着资金、法律法规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支持,政府订单贯穿始终,是其主要的资金来源渠道,政府也通过规划对一些企业的极端行为进行限制。

三、国内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情况

(一)国内商业航天发展总体情况

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资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2015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国家民

① 樊巍:《“星舰”第三次发射验证多项关键技术》,《环球时报》2024年3月16日第4版。

② 于森、戴阳利、张召才:《国外商业航天发展模式研究》,《卫星应用》2017年第1期。

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年)》,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发展商业航天,标志着我国逐步引入市场力量推动航天产业发展,这一年被认为是我国商业航天发展元年。10年来,不断有政策向商业航天倾斜,加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等企业的示范效应,我国北京、上海、西安、武汉等城市跟进出台促进商业航天发展的政策或具体措施,逐步形成了一批商业航天企业。^①2020年北斗全球导航系统组网成功,卫星互联网被列为“新基建”项目,国内商业航天市场规模已于当年突破万亿。根据公开数据统计,2023年全球轨道级发射量223发,其中美国116发,中国67发。在我国发射的67发火箭中,有47发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生产,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中科宇航、蓝箭航天、星河动力、天兵科技、星际荣耀等分别承担了少量火箭的生产制造任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长征系列火箭一般发射载荷较大,且承担了更多空间科学实验的重大工程项目。截至2024年初,国内发射工位资源仍然十分有限,酒泉和文昌正在建设商业航天发射工位。据统计,酒泉、文昌、西昌、太原四大发射场传统发射工位大约有11个,发射后修复周期较长,各商业航天企业也都根据自己的研发测试需求兴建简易发射架或者驳船发射位。由此可见,我国商业航天的市场化、规模化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发射频次,还是配套设施,都远不能满足未来高频次、快速发射的需求。

(二)三大国家级航天产业基地发展情况

到目前,国家发改委共批复3个国家级航天产业基地,上海和西安定位于民用,武汉是首个商业航天产业基地。相较于其他地区,上海、西安、武汉三座城市的商业航天先发优势仍然存在。上海的航天基础强劲,拥有60多年历史的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以及上海空间推进研究所、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院等“国家队”选手,建成闵行上海航天城、浦东卫星互联网科研基地、青浦北斗空间信息应用示范区等多个产业、科研基地,产业生态体系完善,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应用能力扎实。2023年,上海先后印发《上海市进一步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3—2026年)》《上海市促进商业航天发展打造空间信息产业高地行动计划(2023—2025年)》,显示出大力发展空间信息产业的导向。现在上海所在的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正加快卫星研发制造,打造卫星互联网集群,计划实现一万两千多颗卫星的组网。西安国家级民用航天产业基地主要依托航天产业国家队和军工科研院所资源聚集优势,拥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五院等9家“国家队”选手,引进银河航天、蓝箭航天、中科宇航等60余家企业,已经形成运载发射、卫星制造、卫星测控、卫星应用、航天技术转化全链条产业,正在打造商业航天产业聚集区。值得注意的是,在火箭动力、卫星载荷、测控等领域,西安有着强劲的科技实力。在液体动力方面,航天科技集团六院研制生产了北斗工程的系列液体火箭发动机,中科宇航公司是我国商业航天领域液体火箭发动机专业研制生产企业,蓝箭航天公司研发的朱雀二号火箭是首款进入量产的商用液体火箭。

(三)国内其他省市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动态

越来越多的省、市竞相发展商业航天产业,布局建设专业园区、培育壮大优势企业,商业航天赛道的

^① 王彩娜:《上海:商业航天渐进黄金时代》,《中国经济时报》2023年11月23日第2版。

竞争越来越激烈。北京市航天领域科技创新资源丰富,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在国内领先。2024年初发布促进商业航天创新发展的规划方案,规划期限设定在2028年,主攻火箭技术和星座建设,利用其优质的科教资源,强调创新能力增强、产业能级提升,并着重在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突破,建设大规模星座,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在空间布局和商业运用方面,北京提出建设“南箭北星、两核多园、京津冀联动”的发展格局,建设千亿级产业聚集区。江苏省产业科研强、工业体系完善、经济基础雄厚,有着较完整的航天产业支撑体系,拥有蓝箭航天、天兵科技等国内商业航天领域领军企业。目前,南京正加快建设未来科技城国家数字航天产业集聚区,苏州打造商业航天新高地,无锡重点打造商业火箭、卫星制造及应用、空间信息应用三个百亿级产业生态圈。浙江宁波、浙江嘉兴、海南文昌等地临近海洋,可以利用港口停泊运送大型火箭的船只。相较于内陆发射场,在可复用火箭测试中,残骸坠落造成的安全隐患小,容易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实现弯道超车。《浙江省航空航天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显示,浙江将大力培育发展商业航天,关注商业运载火箭、微小卫星、北斗应用、航空航天新材料等领域,规划的宁波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心项目,计划建设年发射规模100发的商业航天发射基地和千亿元级的商业航天配套产业基地,将弥补长三角商业航天发射的不足。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初步形成商业航天全产业链,广州有着国内首个全产业链商业航天产业化基地——中科宇航产业化基地,正大力打造中国商业航天新一极。四川则在成都、绵阳、眉山三地布局商业卫星应用产业,在卫星发射组网方面发力。

四、武汉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

2016年8月,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获国家发改委批准设立。2021年,湖北省发布《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加快建设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荆门国家通航示范区,打造国内领先的航空航天与北斗产业集群。武汉市将航天产业作为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纳入全市“965”产业体系。2022年3月发布《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我市航天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锚定“中国航天第三极”发展目标,围绕“一核两区多园”功能定位,大力发展商业航天、高端装备、新材料三大产业集群。现在,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以商业航天产业为主导,主攻火箭、卫星研发制造的航天制造业,培育以测试、空间数据信息应用为重点的航天服务业,发展以新能源船舶海工装备、智能装备、新材料为重点的关联配套产业。建设成国内首个现代化的商业火箭产业园,我国首条小卫星智能生产线已经投入使用,具备年产20发火箭和240颗卫星的批量化生产能力,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虽然武汉市商业航天产业高标准规划建设,具有国家战略、科教资源、产业基础等方面的优势,但是进一步高质量发展仍然面临诸多难题。

(一) 区域协同机制不健全

商业航天产业关联产业多、产业协同性强,需要发挥各区比较优势并相互赋能。武汉布局了商业航天产业的“一核两区多园”,但商业航天产业的整体规划体系有待加强,未能形成良好发展的合力。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和临空港经开区“先进制造集聚区”、东湖高新区“创新应用集聚区”等融合发展不够、联动协同不多,无法有效地利用各区的资源进行优势互补,建设良好的商业航天发展生态圈。

（二）产业生态培育不完善

与其他城市相比,武汉的商业航天产业生态培育仍有一定差距。根据国内知名科技咨询机构泰伯智库发布的“2023 中国商业航天企业百强”榜单,从地域分布来看,北京、广东、上海、陕西、四川拥有的企业数量位列前五名(分别是 51 家、8 家、6 家、6 家、6 家)。仅有 4 家百强商业航天企业位于武汉,可见武汉商业航天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企业集聚不足,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民营商业航天企业,制约了整个行业竞争力的提升。另外,在商业航天的产业生态中,上游产业有火箭制造、卫星制造等,中游产业有卫星发射、地面设备制造等,下游产业有终端应用与服务等。^① 位于武汉的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主导产业为卫星配套、火箭配套、卫星测控,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的主导产业为火箭总体,航天行云科技有限公司的主导产业为卫星总体,武汉珈和科技有限公司的主导产业为卫星遥感应用,这些企业多集中在上游装备制造环节,缺少卫星测控、运营、应用及服务中下游环节支撑。火箭产业虽有独角兽企业支撑,但还在培育,需要时间成长。卫星产业面临竞争,卫星技术、平台载荷,特别是应用场景的开发利用需要进一步推进,没有形成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

（三）创新体系建设不全面

现阶段,武汉在创新研发中心建设方面存在不足,高校院所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还不够常态化,缺乏大型试验设施、高能级高层次的航天研发平台,卫星平台、航天运输等关键核心技术硬核支撑还不够强,导致技术研发不能满足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可复制性较高,在全国范围内的竞争力不足。一方面,火箭重复使用技术还有待突破,产品制造成本和发射成本都很高。以火箭液体可回收技术为例,相比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低成本大型液体火箭回收和复用,武汉还处在初级阶段,要做到火箭可回收、重复利用和稳定发射还需进一步研究各项技术。另一方面,批量生产能力有待提升。火箭发射能力仍然偏低,与庞大的卫星星座发射计划相比,商业火箭运载能力缺口较大,存在“星多箭少”难题。而且,商业卫星批量化和自动化生产能力不够,卫星星座计划实施率不高,在轨卫星数量太少,难以形成规模化组网优势。

五、加快武汉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结合武汉市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现状,本文从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创新升级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武汉打造中国商业航天发展重要城市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区域协同发展,加强资源要素协调联动

商业航天是我国航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从政府层面进行决策部署和统筹协调,应围绕“一核两区多园”功能定位优化航天产业布局,做强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做实临港经开区“先进制造集聚区”、东湖高新区“创新应用集聚区”,支持全市各区域发挥本地基础优势,建设产业园、延伸产业链,共同

^① 张利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点名”后,商业航天如何发力?》,《中国报道》2024 年第 1 期。

构建全市航天产业协同发展大格局,才能形成整个产业发展的合力。

一是加快做强“一核”。国家商业航天基地围绕打造“中国航天第三极”总体目标,推动实施东部产业核心区综合开发项目、龙口片区社会资本招引等片区开发工作,加快建设“四园一中心”,筹建星谷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重点推进新洲区智能制造产业研究院科研平台建设。此外,加快建设光谷长江大桥、双柳长江大桥,以内联外畅交通引领经济协同,探索共建园区、飞地经济、联合招商等合作模式,推动星谷与光谷联动发展,支持航天基地与长江新区共同发展。

二是加快提升“两区”。东湖高新区以北斗芯片研发应用为龙头,加强“芯、端、网、图、用”全产业链统筹。临空港经开区依托航天三江、航天智信等龙头企业,开展运载火箭、卫星平台及载荷的核心技术攻关,打造集航天器设计、制造、发射、测控和应用于一体的商业航天先进制造生态。

三是加快创新“多园”。在武昌、洪山等,依托大学、科研院所和孵化器,结合创新楼宇、创新街区和创新园区建设,积极拓展航天育种、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服务、智能驾驶等应用场景,打造产业协同创新特色园区。

(二)产业集群发展,做好强链延链补链

在市级层面制定商业航天产业发展规划,为企业提供政策层面的指导,明确商业运载火箭、低轨通信卫星、地面应用设备、卫星应用及服务细分赛道和主攻方向。

一是加紧对接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是产业快速发展的引领者,能够促进行业技术创新、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建议更多对接龙头企业,引导其担当产业链的“链主”,打通产业上中下游。如继续对接航天科工等头部企业,加快推动航空航天、量子芯片、智能网联等项目落地,争取在汉投资布局新材料、高端零部件、地面设备等高附加值配套项目。再如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全力争取其在汉布局卫星互联网论证设计等方面重大产业项目。

二是精准进行产业招商。除了发挥龙头企业的吸引作用,还应制定商业航天招商地图,进行有针对性的产业招商。按照目标企业的地域分布,根据产业链所处环节、核心技术及产品、市场份额等多项特征确定重点招商对象,利用在武汉主场举办的航天大会、航天高峰论坛等全球范围的会议,开展招商专项行动,围绕产业链补链强链招商。

三是构建“纵”“横”两大产业链。“纵”是指根据商业航天上下游环节,打造火箭、卫星、地面站到终端的全覆盖产业链。“横”是指商业航天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例如高端制造、新能源等,打造融合发展的开放的、可扩展的创新型产业链。

(三)创新升级发展,提升创新策源能力

一是提供政策资金支持。商业航天产业成本高、风险高、周期长,对于一般民营企业来说很难实现盈利,民间资本进入意愿度较低。为了激发市场活力,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提振资本信心。以制度创新为重点任务,以破解影响和制约航天技术商业转化和航天事业产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商业航天产业的市场化进程。同时,推进设立市级甚至省级层

面的商业航天产业基金,发挥政府产业基金引导作用,完善降低研发成本、融资上市、保险贴费等方面的政策,推动产业基地成为商业航天产业孵化温床、投资洼地。

二是健全科研创新体系。航天领域人才多在国有企业发展,多数民营企业的领导者也来自体制内,要实现商业航天的良性发展,就应该优化规范人才流动机制,帮助加强民营企业的人才队伍建设。在政府层面,组建包含航天领域专家学者、科技人才、企业家等在内的智库。强化研发设计平台、测试验证平台、智能运维服务平台等功能性平台支撑,提升现有平台服务能级,进一步谋划建设一批省(市)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在企业层面,需要大力实施人才培育计划,聚集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三是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在商业火箭方面,就降本增效而言,可供使用的技术路线有液氧煤油动力系统、液氧甲烷动力系统、可控式降落回收等。^①建议继续加大投入力度,争取在可重复使用且成本可控的燃料技术上取得突破,研发大规模可回收的重复利用火箭,推动液氧甲烷火箭早日发射升空。在商业卫星方面,低轨互联网通信卫星和低轨物联网通信卫星是未来卫星产业发展的重要领域,要进一步加大对高分辨率、高通量卫星系统的研发和设计力度。

四是进行应用场景创新。商业航天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经济收益,但目前其商业价值还未得到完全开发,终端应用市场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应该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实施“商业航天+”战略。武汉可依托武汉大学的测绘遥感学科优势,大力发展卫星遥感产业,广泛用于城市管理、自然资源监测、安全生产等领域;加强与华中农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高校院所战略合作,推进航天生物育种、生物制药、地球物理工程等前沿领域创新;加强与珞珈实验室、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工业技术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战略合作,推进卫星互联网、天基物联网等前沿领域创新,开辟太空经济新赛道;发挥我市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无人驾驶等领域的产业优势,推进商业航天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提升应用效能和用户体验促进大众消费,开拓数字经济新场景。

五是推进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军民融合是航天发展的必然趋势,推动航天军民融合,能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形成军民协同创新的强大合力,提升研制效率与效益。^②建议积极探索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路径,谋划好产业布局和项目建设,打造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依托新洲区双柳街,聚力打造航天产业引领区、跨江联动发展区和军民融合示范区。重点发展高性能结构复合材料、电磁隐身材料、电磁防护材料、特种软磁材料、石墨烯材料等,加快建成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军民融合电磁防护材料、特种软磁的科研生产基地。

(四)产城融合发展,提升和完善城区功能品质

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目的是为最终消费者服务。应以武汉争做全省数字政府建设标杆为契机,利用空间信息全面赋能政务、民生、经济数字化转型,推动建设武汉新型智慧城市云基础设施及服务。借助卫星定位导航、遥感观测等技术采集地面、地下、建筑等城市基础空间的静态信息,通过数据建模仿真构建可视化的城市时空图像,呈现出物理城市运行的全貌,打造与物理城市实时映射的数字城市,进而精细化建设、规划、管理城市。另外,在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方面,应坚持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完善

① 杨威:《加快发展我国商业航天产业链》,《宏观经济管理》2023年第7期。

② 李向阳:《我国航天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策略研究》,《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航天新城“配套服务轴”,推动产业、人口双导入,打造职住平衡、产城融合、功能完善的产业新城。依托新洲双柳,加快推动基础设施、功能配套、要素资源相对集中,促进人口、服务、产业相对聚集,推进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全面提升航天新城承载力。优化航天基地管理机制,在市区协同、基地和街道协同上,在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营等领域,在与企业、平台合作等方面,更大力度改革,以适应更大范围、更高规格、更快建设的发展前景。

新洲区委政策研究室课题组成员:

刘可,中共武汉市新洲区委政策研究室科员;
韦思源,中共武汉市新洲区委政策研究室科员;
陈奎,中共武汉市新洲区委政策研究室调研科科长;
周蕊,中共武汉市新洲区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蔡艳明,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党工委书记;
江红斌,武汉市新洲区科经局党组书记。

(责任编辑:周阳)

知识产权赋能武汉先进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武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课题组

摘 要:先进制造业是世界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其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如何推动其高质量发展正日渐成为全球各国的关注焦点。本文以武汉市为例,研究先进制造业专利申请趋势、专利技术构成等,并通过与同类城市比较先进制造业细分领域专利情况,综合分析武汉市先进制造业技术发展现状、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

关键词: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知识产权

先进制造业是全球科技竞争的高端领域和前沿阵地,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再次强调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制造业中创新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领域,推动其高质量发展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向“新”突破,以“质”谋变。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也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来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先进制造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目前,对于先进制造业的细分行业仍然没有一个科学、权威的界定。学者们主要采用综合指标体系,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测度对先进制造业细分行业进行界定,如吴玉(2021)、牛颖超(2018)、郭巍(2010)等。然而,由于采用的指标体系不同,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往往存在差异。本文综合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参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21年第15号公告,选取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非金属矿物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医药”“化学纤维”“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仪器仪表”这9类细分领域对先进制造业进行重点分析。

知识产权既能够反映产业技术特点和发展趋势,又能够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根据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高达70%~80%的发明创造通过专利文献进行公开,专利文献涵盖全球90%以上的前沿科技情报,能够较高程度地反映产业创新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技术文献、专利文献是知识产权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能够体现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的特征,具有时效性、客观性等特点,且在全球具有较为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知识产权通过明确创新成果的权属、保护创新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创新成果安全、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技术市场的健康发展,能够有效激励市场主体的创新热情,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先进制造业基本上都属于专利密集型产业,知识产权既能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又能够反映先进制造业的技术特点和发展趋势,因此,从知识产权视角分析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十分必要,也具有可行性、科学性。

一、武汉市先进制造业知识产权现状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文针对先进制造产业领域进行相关研究,专利数据来源于全球产业科技情报分析系统,依据前文对于先进制造业的界定,选取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非金属矿物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医药”“化学纤维”“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仪器仪表”这9个行业数据作为先进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本文的专利检索时间范围为2014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检索截止时间为2024年1月31日。拟定先进制造产业专利检索表达式为:NEC:(27 OR 28 OR 30 OR 34 OR 35 OR 37 OR 38 OR 39 OR 40)。

(二)专利申请趋势

通过对武汉市先进制造产业专利申请量进行分析,可了解武汉市先进制造业技术发展趋势和变化情况(如图1)。专利申请趋势方面,2014—2016年,武汉市先进制造业专利申请量逐年增加,同比增长率稳中有升,说明该段时期内,武汉市先进制造业尚处于萌芽期;2017—2019年,专利申请量增幅较小,同比增长率波动较大,武汉市先进制造业进入震荡期;2020年以后,整体专利申请数量较高,在2021年达到峰值79841件,2022年专利申请量与2021年基本持平,2023年专利数据受专利申请公开时间滞后性影响较大,但2020—2022年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率呈直线下降趋势,2022年出现近10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同比增长率仅为-0.07%,说明武汉市先进制造业已步入发展成熟期。



图1 2014—2023年武汉市先进制造业专利申请趋势

(三)技术构成分析

为了更清楚准确地分析武汉市先进制造业专利申请情况,基于先进制造业在国民经济行业中的主要九大技术领域分类,对2014—2023年武汉市先进制造业各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数量进行统计分析(如图2)。从先进制造业九大技术领域专利申请量来看,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制造业是武汉市先进制造业中的优势领域,位列第一梯队,申请量均在14万件以上,远超其他领域;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获得了较多关注,位列第二梯队,平均申请量为106486件;其余四个技术领域的申请量与前者存在较大差距,位列第三梯队,其中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制造业等是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分支,也是武汉市“965”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近10年武汉市医药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领域的专利申请量仅分别为21943件和18839件,说明武汉市在这两个技术分支上的发展较为滞后,与整体产业规划布局存在较大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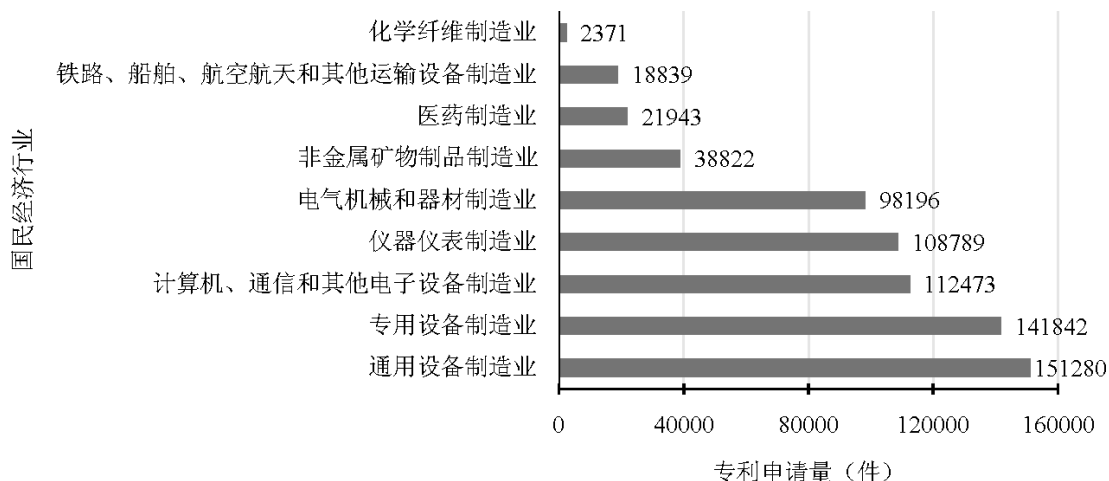


图2 2014—2023年武汉市先进制造业专利申请技术领域分布状况

(四) 武汉与主要城市部分先进制造业专利情况比较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比较武汉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和创新活力均较为强劲的4个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4个新一线城市(南京、杭州、成都、武汉)2022年先进制造业主要技术分支专利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从前述三个梯队中分别选取一个技术领域,与其他7个城市进行横向比较。

1. 通用设备制造业

在通用设备制造业细分领域,2022年各城市的专利情况如表1所示。整体而言,北京和深圳在通用设备制造业表现较优。武汉通用设备制造业领域的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有效发明专利量和PCT申请量排名中等偏后,PCT授权量排名中等靠前,仅次于北京和深圳。

表1 2022年各城市在通用设备制造业领域的专利情况

单位:件

城市	专利申请量	专利授权量	有效发明专利量	PCT申请量	PCT授权量
武汉	24694	23981	19671	20	474
北京	42129	36222	69402	70	1350
上海	50153	50546	44039	33	407
广州	31355	33521	20662	14	102
深圳	60373	59415	38795	192	797
南京	22085	21516	18027	23	85
杭州	33238	30977	25596	21	179
成都	20177	20073	14014	15	139

2. 仪器仪表制造业

在仪器仪表制造业细分领域,2022年各城市的专利情况如表2所示。整体而言,深圳、北京和上海在仪器仪表制造业优势明显,武汉仪器仪表制造业领域的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有效发明专利量和PCT申请量在8个城市中均排名中等靠后,PCT授权量排名中等。

表2 2022年各城市在仪器仪表制造业领域的专利情况

单位:件

城市	专利申请量	专利授权量	有效发明专利量	PCT申请量	PCT授权量
武汉	16720	13221	18330	44	632
北京	45558	31998	103597	249	3154
上海	28728	22580	40954	182	906
广州	18998	14318	17304	57	261
深圳	46867	35821	82201	765	4814
南京	16440	13190	20023	63	231
杭州	18512	13444	19772	91	392
成都	14114	10850	15562	34	214

3. 医药制造业

在医药制造业细分领域,2022 年各城市的专利情况如表 3 所示。北京和上海在医药制造业的专利整体情况表现较优,武汉医药制造业领域的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和有效发明专利量在 8 个城市中均排名中等偏后,PCT 申请量和 PCT 授权量排名末位。

表 3 2022 年各城市在医药制造业领域的专利情况

单位:件

城市	专利申请量	专利授权量	有效发明专利量	PCT 申请量	PCT 授权量
武汉	2798	1615	5462	12	32
北京	8001	5437	23544	77	356
上海	5977	3492	13458	182	460
广州	6435	3230	11509	31	83
深圳	2812	1454	4379	39	153
南京	4022	2442	8539	53	154
杭州	3787	1926	6927	44	85
成都	2630	1383	5159	48	63

二、武汉先进制造业在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先进制造业专利数量较少

专利数量是产业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较为客观的指标,只有以一定的数量为基础,再去谈专利质量才有意义。武汉先进制造业专利授权量和有效发明专利量都与同类城市存在差距,以通用设备制造业为例,有效发明专利量约为深圳的一半,有效发明专利量不足与产业整体竞争优势和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有一定关系。

(二)先进制造业龙头企业竞争力存在差距

武汉缺少有效发明专利量过万件的龙头企业,一方面与历史有关,武汉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存在先天劣势;另一方面与对专利等知识产权重要性的认识不够有关。

(三)海外专利布局与先进城市存在差距

PCT 国际专利申请是先进制造业企业进行海外专利布局的重要形式,2019—2022 年,武汉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分别为 1825 件、1389 件、1566 件、1070 件,数量在 1000 ~ 2000 件之间徘徊,2022 年申请量排在深圳(15892 件)、杭州(2305 件)、广州(1869 件)之后,特别是与深圳差距较大。以仪器仪表制造业为例,2022 年武汉仪器仪表制造业领域 PCT 申请量仅为 44 件,在对比的 8 个城市中位列第七,仅为排名第一的深圳的 5.75%。

(四)先进制造业专利转化运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如前文所述,武汉先进制造业科研实力较强,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代表的一大批创新主体申请了大量专利,相当一部分专利属于先进制造业领域。但是,从专利转化运用数据来看,情况不容乐观。2023年,武汉地区高校和科研机构转让专利占专利授权总量的比例不足10%,相当一部分专利未发挥其应有作用。

(五)高价值专利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撑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高价值专利承载着先进制造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对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代表的一批高端研发机构和一批大科学装置建设单位产出了大量先进制造业相关专利。然而,武汉地区大科学装置(即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数量与北京、上海还有所差距,公开资料显示,上海张江科学城,已建、在建和规划大科学装置达到12个,武汉已建、在建和规划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计10个,与上海有所差距,与之相对应的是高价值专利数量也相对较少,其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撑稍显不足。

三、知识产权视角下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

(一)加强知识产权创造,激活先进制造业发展引擎

加快建设一批先进制造业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全面落实《武汉市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建设方案》。实施“卡脖子”技术专利突破工程,针对车规级芯片、智能传感器等先进制造业产业核心技术短板,整合各类创新资源,着力推动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重点突破一批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零部件、基础软件和高端实验仪器、高端试验设备等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高价值专利。推进专利与技术标准有机融合。引导先进制造业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各类标准的制定和修订,提升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融合发展水平。鼓励企业将专利技术转化为国际、国家、行业、地方或团体标准,培育一批知识产权与标准有机融合的示范企业。

加强先进制造业知识产权创造。鼓励、支持和引导先进制造业企业加强自主创新,不断延伸创新链,完善产业链。特别是鼓励先进制造业龙头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持续开展创新活动,不断强化知识产权竞争优势。发挥武汉地区高校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研发优势,持续稳定支持具有比较优势的先进制造业相关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强源头知识产权创造。发挥国家信息光子创新中心和国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的“国家队”作用,利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武汉的优势条件,激发知识产权创造活力。

(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我市先进制造业保驾护航

发挥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平台优势。完善全市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进一步强化武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武汉(汽车及零部件)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等国家级平台的功能,让服务惠及更多先进制造业创新主体。优化基层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布局,强化工作站保护职能,面向先进制造业创新主体开展全

方位知识产权服务。推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以及仲裁机构建立有机衔接、高效快捷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加强先进制造业海外专利布局。一是充分发挥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武汉分中心作用。以该中心为纽带,聚集一批高端服务机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专家,“一企一策”助力武汉市先进制造业企业解决海外专利布局难题。二是分类施策引导先进制造业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对PCT专利布局相对较好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业等领域要继续加大扶持力度,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围绕医药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及化学纤维制造业等产业领域开展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培育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科技成果,鼓励相关企业开展海外专利布局,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打造知识产权盔甲。

(三)加强知识产权运用与转化,提高“纸变钱”能力

增强先进制造业知识产权运营能力。加强知识产权运营机构和平台建设。支持国家光电子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武汉)高校服务平台等知识产权运营平台深度挖掘先进制造业企业需求,完善武汉市先进制造业知识产权运营需求库,建立专利常态化供需对接机制,促进企业精准获取并高效实施专利技术。

进一步推动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落实财政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深化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的最新精神,推动商业银行落实单列信贷计划和放宽不良率考核等政策,丰富知识产权质押物范围,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模。充分利用知识产权大数据平台帮助银行深入了解先进制造业行业和企业现状,更科学地评估质押专利的价值,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

(四)集中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协同发展合力

引进培育龙头企业。武汉先进制造业龙头企业数量与深圳、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一方面构建形成省级统筹、部门协调、市区联动的协调运行体系,做好顶层谋划、统筹推进,由省市市政府牵头,经信、科技、金融、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形成工作合力,完善支撑先进制造业发展政策体系的同时为先进制造业企业培育构筑良好营商环境生态;另一方面应加强对龙头企业的引进和培育,特别是制造业产业链“链主”企业。借鉴大湾区成功经验,发挥链主企业“头雁”效应,以数智化手段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鼓励龙头企业牵头进行技术提升标准制定工作,发挥产业集群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发展,推动更多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转型升级,构建“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的梯次市场结构,夯实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基础。

持续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化发展。在巩固发展两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推动更多制造业细分领域集群化发展。不断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和支持制造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完善制造业集群创新发展各类基础设施,为产业集群化发展打造更加适宜创新的硬件环境。打破创新要素资源流动壁垒,鼓励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发挥武汉东湖高新区“光谷”、经开区“车谷”、新洲区“星谷”、东西湖区“网谷”四大高端产业集群优势,加强“四谷”联动,形成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新动能。

进一步优化武汉市先进制造业产业结构。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有关精神,结

合武汉实际,制定武汉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意见,引导武汉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数字化赋能抢占先进制造业发展“智高点”,加速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推进数字产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提升企业在设计、生产、管理和服务等各环节的智能化水平,夯实智能硬件及装备、工业软件及应用、网络设施及安全等基础支撑。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加强专利密集型产业发展,认定一批专利密集型产品,以知识产权赋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基金项目:2023 年武汉市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武汉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基于专利视角”(项目编号:2023046)。

武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课题组成员:

张柳,武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知识产权相关研究;
黄菲,武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中级经济师,主要从事专利导航及信息利用相关研究;
吴丹,武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中级经济师,主要从事专利导航及信息利用相关研究;
李蕾,武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中级经济师,主要从事知识产权相关研究;
肖露,武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中级经济师,主要从事知识产权相关研究;
陈良,武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职员,主要从事知识产权相关研究;
余永红,武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知识产权相关研究。

(责任编辑:周阳)

武汉网络直播发展现状 及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刘靖 陈强

摘要:网络直播对于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某些直播行为也存在虚假宣传、诱导打赏、逃税漏税、网络暴力等问题。在系统梳理我国网络直播发展历程、总体规模、主播特点、平台分布和运作方式的基础上,本文重点考察武汉市网络直播发展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其规范发展路径提出意见建议,包括建设规范的行业法治环境、营造良好的行业竞争氛围、拓展新兴的行业细分领域、鼓励前沿的行业技术创新等。

关键词:网络直播;现状;问题;治理

近年来,网络直播快速发展扩展了网民的信息获取渠道,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因行业准入门槛较低、群体法律意识淡薄、利益驱使型导向、行业标准尚不健全、平台和政府监管存在漏洞等原因,直播内容低俗恶俗、网络暴力、偷漏税、诱导未成年人打赏、恶意营销等违法违规问题层出不穷,给社会公共治理带来极大挑战。本文将分析武汉网络直播行业发展现状及问题,为监管部门提供治理对策建议,助力武汉网络直播行业在规范中高质量发展。

一、我国网络直播的发展现状

(一)网络直播发展历程

我国网络直播始于2005年,以9158、YY直播为代表的平台率先开创PC端语音、视频聊天业务,随后衍生出公会模式,在流水线模式下批量生产“网红”,网络主播应运而生。

2014年后,手游产业的爆发、电竞赛事的发展,为移动直播和游戏直播的兴起准备好内容土壤,斗鱼、虎牙、熊猫直播、企鹅电竞等定位明确的游戏直播平台高速发展,出现以游戏比赛、解说和游戏技巧分享等为直播内容的游戏主播,并逐渐成为网络主播中的重要群体。

2016年,直播行业出现井喷式发展。移动直播客户端大量涌现,全国在线直播平台数量超过200家,

虎牙、花椒、映客等直播平台发展成熟,购物领域的淘宝直播也在这一年上线。2017年后,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开始兴起,短视频平台直播开始流行。

2019年后,网络直播行业发展迅速,与各行各业不断融合,进入全面推动社会创新发展的网络直播3.0时代。自2018年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各大短视频平台布局直播带货后,电商直播快速发展,尤其是疫情防控期间线下购物受到冲击,电商直播进入爆发期。后疫情时代,电商直播爆发式增长为“直播+”模式盛行打下了坚实基础,推动直播行业与其他行业进一步融合,网络主播也从原来的“网红”到涵盖社会不同身份的多元群体。

2023年以来,人工智能进步使虚拟主播走向大众。得益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的进步,数字人虚拟主播成为网络直播界的重要“成员”,在新闻播报、游戏解说、电商直播等领域大展身手,虚拟主播广泛应用。

(二)网络直播总体规模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8.16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6501万人,占网民整体的74.7%。其中,电商直播用户规模为5.97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8267万人,占网民整体的54.7%;游戏直播用户规模为2.97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3133万人,占网民整体的27.2%;真人秀直播用户规模为2.00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1259万人,占网民整体的18.3%;演唱会直播用户规模为2.23亿人,较2022年12月增加1596万人,占网民整体的20.4%;体育直播用户规模为3.45亿人,较2022年12月减少2847万人,占网民整体的31.6%。

庞大的用户规模为网络主播提供广阔的市场沃土。《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2—2023)》显示,截至2022年末,我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主播账号累计开通超1.5亿个,当年新增开播账号1032万个,同比增长7.1%。主播群体呈现高学历化、年轻化、职业化趋势。性别结构上,男性主播占52.2%,女性主播占47.8%;年龄分布上,18~29岁年龄段的主播最多,占全部主播的64.2%;收入结构上,以直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主播中,月收入5000元以下占比九成以上,月收入10万以上的头部主播占0.4%。

(三)网络直播行业发展的作用及意义

网络直播行业发展拉动电商、文旅等消费活动效应明显,有效推动行业数字化、规模化发展。《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71.2%的用户因观看短视频/直播购买过商品,40.3%的用户认同“短视频/直播已成为我的主要消费渠道”,27.9%的用户“会因为看短视频/直播去某地旅游”。

在促进传统品牌营销方面,传统厂商通过“企业直播”形式降低获客成本,重新焕发出活力与生机。2023年9月,某头部主播直播“翻车”后,传统国货品牌抓住机遇,直播间抱团营销走红网络。蜂花直播间9月13日单日涨粉48.6万,莲花、鸿星尔克、白象等直播间销售额飙升,郁美净、精心、活力28等品牌也迅速搭车创立直播间。

在促进商贸流通方面,根据商务大数据监测,2023年前10个月,我国直播销售额超2.2万亿元,同比增长58.9%,占网络零售额的18.1%,拉动网零增长7.5个百分点。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型商业模式,直播带货强势崛起,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道独特风景。

在促进文旅活动方面,《抖音生活服务 2023 年度数据报告》显示,2023 年,直播持续拉动下单热情。抖音生活服务直播交易额增长 5.7 倍,产生交易的直播量提升 4 倍。商家自播覆盖率达 59%,自播交易额增长 4.45 倍。其中,文旅类团购消费数据显示,开启旅行的用户增加了 1.3 倍。直播平台正在成为文旅活动新的传播渠道,助推行业整体发展。

(四)网络直播发展趋势

一是内容垂直化、主播背景多元化趋势。直播内容越来越聚焦单一,可分为娱乐主播(即秀场主播,展示音乐、舞蹈、表演等才艺)、电商主播、顾问主播(如法律咨询、情感咨询、心理指导等)、美妆时尚主播、游戏主播、体育主播、旅游主播、知识达人等。以签约形式分,网络主播可分为平台独家主播、公会家族主播、独立主播等。从主播背景看,呈现多元化趋势,包括网红明星、厂家商家、专业机构乃至普罗大众等。

二是网络直播呈现“去头部化”趋势。近年来,各大直播平台陆续推出“去头部化”政策,致力培育达人和商家自播,弱化头部主播的私域流量,并将头部流量分给更多腰部主播。在平台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品牌方投入店播,已成为电商领域关键的主播培育力量。艾瑞数据显示,2023 年企业自播成交额占比攀升至 49.8%。业内认为,主播“去头部化”似乎已成为品牌和平台一致的目标。

三是“虚拟主播”快速成长为不可忽视的力量。艾媒咨询发布的《2023 年中国虚拟主播行业研究报告》指出,2022 年中国虚拟人带动产业市场规模和核心市场规模分别为 1866.1 亿元和 120.8 亿元,预计 2025 年分别达到 6402.7 亿元和 480.6 亿元,呈现强劲的增长态势。伴随 2022 年以来 ChatGPT、Claude、文心一言等 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布,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生成技术与虚拟人结合已成为现实,虚拟主播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例如在直播带货领域可帮助实现 24 小时无障碍客户沟通。报告显示,虚拟主播行业存在较大的商业空间,包括销售衍生品周边、品牌代言、作品打赏、直播带货等。

(五)网络直播平台分布和城市竞争

直播平台可分为综合性直播平台,如抖音、快手、微博、微信视频号、哔哩哔哩等;秀场类直播平台,如花椒、映客、秀色等;商务类直播平台,最具代表性的是淘宝直播,抖音、快手等也上线了电商直播功能;教育类直播平台,较有代表性的是腾讯课堂、荔枝微课、猿辅导等。截至 2022 年 6 月,全国网络直播平台已达到 270 家;其中,中头部直播平台约 20 家,包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YY 直播、映客、陌陌等;快手、挚文集团、欢聚集团、斗鱼、虎牙、哔哩哔哩、荔枝等 11 家平台企业已上市。艾媒咨询数据显示,直播用户最常使用的电商直播平台是抖音、淘宝和快手;电竞直播平台是虎牙、斗鱼;YY 直播、花椒是用户最常使用的娱乐直播平台。网络直播活跃用户头部平台聚集效应明显。《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斗鱼、虎牙、YY 三家平台用户渗透率达到 74.2%,花椒、映客用户渗透率为 9%,其他平台为 16.8%。

《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2—2023)》显示,近年来,广州、杭州、深圳、成都、重庆、济南等城市纷纷打出旗号,要占据电商行业的高地,打造“直播经济总部基地”。深圳市商务局于 2023 年 3 月制定了《深圳市推进直播电商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 年)》;北京市商务局于 2023 年提出“鼓励企业打造北京特色直播活动”,并特别支持应用元宇宙等新技术,以及文创、“非遗”等文化内容型直播带货活动;杭州于 2022 年 6 月聚焦“新电商高质量发展”出台新规。

淘宝公布的2022年度产业带百强榜显示,“百强产业带”主要分布在19个省级行政区,重点是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等有较好产业基础的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广州女装、佛山家具、义乌小商品、海宁皮革、南通家纺、常熟服饰、湖州童装、泉州男士精品、深圳水贝珠宝和武汉汉正街服饰等产业带入选前十强。

数据显示,杭州现有近5万名主播,直播相关企业注册量超5000家,数量为全国第一,带动就业超100万人,主播带货成交额排名第一,主播人均带货金额远超其他区域。《广州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3)》指出,广州数字服务新业态蓬勃发展,全国直播电商百强广州独占9位,数量位居全国第一,网络零售店铺数、直播场次、主播数量均位居全国第一。

(六)网络直播运作方式

网络直播是一个集内容创作、粉丝互动和商业变现的系统性过程。典型运作方式包括单打独斗、公会扶持、MCN(Multi-Channel Network,直译为多频道网络,即为网红和自媒体提供内容策划制作、宣传推广、粉丝管理、签约代理等各类服务的实体或组织)运营、品牌自营等模式。值得一提的是,MCN机构越来越受欢迎,在资本有力支持下,通过提供专业指导、系列化场景支持、丰富的商业资源等,助力主播涨粉、避坑以及资源对接,最终实现商务变现。盈利模式方面,网络主播可与平台、品牌方直接建立联系,通过提供直播服务获取劳务收入或销售返佣;也可通过签约MCN机构获取商单提成;还可与品牌达成商务合作,直接收取广告费。在日常直播中,通过直播活动获取粉丝打赏仍是重要模式;部分知识型主播通过开设线上课程等方式获取收入。总体而言,当前网络主播、直播平台、MCN、品牌方、用户之间的关系(见图1)日趋复杂,价值传递路径呈现多样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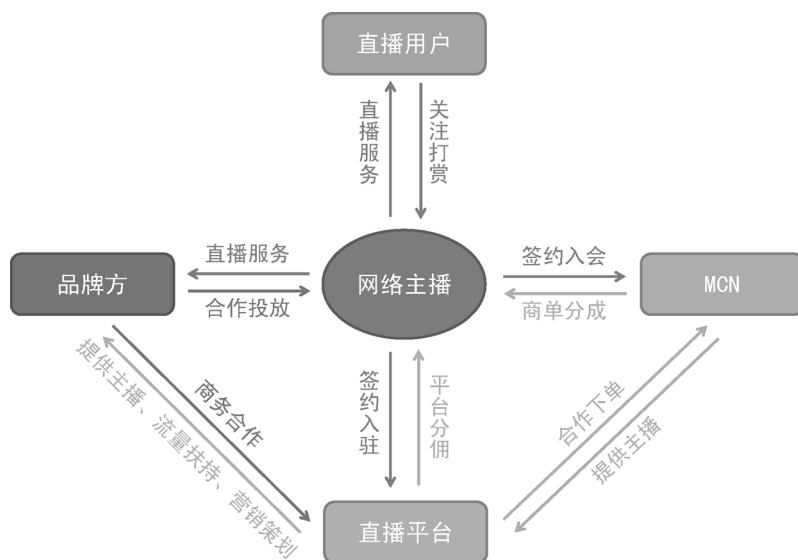


图1 网络直播产业链路(以网络主播为中心)

二、武汉市网络直播的发展情况

(一)武汉市网络直播发展的总体情况

随着互联网及科技企业不断下沉,数字服务设施不断改善,数字应用基础服务愈加丰富,网络直播正

在成为武汉市民新的娱乐方式。根据《2022年武汉市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年12月,武汉市网络直播的用户使用率为77.7%,较2021年增长7.8个百分点,呈逐年增长趋势,较全国平均水平高7.4个百分点。

相对于杭州等头部地区,武汉直播行业发展在企业数量、从业人员数量等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根据武汉市商务局统计,武汉市目前拥有涉及电商直播业务企业近2000家,从业人员超过20万人。其中,淘宝、抖音、快手三大直播平台主播数2.2万人,同比增长109%。2023年3月,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市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实施意见》提出,推动电商直播集聚区建设,培育10个以上电商直播基地。目前,武汉最大的服贸产业直播基地——云尚,直播产业规模已经突破百亿元。

(二)武汉市网络直播细分领域的发展情况

网络直播行业在武汉已成为平台经济领域的中流砥柱,行业格局稳固,主体参与多元,市场脉络细分。伴随着平台业务延伸,产业链更完善,直播平台已成为跨界融合的重要载体,不断推进着生产、流通领域的技术迭代和商业生态重构,与各行各业共融共生。直播电商、直播教育、直播游戏、慢直播等领域释放出强烈动能。

一是直播电商。直播电商平台包括抖音电商、快手电商、淘宝直播、东方甄选等。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这十年:2012—2022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数据报告》指出,直播电商2018年增长率高达589.46%,2019年、2020年增长率分别为227.7%、136.61%,依旧保持三位数的增速,6年来增长23418.7亿元。作为中国最大的服装服饰生产制造与销售基地,武汉正以直播电商为突破口,打造汉派服装产业直播电商生态体系。武汉云尚直播电商集聚区规划总建筑面积32900平方米,已入驻了400余家直播产业链上下游商户,直播电商配套服务区面积达到19100平方米,拥有直播间265个。

二是直播教育。直播教育是直播服务的一种,指利用直播技术,将教育内容通过在线直播的方式传递给学生。这种模式具有实时性、互动性和高度参与感等特点,可以让学生在第一时间获取知识,同时也能让他们在互动过程中更好地理解 and 掌握知识。武汉江河纵横、湖港交织,夏季防溺水教育普及尤为重要。2023年8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汉市教育局、湖北广电长江云联合推出“夏日安全计划 守护少年的你——武汉少年警队防溺水课堂”直播活动。每到开学季,各类开学第一课陆续播出。每年央视9月1日会播出《开学第一课》,武汉历年都会策划《健康第一课》,2023年武汉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还推出了《家长“开学第一课”》。特殊时期,也可以采取线上教学的方式保障学生的学习进程。

三是直播游戏。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电竞比赛的兴起,游戏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游戏直播吸引力越来越强。通过游戏直播,玩家可以参与互动,学习游戏技巧,分享游戏乐趣。武汉电竞产业发展迅速,电竞人口排名全国第七、职业电竞选手输出量全国第二,《武汉市文化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11次提及“电竞”。2018年的武汉斗鱼直播节吸引了52.18万人次参与到直播的狂欢派对中。2024年2月,光谷国际新文化电竞中心项目C地块电竞场馆封顶,这是华中地区唯一的最大、最专业B级多功能电竞场馆,建成投用后,将加速武汉电竞产业发展,助推游戏直播市场的蓬勃发展。

四是慢直播。慢直播是一种没有主持人的直播报道,即拍即播、无人为干预、自然态记录,以陪伴性、交互性、自然态、长时段为主要特点。2020年1月24日,央视频开启对武汉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建造过程的慢直播,截至2月3日,超9000万网友在央视频多路慢直播中争当“云监工”。3月13日,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首创AI移动慢直播报道武汉东湖樱花,直播无人机以第一视角带观众看樱花,提供了

身临其境的观赏体验。播出一天时间内,在人民日报客户端和微博的浏览量就超过1000万,点赞量超过27万。其后,东湖樱花慢直播成为武汉樱花季期间的例行“云赏樱”活动品牌,让游客可以足不出户线上欣赏春天的美景。

三、网络直播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网络直播向各领域渗透,“娱乐无底线”现象屡见不鲜,违规直播层出不穷,生产低俗内容、故意找茬碰瓷、虚假宣传、诱导打赏、逃税漏税、网络暴力等相关问题也日益凸显。

(一)受“流量至上”价值观驱动,生产低俗内容、故意找茬碰瓷等行为屡禁不止

由于从业人员教育层次、职业素养、道德水准良莠不齐,受“流量至上”“金钱至上”等价值观诱导,不少主播不惜用低俗、违法、不道德的手段参与直播,或伪造“人设”,把自己包装成身价数十亿的女总裁、富二代等博取眼球;或无底线炒作,刻意展示带有性暗示或性挑逗动作,发布软色情、擦边、泛黄内容,直播逐臭审丑、自虐自残、虐待动物等;或“谁红拍谁,谁红蹭谁”,更有造谣传谣、寻衅滋事乃至线下约架,不断突破法律红线、挑战道德底线和公序良俗,不仅损害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也对社会风气造成负面影响。2023年4月,为博关注,武汉一名男主播先后三次将“直播奔现女网友”当作“流量密码”进行直播,被武汉东湖高新警方刑事拘留,该案也是武汉首例“利用网络直播寻衅滋事”案件。2024年3月,一无臂男子在武汉乘坐地铁时被工作人员要求出示残疾证的视频引发网民广泛关注。3月23日,该男子开启网络直播,直播橱窗中显示有货品,加上疑似在现场的网友称其有同行人员陪同并摄像,部分网民质疑其行为是“摆拍找茬”“博流量直播带货”。主播职业门槛低,权责界限不明晰;受众猎奇心理刺激低俗趣味内容生产;商家逐利本性,直播市场恶劣竞争;等等,是造成网络直播乱象且屡禁不止的主要成因。

(二)直播带货滋生虚假宣传等问题,侵犯消费者权益

电商直播领域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欺诈消费者等销售乱象频现,首要责任人非带货主播莫属,与其选品把关不严、自身法律意识不强、不自律有关。2023年8月《消费者报道》调研数据显示,约53.5%的受访者表示,其在直播购物中遇到过产品质量问题;约30%的受访者分别遇到品牌商品真伪、主播推荐产品不靠谱、主播承诺的赠品未如实发货等问题。仅11.1%的受访者在直播购物中没有遇到问题。中消协同月发布的《2023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显示,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消费者投诉热点问题主要涉及直播平台等行业和领域。其中,视频直播平台投诉多发,存在主播采取短视频“低价引流”、销售珠宝骗局或随意虚构夸大商品原价等现象。武汉一“网红”自2017年起,通过贴标销售假冒服装3万余件,涉案金额达1545万元,在2022年“双11”购物节当天直播时,被民警上门带走,当场抓获。电商直播乱象无疑破坏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和消费环境,既损害消费者权益,也危害直播电商的诚信基础,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三)鼓动低龄打赏、大额打赏,造成诸多社会矛盾

网络直播打赏存在网民打赏低龄化、打赏金额大额化以及主播违法诱导打赏等诸多问题,腾讯研究

院2021年发布的《网络直播打赏的法律定性之探讨》显示,近5年有关网络直播打赏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已多达600余件,且呈现不断增长态势。“天价打赏”“未成年打赏”“天津女粉丝挪用360万公款打赏主播”“54岁阿姨打赏男主播,给女儿留下200万负债”等新闻层出不穷,其中不少与不良主播忽悠诱导甚至欺诈打赏有关。2023年11月,武汉一男子为当“榜一大哥”挪用公款打赏100余万元。有学者认为,直播打赏属于一种网络行乞行为,通过衣着暴露表演、诱导就能日入上千甚至上万,会让年轻人萌发不劳而获的浮躁思想,对社会价值观的形成造成扭曲。同时,近年还衍生出网络主播参与洗钱,在收到巨额打赏后批量返款等方式洗白资金的违法行为。

(四)逃税漏税侵蚀国家财政收入、破坏社会经济秩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淘宝直播联合发布的《2022直播电商白皮书》显示,估计2022年全网直播电商的GMV(Gross Merchandise Volume,商品交易总额)为3.5万亿元左右,占全部电商零售额的23%左右。在巨大的市场利益的驱动下,逃税漏税乱象丛生,部分“网红”主播偷逃税手段五花八门,通过成立“掩护”公司隐匿个人收入、改变收入性质等方式偷逃税款,数额之大触目惊心。如某知名带货主播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2021年12月23日,湖北省税务局官网向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纳税人发布通告称,依法纳税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等社会公众人物,更要严格遵守税法规定。艾媒咨询报告显示,头部主播已迈入高收入群体行列,若放任其偷税漏税,很可能会形成“羊群效应”,造成国家税收大量流失,也危及行业良性生态。

(五)主播既是网络暴力受害者,又是网络暴力参与者

网络暴力问题在网络直播中较为突出,主播既可能是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也可能是网络暴力的施暴者。一方面,部分网络主播因直播言论、动作、样貌、穿着、带货商品质量等问题,遭遇自发或有组织有目的的谩骂攻击、诽谤、电话私信骚扰、恶意举报、“人肉开盒”等。网络主播不堪人身攻击而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典型案例如山东37岁网红“管管”因网暴喝农药致死,“挖呀挖”黄老师也曾遭遇网暴。另一方面,部分网络主播为博人眼球、吸粉引流、非法牟利,长期恶意辱骂、造谣诽谤、恐吓其他网络主播或网络用户,引发大量网民围观,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受害人声誉。典型案例如15岁寻亲少年刘学州被网暴自杀,这一事件发生后,被起诉的网暴者就包括网络主播。

四、规范网络直播行业发展的路径

(一)建设规范的行业法治环境

严格监管和规范化引导网络直播行业,清理网络直播平台低俗、不良内容,提升网络直播内容质量。2016年以来,《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视频直播购物运营和服务基本规范》《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营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平台游戏直播管理的通知》《网络主播行为规范》等规定相继出台,为网络主播从业行为划定了底线和红线。新规出台后,不少武汉本土的直播运营公司,也对旗下主播进行了培训和指导。中央网信办2022年开展“清

朗·整治网络直播、短视频领域乱象”专项行动,2023 年开展“清朗·网络戾气整治”专项行动,2024 年开展“清朗·网络直播领域虚假和低俗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维护良好直播生态。建议创新规范管理方式方法,健全网络直播综合治理体系,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扎牢直播生态治理防线,加强行业警示教育,坚决打击网络直播行业违法违规行为,建设健康规范的行业法治环境。

(二)营造良好的行业竞争氛围

鼓励成立网络直播行业协会等组织,制定相应的行业自律规范,完善职业准则,规范行业行为,以适当、有效的手段整肃行业不良行为,提高网络直播行业的整体素质水平。2023 年 2 月 23 日,武汉市互联网直播协会成立,助推武汉直播企业抱团发展、规范发展。加强与网络直播行业机构的联络和沟通,组织开展业务交流、业务培训,不断做大做强全市直播产业的“蛋糕”,建立和维护秩序良好的网络直播市场,共筑清朗网络空间,传递社会正能量。2023 年 12 月 14 日,武汉首届直播电商节开幕,打造“档口+直播间”“工厂+直播间”的直播电商新路径。建议进一步强化主播行为规范引导,引导平台、MCN/公会、主播、用户等参与者自觉守法,构建健康向上的直播环境,从源头上杜绝网络直播乱象发生,营造良好的行业竞争氛围。

(三)拓展新兴的行业细分领域

探索多领域、多行业、多场景直播,实现差异化竞争,提升网络直播带货效率。直播平台在“直播+特色产业”“直播+网红经济”“直播+跨境电商”“直播+乡村助农”“直播+文化旅游”“直播+餐饮”“直播+体育”等领域具有极其可观的应用前景。如武汉黄陂、新洲、江夏等地,采用“线上卖货+线下采摘”的模式,走进田间地头现场直播,打开农产品销路,助力乡村振兴;“直播大武汉”从武昌粮道街开始到黄鹤楼结束的 12 小时不间断直播吸引了 50 万网友观看;董明珠知音号沉浸式直播带货武汉特色旅游产品,感受武汉文化;武汉马拉松采用 5.5G 网络技术进行赛事直播,网友“零时差”为跑友加油;等等,都是在新兴直播领域的实践。

(四)鼓励前沿的行业技术创新

监管方面,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可以积极引进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用科技提升监管能力,通过加大算法审核投入及时发现不良直播行为等,充分利用科技提升治网管网能力,助力网络直播行业规范化发展。支持直播企业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规范直播平台,对异常流量增长进行重点监控;运用大数据等方法,精准识别敏感内容;基于多维数据的直播效果综合评估,动态把握直播内容传播效果与舆论反馈,通过这些技术手段从源头把控直播内容。内容方面,鼓励平台通过引入流媒体等技术手段,增强用户沉浸感,并提供更为精准的内容推荐算法,持续优化用户体验,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提升服务质量。

作者简介:

刘靖,武汉市互联网舆情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互联网、网络舆情、网络传播、网络空间安全。

陈强,武汉市互联网舆情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为互联网生态、网络舆情、网络传播、网络空间安全、互联网经济。

(责任编辑:王俊)

“AI大模型+政务”的现状、趋势与思考

孟庆国

摘要: AI大模型在政府决策方面具有巨大潜力,能够处理复杂的推理任务,在政府审批流程优化、监管和企业发展服务等方面发挥应用价值。将AI大模型与垂直领域政务知识库相结合,并进行模型训练,能够形成适用于多场景的政务决策模型。本文梳理了国内外“AI大模型+政务”建设应用情况,归纳了“AI大模型+政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围绕政务数据和应用场景提出了建设启示,并从需求响应、算力统筹、生态体系构建等方面提出了发展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 AI大模型;电子政务;数字政府

首先,本文作者将对国家的相关政策制定中的数字政府内容进行梳理。国家围绕数字中国和数字政府的建设出台了一些文件,构成了国家数字化战略的核心内容。《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政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明显提升,数字文化建设跃上新台阶,数字社会精准化普惠化便捷化取得显著成效”。《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政府履职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取得重要进展”。

随着AI大模型带来智能处理信息能力的巨大提升,在AI大模型时代讨论政府决策与传统的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决策和基于逻辑推理人工智能决策形成极大差别。AI大模型能理解和生成类人类的文本、图像、音频、视频。以Sora为例,Sora看起来是图像和视频的生成器,但实际上Sora是世界模拟器,是对社会底层运作的规律进行把握后的推理过程。AI大模型的技术价值和关键还在于它能处理复杂的推理任务,具有多语言能力,能从大量数据中进行最小监督的学习。

AI大模型为政府决策智能化升级提供技术可能性。大模型在政府审批流程优化、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企业发展服务等领域具有显著可预见的应用价值,展示了良好前景。

AI大模型如何来赋能未来决策?通过结合AI大模型与垂直领域政务知识库,并做训练微调,就能够形成政务决策中的模型,用于政府决策各个场景。例如,中国知网基于盘古等通用大模型,融合专门知识做训练微调,形成不同于传统政务决策的工作工具和方法。

本报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国内外“AI大模型+政务”建设应用情况,第二部分是“AI大模型+政务”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部分是“AI大模型+政务”建设的启示,第四部分是“AI大模型+政务”发展思考与建议。

一、“AI 大模型+政务”建设应用情况

实践显示,大模型技术已经应用于政府内部办公、政务信息公开、政务服务提供、公共服务优化和国家安全等5个主要领域以及13个具体场景。在内部办公领域,大模型技术主要应用于知识检索、公文写作和政府信息提取,提供智能化的内部事务处理。在信息公开领域,大模型技术应用于公文撰写,通过大量的语料知识库生成政府运作所需的报告和日常公文。在政务服务领域,大模型技术应用于智能问答和12345热线应答服务等业务咨询。

国外在医疗、教育、交通和就业等公共服务优化领域也开始使用 ChatGPT 大模型技术,以提高效率和便利性。美国、新加坡和日本在基于 ChatGPT 的应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拥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和产业水平。在辅助政府内部办公领域,美国、日本在政务知识检索、政务信息提取和内部文书写作方面应用大模型技术。在信息公开领域,美国、日本在公开稿件的撰写和宣传资料制作方面引入大模型技术。在政务服务交互优化领域,各国都在努力提升政府的响应速度和服务质量。例如,各地都建立了12345热线,通过背后的模型算法提供更好的服务。各国都面临着如何更好地满足多样化需求的问题,大模型的支持可以提供更好的应对能力,减轻问答人员的负担。

本文接下来梳理国外“AI 大模型+政务”的典型案列。微软发布了 Azure OpenAI 服务,为政府客户提供 GPT-3、GPT-4、Embeddings 等服务,支持政府机构在聊天和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应用。美国国防部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开发并内部测试了针对公共合同撰写的生成式工具 Acqbot。新加坡政府开发“Pair 系统”,协助公务人员总结参考资料、搜索相关信息并完善写作表达。英国2023年底允许法官使用 ChatGPT 撰写法律裁决书,并发布了官方指南,提供了正确使用方法、潜在风险以及示例。2024年1月18日,英国中央数字与数据办公室(CDDO)发布了《英国政府生成式人工智能框架》。该框架解决了公务人员和受雇于政府组织的个人如何安全可靠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问题。2024年2月20日,加拿大政府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为联邦机构提供使用指导,以负责任和合规的方式提升业务效率和生产力,并确保公众利益。

我国在政务大模型应用方面进行了探索和部署。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在政务办公、公文写作、政务服务、智慧司法、智慧党建、城市管理和公共安全等领域进行了大模型试点应用。截至2023年11月,国内大模型厂商及高校院所共计推出238个10亿参数规模以上的大模型,其中有25个与政务大模型密切相关。同时,AI大模型相关政策密集出台,北京、广东、深圳、长三角和上海等地也在制定相关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主要是为了规范人工智能,特别是对于大模型在产业发展中的应用进行规定。实际上,在某些领域,我国的政务大模型比其他国家的政府在使用大模型方面更快,包括智能问答、智能搜索、精准的政策服务、市民热线智能受理、智能派单和交互智能政务办事、决策分析流程优化、政务文本识别分析和非结构化数据处理、舆情风险识别等。随着通用大模型数量的增长,应当采取收敛战略,在国家层面上引导大模型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形成由少数模型组成的生态系统。

牛津洞见发布的《2023年全球政府人工智能就绪指数评估报告》对2023年全球政府人工智能应用情况进行了排名。该指数由政府、技术部门、数据与基础设施3个支柱下的39个指标构成。报告显示,我国排在全球第16位,与领先国家存在差距。大模型的发展应用水平与国家的互联网、大数据和计算机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高,它在大模型方面不太可能超越其他国家。对于我国来

说,推进人工智能加速发展战略能够极大地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反之,经济社会的快速数字化转型也对政务大模型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双向赋能过程。

二、“AI 大模型+政务”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AI 大模型+政务”建设中的问题主要分为六个方面。

第一,政务大模型的训练与应用缺乏高质量数据,数据与知识治理基础较弱。国外模型能够把大模型训练好的原因是它有高质量的数据,而国内高质量数据很难获得。通常来讲,公共数据大部分储存在公共部门,但是公共部门面临数据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问题,尚未释放数据。如果只是基于互联网数据来训练模型,那么结果的偏差会非常大。

第二,政务大模型建设与训练中的算力资源重复投入,存在资源浪费现象。目前,国家算力基础设施存在分散化的问题,各个地区和科研院所纷纷抢滩建设算力中心。应当集中建设算力基础设施,发挥整合功能,解决重复投入的问题。

第三,大模型政务场景服务能力提升与数据供给安全之间存在矛盾,制约政务大模型发展。很多大模型是基于国外开源平台做起来的,在这些平台上训练自有数据将带来安全风险问题。应当以我国自有平台为基础,在自有的大模型上进行数据训练。

第四,政务场景的权威、精准需求与大模型“幻觉”之间存在矛盾,导致政务大模型落地困难。政务场景和商业场景存在极大区别,政府代表着公权力,政务场景有价值观方面的考虑要求。政务大模型落地困难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大模型的价值观可能出现“幻觉”,大模型给出的解决方案没有依据。

第五,大模型本身的不可解释性和各方权责界定困难带来政务大模型应用中的监管难题。模型的黑箱特征导致模型的解释力度不足,使用者难以评价模型的效果好坏,不敢基于大模型的结果做决策。例如,在基层治理中,很多官员都使用手机端 App 进行执法。如果官员想免责的话,就按照手机端 App 执行,出了问题能够推脱给手机端 App。如果官员不想基于手机端去做,自己就要承担很多责任和风险。这导致很多现实问题没有得到较好的处理。

第六,各部门对政务大模型技术、应用场景和实现路径的认识不一致,当前政策导向不明确。

三、“AI 大模型+政务”建设的启示

第一,政务数据至关重要,知识与模型双轮驱动成为关键。大模型应当深度结合政务应用场景与知识库,帮助政务类知识创新服务快速迭代,进而升级在各场景的应用模型。政务大模型不同于传统的信息化工程,需要通过不断的培育和训练,由不成熟的大模型成长为成熟的大模型,才能真正地给政府服务和决策提供支撑。

第二,政务数据多、模态性强,“模型即服务”发展趋势明显。人机协同时代,通用大模型将发挥底座功能,在综合管理细分的每个场景领域都有一个模型,大模型能够应对各式各样的场景需求。

第三,聚焦优先应用场景,各地各行业探索的重点日益清晰。一是以直接应用或升级改造现有较成熟的大语言模型为主;二是以处理政务文本数据为主要应用场景;三是以辅助使用或分析现有数据为主,具有间接支持政府决策的能力。

第四,大模型落地复杂,“大模型综合体”架构可行性较高。

为了打破模型孤岛,保证不同模型之间的有机协同,应当构建模型综合体,形成基于数字化的治理新结构。通过联动各数据局、大数据中心的信息,变革政府形态、职能结构和履职方式。

第五,技术不确定性高,但整体工程化的解决思路具有共识。如果能够解决算力、训练数据质量以及模型迭代的问题,那么大模型的实际应用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四、“AI 大模型+政务”发展思考与建议

基于以上对现状的分析及对问题的归纳,本文提出“AI 大模型+政务”发展思考与建议。

第一,政务大模型不同于传统电子政务建设。电子政务的建设是工程化的方式,是明确需求和功能再建的系统。传统决策系统先进行顶层的技术方案设计,再招标、让企业实施。政务大模型是实时响应突发需求,没有预设指标的决策支持。智能问答是从知识库到内容生成的过程。大模型是快速迭代、持续优化的,质量不断提升。因此,要改变建设模式,传统的工程项目制建设已经不适用,应该采用使用付费制。

第二,亟须算力资源的统筹建设与布局。政务领域的特殊性决定了无法直接使用商业化的互联网算力。同时,各地、各部门建设政务大模型算力的模式走不通,应当进行算力资源统筹,建设共性政务大模型算力基础设施,形成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模型算力支撑体系。

第三,释放高质量政务数据资源供给。数据是大模型具体应用的生产资料,缺乏数据就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应当将数据从公共部门释放出来,全国共建共享政务大模型训练数据集,分头治理,共享共用,公平提供给各家企业厂商,形成发展合力,进一步发挥共享协调机制作用。

第四,兼顾各方的应用生态建设。应当构建完备的生态体系,促进大模型的应用。从政府工作效率提升角度看,大模型需要满足写草稿、写总结、写会议记录、政策查找的需求。从社会公众收益角度看,大模型需要满足响应更快、体验更好、精准服务的需求。从大模型行业企业的经济收益角度看,需要在共性政务大模型算力基础设施上自主投资建设,基于共享政务大模型训练数据集开展训练、上架应用,按照应用的使用情况获取相应收益。

第五,做好明确的政策引导。人工智能是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内容,应当尽快出台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形成整体性的推进策略,进一步推进数据优化、标识化,释放数据价值。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治理、数据治理、网络治理、互联网治理有着紧密的联系,需要统筹各个领域出台的政策,形成明确的政策导向。坚持发展是最大的安全,组织开展系统化的试点探索,明确鼓励和限制的应用方向,在应用中不断优化完善。

本文根据孟庆国院长于2024年3月29日在武汉召开的第二届“人工智能·未来政府决策知识服务创新”研讨会上进行的演讲摘编整理而成。摘编整理者为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助理研究员肖尧。

作者简介:

孟庆国,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执行主任,研究方向为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数字政府等。

(责任编辑:周阳)

武汉市第一轮城市 总体规划编制回溯及启示

方可

摘要: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市第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回溯,梳理时代背景,整理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的时间脉络,分析特定历史阶段下苏联城市规划理论内核及其对我国城市建设带来的影响。同时,作为156个重点项目落地的八大工业城市之一,通过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总结几方面的启示,为新时期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新中国;武汉;城市总体规划;巴拉金

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武汉三镇迎来了城市发展的新阶段。虽然解放前的武汉三镇不乏规划,但饱经沧桑的城市在全新的政治体制和国家战略方针的背景下百废待兴,亟待全新的理念指引城市发展。1953年启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城市建设迎来了新的局面。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如何落实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如何站在全局高度编制城市总体规划,从而科学指引城市各项建设有序开展?面对一系列新问题,中央结合苏联援助我国的156个项目,选取了基础条件较好的八大重点城市,在建工部直接指导下,启动了城市规划的编制工作。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市第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历史的回溯,总结了四个方面的经验启示,以期提升人们对城市空间背后故事的认识,并为新时期高质量发展和城市规划提供借鉴。

一、复苏的城市

1949年至1952年的3年间,武汉市历经城市行政隶属关系的调整、市辖行政区划的变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恢复以及大型企业的复工,城市经济活力得到了极大恢复。1949年5月底,市人民政府宣布废止自卫特捐、附加捐及其他税收,并开始接收在汉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6月,胜新、金龙、宝新等私营面粉厂相继复工,停产两个月的武昌第一纱厂经人民政府扶持,恢复了生产。随即开展的民族资本社会主义改造主要集中于所有制的变革与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等方面。按照“依靠工人、团结资方、增产节约、劳资两利”的方针,经改造先后出现宇宙烟厂、东华染整厂、马应龙制药厂(后更名为武汉第三制药厂)、新

华丝绸厂、裕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具有相当规模的企业,极大地促进了全市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国家也对拥有良好产业基础的武汉市进行了大力投资。1952年6月,国营武汉第一棉纺织厂建成投产。国营经济及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城市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这一时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在逐步恢复,1950年第一座设有木制看台的灯光球场在鄱阳街建成,东湖风景区成立,1951年武汉市第一个工人文化宫——硚口工人文化宫建成开放,“武昌一大冶”66千伏高压输电线建成送电。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恢复,使得社会逐步安定,呈现出欣欣向荣态势,至1952年底,武汉市工业总产值达4.9亿元,全市人口规模为143.1万人,比1950年增长了31%,为大规模城市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巴拉金的草图

(一)时代的使命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向东方阵营“一边倒”的政治和外交格局下,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至1960年建筑工业部先后分4批次邀请共计40多人的苏联专家来华,参与了城建局筹建期间的一系列重要活动。其中,第二批来华专家巴拉金,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武汉市未来的城市发展框架。直至今日,普通民众仍能感受到当年这位苏联专家以宏大的视角和恢弘的规划手法给这座城市所带来的蜕变。

由于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尚未建立科学城市规划学科体系,对城市性质定位以及发展规律的认识也较为片面,在“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思想指引下,各地自下而上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业项目的建设活动。在缺少统一规划统筹指引下,以工业项目建设为抓手的城市建设活动也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造成了十分混乱的局面。1953年7月12日,位于武汉的中南局向中共中央呈交了《中南局对城市建厂工作几项建议的请示》报告,集中反映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规模城市建设过程中,由于无统一规划而带来的建设部署混乱、功能布局不合理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各地发展也存在消极等待的现象,不少地方城市管理者对将来城市远景蓝图没有清晰的概念。收到中南局的请示后,中共中央进行了认真研究,并于1953年9月4日下发《关于城市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中南局所反映的城市建设工作中的混乱情况很值得注意。为了适应国民经济恢复后的大规模建设开展以及城市规模的不断增长,1953年9月苏联专家巴拉金应时任武汉市市长王任重邀请来汉指导城市规划工作。巴拉金以草图形式为武汉的城市未来空间框架勾绘了一个初步意向,此后又为全市相关部门做了一次专题报告,重点针对苏联城市建设的原则和关于武汉的规划问题阐述了他的观点。

(二)宏伟构想跃然于草图

1953年初秋,王任重陪同巴拉金来到了汉口江边的曹祥泰大楼屋顶,宽广的长江江面和两岸起伏的龟山、蛇山映入眼帘。巴拉金在仔细研读三镇1:25000的地形图后,对城市的用地布局 and 空间结构有了直观的认识——与苏联在理想主义或古典主义规划思想指引下所建成的城市不同,眼前的武汉三镇,既拥有山水交融、河湖纵横、龟蛇锁大江的自然本底,又有着武昌古城、汉阳古城绵延千年的文化底蕴,同时也有着天下四聚之一的商贾繁华与江边的异域风情。新中国的成立,给这座美丽的城市带来了新的生机,大型工业企业即将启动建设、中南行政中心和省级行政中心的选址谋划、社会主义城市建设以歌颂英雄主义为核心的空间手法都是这座城市规划设计需要考虑的要素。



图1 武汉市规划草图(示意图,现收藏于武汉市规划档案馆)

此时的巴拉金踌躇满志,为了实现消费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转变,并真正突破长江天堑的分割,巴拉金将三镇融合发展的理念与建设社会主义生产城市的宏伟目标了然于胸,挥笔描绘了1953年的武汉城市空间的宏伟构想草图(见图1)。这一草图方案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三镇的融合和大手笔功能轴线规划手法的应用。把三镇作为一个城市,但都有各自的改建措施;武汉要有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就是从洪山广场到南岸嘴,连黄鹤楼一带,汉口由人民广场(现武汉展览馆)开辟一条大道直通汉江边集家嘴。初步设计了中南、湖北省和武汉市的行政中心及轴线干路、居住区等布置方案。这样就确定了武汉市未来新的发展方向和新面貌。武昌有两个中心区,中南机关中心区在小洪山一带,湖北省委中心区在阅马场。而位于青山的工业区已出现规整的工业用地的构想,其工业区中心门户与武昌沿江居住区成带状轴向呼应关系。三镇既各司其职,又通过桥梁与跨江通道和彼此关联的空间轴线形成了城市总体空间骨架雏形。

(三)一次重要的报告

巴拉金的草图,虽然只是城市未来空间框架的一个初步意向,但他大胆的空间构想和三镇融合的理念,为三镇的规划设计注入了新鲜血液。就在这次曹祥泰楼顶草图勾绘后不久,王任重市长专门邀请巴拉金为全市相关部门作了一次专题报告,重点对苏联城市建设的原则和关于武汉的规划问题阐述了他的观点。其中,关于苏联城市建设原则,巴拉金归纳了8个方面的内容——保证城市将来有发展扩大的可能,保证工业及运输业有进行生产业务的条件,保证居民生活生产有良好的条件,保证建立各种社会文化及生活服务机构,保证整个城市及各个部分要按照整体布置的方式进行建设,保证城市及郊区建立互相连贯的绿地系统,保证建立直接为城市服务的郊区农业基地,保证有关人民防空及消防措施的实施。巴拉金归纳的这8条城市规划设计原则,正是苏联功能主义城市规划理论的真实写照。在以意识形态界定城市性质的特殊年代,苏联模式针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所表现出的无序发展、环境恶劣、工人居住条件简陋拥挤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应对策略,并通过苏联城市规划建设实践形成了一套功能主义的规划范式。

在对武汉市城市规划问题的论述中,巴拉金旗帜鲜明地凸显了以“工业城市”为核心的规划主导思想,他强调“形成一个城市的要素即基础,首先是工业,依次是运输、机关和学校”。在此基础上,巴拉金从武汉市工业区选址、武汉旧市区改造、三镇融合规划及各自功能布局、武汉长江大桥及武汉长江二桥的规划、铁路线路规划布局以及武汉居民房屋布局形制进行了详细论述。

三、燃烧的激情

在城市规划草图编制的同时,苏联援助的156个重点项目中落户武汉的几个重点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前期准备。1953年5月,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器工业局发出通知,成立中南重型机床厂(后来改称武汉重型机床厂)筹备处,后改为中南重型工具机厂筹备处、武汉重型工具机厂筹备处。1954年1月,中央正式批准了武汉长江大桥初步设计。1954年5月12日,国家计委、建委正式批准在武汉市青山地区建设全国第二大钢铁工业基地——武汉钢铁联合企业。

1954年初,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由周恩来总理主持,陈云任组长,全国启动了“一五”计划编制工作。“一五”计划明确提出要集中主要力量,以156个重点项目为中心,以建立我国的工业体系作为主要工作目标,在较短时期内快速建立全面工业化的基础,将我国由自给自足的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国。1954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检查了过去城市建设工作中盲目、分散建设的缺点与错误。鉴于当时国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现状,这次会议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确保“156项工程”所在地的重点工业城市的工业建设的顺利完成。虽然若干年后反观计划经济模式或许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新中国工业体系基本从零起步的客观现状,需要统一的意志和全局统筹的步调,确保高效达成目标,这种典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全国一盘棋,而在这棋盘上,武汉作为华中重镇,落子于天元,定势于全局。武汉市再次融入全国工业体系中,成为新中国步入工业化的重要基石。

“一五”时期重点项目逐步向实施阶段迈进,对城市空间及功能布局产生新的需求。为此,武汉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在《武汉市规划草图》基础上,于1954年编制完成《武汉市总体规划平面图》(见图2)。时年刚满20岁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资深专家吴纯,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是1954年《武汉市总体规划平面图》编制的负责人,也是武汉市“156项工程”联合选址工作的亲历者。2015年10月,《八大重点城市规划》一书的作者李浩专程访谈了吴先生,这次谈话内容再次将我们带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图2 1954年版武汉市总体规划平面图

吴纯于1953年8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到建工部城建局报到第三天便被派往武汉,一直在武汉工作到1955年上半年。在缺少现状图的情况下,吴纯和工作团队满怀工作热情,骑着自行车,拿着军用地图进行现场踏勘,前前后后耗时近半年时间。其间,中南大组工作团队抽调一部分技术人员前往洛阳,剩下的工作人员由吴纯担任组长,负责整个武汉市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

1953年9月,苏联专家巴拉金来汉指导城市规划工作时,吴纯所牵头的工作团队技术人员普遍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并没有机会直接接触巴拉金。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家建设方面,地方领导对于苏联专家的意见相当尊重,在城市规划方面即使苏联专家有过于理想化的构想,与现实差距较大,领导和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员多不会明确提出反对意见,这也为1954年版城市总体规划上报审批工作埋下了隐患。

此时的规划团队,一方面在对武汉市“一五”计划中7个重大项目选址落位的基础上,完善城市总体规划布局方案;另一方面,还需对1953年巴拉金的草图方案的空间构想进行落实。在巴拉金的规划方案里,要求武昌、汉口的市中心遥遥相对,武昌几条放射状的道路一条延伸到徐家棚,另一条放射到珞珈山,同时武昌的几条铁路线路改线、汉口铁路线路外延和道路加宽,这些过于理想化的方案需要进行大规模旧城改造。而此时吴纯工作团队的规划方案根本没有涉及旧城改造内容,在当时条件下这些设想完全不能实施。

尽管吴纯工作团队在武汉市建设委员会主任刘正平和办公室主任孙宗汾以及武汉市建筑设计院设计人员的协助下共同绘制规划图纸,尽最大努力地落实巴拉金的规划草图构想,但理想与现实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1955年底,根据国务院发出的要贯彻勤俭节约的指示,武汉市规划委员会对武昌地区规划道路宽度规划进行了修改,并估算出节约投资额,报送国家建设委员会。

四、时间的味道

时隔近70年,当我们再次回首这段历史,不禁感叹新中国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虽然最终没有获批,但它对城市的影响,除城市空间结构方面外已经深入人文层面。该方案所勾画出的城市功能空间使得这些区域从新中国成立伊始的一张白纸一步步发展成今天的繁华都市,随之形成的一系列城市文化符号逐步成为城市的亮丽名片。解放前的武汉,三镇自成一体,虽各具特色,但仍缺少一处与特大城市地位相匹配的空间意向核心。根据巴拉金的草图方案,南岸嘴是汉口中心轴线的对景点,也是三镇景观组织的核心。在巴拉金草图构想的指引下,从1954年版城市总体规划总图方案开始,6轮城市总体规划中,南岸嘴一直都是武汉中心城区的景观组织中心,历经70余年,南岸嘴这块“处女地”虽未被贸然开发建设,但其景观价值一直得到精心呵护。

“一五”计划的实施,改变了武汉城市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长江大桥和汉水公路桥铁路桥的建成把武汉三镇联为一体,真正实现了三镇融合发展。武钢及其厂外配套设施几十年的建设发展拉动了城市空间向东拓展。中南路和中北路沿线城市空间以武重等重点工程带动逐步拓展城市空间,汉口沿东北一带延伸布局了肉联厂。重点项目的牵引,拉开了此后几十年城市发展的骨架,也开启了城市腾飞的新纪元。

结合武汉的自然条件和中央选厂小组的意见,将大型工业用地选址于青山一带,并充分考虑为工业职工配套的需求,将生活区选址在其附近有宽广用地的徐家棚地区,成为新的市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来自全国10多个省的5万多名工人和7万多名家属集结武汉。这一设想经过60多年的演变,逐步形成了现在的武钢及青山区的居住用地。以苏联工业集合性住宅区为范本建设红房子片区,按照巴拉金对武汉地区住宅建设所提出的原则,在设计建筑群时,对街坊的布置,可采取东西长南北短的形式,以使面南的房屋增多。按照这一模式,在红钢城八、九两个街坊的规划布局中加入了中国传统纹样,形成“囍”字

整体结构,以期居民能和谐地生活在大院内,它们成为了青山地区重要的优秀历史建筑代表,也传承着武钢几代人的历史记忆。对于跨江交通组织,巴拉金认为武汉旧市区改造过程中必须使三镇的交通运输联系起来,将来主要依靠上层为公路下层为铁路的武汉长江大桥。草图勾绘整整4年后的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其选址和大桥形制完全跟巴拉金所描绘的蓝图一致。同时,巴拉金以其前瞻性的眼光预测,按照规划的武汉城市人口,只靠一座大桥是不够的,因此,要考虑到第二座长江大桥。他的建议是“由汉口过天兴洲至青山修建第二座长江大桥,再由青山、王家店筑条铁路连接粤汉铁路,这样可使武昌市区不为铁路所切割”。虽然现在的天兴洲长江大桥并不是巴拉金所描绘的第二座长江大桥,但今天天兴洲上的跨江通道确实由蓝图变为了现实。

五、影响与启示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规划专家,巴拉金的规划思想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烙印。诚然,苏联的规划模式对城市发展规律认识有其一定的片面性与局限性,但结合武汉的城市建设基础和发展现实,其在宏观上统筹考虑城市空间的有利条件和限制性因素,以功能为导向并结合人口规模的预测建立设施配套的标准体系,并根据艺术性原则有效组织城市空间形态要素,同时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短期目标制定适宜的城市规划分期计划,体现出来的正面意义值得肯定。这些全新的规划理论和工作模式,使得武汉市百废待兴的城市规划建设从此走上正轨,基本奠定了武汉大型功能区布局的总体框架,对此后武汉三镇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

八大重点城市中,武汉的规模是最大的,也是各方面情况最复杂的。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市第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历史,给予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城市发展的建设方针不能脱离国家的宏观战略布局。在“一五”计划全国宏观发展战略一盘棋的前提下,苏联援华的156个重点项目才能有序推进,八大重点城市才有了明确的方向指引和上位依据。“一五”计划是个起点,直至现如今,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基础都不可能离开国民经济计划和区域规划的范畴开展编制工作。这也是经过几十年时间检验的行之有效的基本准则。

第二,现状调研在任何时候都是城市规划编制的前提和基础。之所以在《武汉市规划草图》编制完成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又编制了《武汉市总体规划平面图》,一方面是因为七个重点项目在短期内启动实施,需要城市总体规划支撑配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苏联专家巴拉金指导编制的《武汉市规划草图》过于理想化,“规划草图”接近于现在的概念方案深度。而新编制的《武汉市总体规划平面图》未获得国家批复,仍然是因为为落实巴拉金的一些大胆构想,“形式主义”与现状之间未能找到平衡点,规划方案不可能在一二十年内实现。

第三,辩证地看到城市构成要素中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城市规划只是为大型项目建设提供各项设施的配合,但涉及大型工业计划、工厂及重大基础设施的选址不是城市规划的主要任务。巴拉金在短时间内勾画的草图方案有相当程度上是出于艺术性方面的考量,但在当时条件下涉及铁路改线、建设第二座长江大桥、大型厂区选址等工作,需要深入的工程论证和现状基础踏勘。武钢厂区及其厂外配套工程的系统建设选址,这些工作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形成确切的结论、并反映到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总图上的。城市从局部来看是技术问题,从整体来看则是“艺术”问题。后来几十年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城市重大项目的落地实施有其自身规律,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也应找到其准确的定位。

第四,任何时期的城市规划都不能忽视对城市生态本底重要性的认识。受到当时苏联模式的影响,

结合大型工业项目,河流、风向、地质等自然条件对城市规划的重要意义得到关注,而对生态规划其他方面的关注略显不足。吴纯先生几十年后曾感慨“中国的城市,像武汉这种丰富多彩的,还比较少见”,“比较独特,应该重点搞一搞城市规划”,“当年,工作时间太短,来不及深入研究”。^①诚然,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城市生态工作有着不同的社会诉求,但生态资源和生态系统对于城市的不可逆性,又决定了规划工作者在规划实践中必须带有敬畏之心,以审慎的态度和系统的观念来营建城市。

六、结语

芒福德曾说过:“大城市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它本身也是一个博物馆:历史性城市,凭它本身的条件,由于它历史悠久,巨大而丰富,比任何别的地方保留着更多更大的文化标本珍品。”^②武汉城市规划史中的这段历史,也已经成为一件难得的文化标本。

“真正影响城市规划的,是深刻的政治和经济的变革。”^③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国大规模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原点,“一五”时期的城市规划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的起步,也是国内城市规划行业系统学习苏联规划模式的肇始。巴拉金给武汉的城市规划思想带来了里程碑式的蜕变,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此后几十年。由于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1954年版城市总体规划中改善城市条件的美好愿景与当时极度困难的财政经济状况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导致最终未能通过审批,但这一时期的探索,在规划理论、标准、范式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开了先河,为我们开启了城市规划新的纪元,客观上推动了武汉的城市规划事业站上一个新的起点。几十年后,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仿佛打开了一扇窗,使我们对城市空间背后的故事有了新的认识。

作者简介:

方可,湖北省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高级规划师,国家注册规划师。

(责任编辑:周阳)

① 李浩:《城·事·人——新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访谈录(第二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第27页。

② 孙会:《孰是孰非?芒福德与雅各布斯人文城市思想比较及其当代价值》,《国际城市规划》2023年第1期。

③ 黄伟、邓凌云:《政治经济发展与城市规划立法》,《中外建筑》2009年第11期。

物候传播：“叙事”视角下的 跨物种传播探讨

王溥 陆锦华 薛嘉文

摘要:传播学长期集中关注人类社会的文本信息交流,而忽略了媒介的物质性与自然属性。本文提出“物候传播”(phenology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以理解超越人类的传播学。物候与气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指涉自然物的季节性信息。物候传播指动植物季节性信息的传播、接受与阐释,以及这些信息如何在人类社会与文化当中产生影响。从打破人类中心主义叙事角度出发,以“感应”来理解当下“传播”存在的桎梏;“弱人类中心主义”作为超越人类与生态二元对立的第三条路径,使人回归到万物之中。物候传播研究从物候的容积出发,理解自然的多重语境。作为互通桥梁与发展理念,物候传播有利于构建人与自然间的对话体系和伦理关系,最终充分释放物候价值红利。本文认为,物候传播不仅为应对“人类世”时代的危机提供理论思考,也是解决传播学学科内卷化的一条路径。

关键词:物候传播;跨物种传播;叙事学;环境人文

人与动植物之间可以沟通吗?自然物候可以向人类传播哪些信息?进而又对人类社会产生哪些影响?这或许是一个“奇怪的”传播学问题。主流传播学长期研究人类社会中的交流与沟通,关注意义与文本,很少将目光放置于非人类以及跨物种之间的交流,而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交流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中国人认为人与动物遵循着同种道德生物学法则,动物对人类德行有着感应能力,如果德治有亏,动物便会恢复掠食的本性来惩罚人类。^①这便是中国古代关于人与动物之间的传播观念——一种早期的万物互联的宇宙观。当代关于万物互联的解释,更多是应用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之中,关于“万物互联”的主流解释是“网络连接和计算能力扩展到通常不被视为计算机的物体、传感器和日常用品的情景,使这些设备能够在极少人为干预的情况下生成、交换和消费数据”。而这往往忽略了“连接”这一概念的复杂性。本文从这一盲点出发,将动植物的季节性变化,也就是所谓的物候,纳入传播学研究的视野当中,从生物的

^① 胡司德:《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蓝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第209页。

动态变化过程中重新理解传播以及万物互联。

一、什么是物候传播？

物候是“生物受气候诸要素及其他生长因素的综合影响的反应”^①。竺可桢作为国内物候学创始人与倡导者,其在1937年于《中国气象学会会刊》发表的《论新月令》被称为国内第一篇具有纲领性与划时代意义的物候学论文。而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的物候文化记载更为丰富与长久。我国最早关于物候的记载,见于距今2500多年的《诗经》中,其中写的“四月秀葇,五月鸣蜩”“八月剥枣,十月获稻”等,展现了春秋时期古人的劳动生活与节气风俗。更不用说沿用至今的二十四节气了,作为中国古老的农耕历法,以草木枯荣、鸟兽迁徙、惊蛰变化以及霜雪雨露为标识来划分时令,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与物候相对应的概念是气候,二者既联系又区别。气候是指“某较长时期内气象要素和天气过程的平均特征和综合统计情况”^②。两个概念具有主体的差异,气候以天气现象为主体,而物候则以生物现象为主体。竺可桢认为,虽然两者都是观察四时变化、带有地方性的科学,但有所不同的是,“气候学是观测和记录一个地方的冷暖晴雨,风云变化,而推求其原因和趋向;物候学则是记录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来往生育,从而了解气候变化和它对动植物的影响”^③。因此,物候与气候是两个相互交织、相互接承的概念。例如在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中所描绘的春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而在科学界,相关的研究证据也表明物候会对气候产生一定的反馈作用。

什么是“物候传播”呢?首先要明确的是,“物候传播”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涉及传播学、生态学和环境人文等多个学科领域。它关注的是地球环境中生物之间的信息交互,尤其聚焦于物候现象在传播和互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涉及如何理解跨物种之间的交流。“物候传播”这一概念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首先是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这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的“新物质主义”,其假设万物各有其意义,并不由人类所赋予。^④而在本文中,我们从中国早期的万物观与听觉叙事中汲取灵感,探讨物的能动性、媒介性。其次是季节性信息的传播与解读。自然生物会传播并解读物候现象所传达的信息,并对其作出响应。例如,鸟类会根据气温来选择繁殖与迁徙的时间。最后,物候人文与自然物的社会文化意涵。花草树木、虫鱼鸟兽如何介入人类社会当中,季节性的信息又如何在社会中传播,并如何形成了仪式、庆典以及习俗等。物候传播通过探讨物的间性,将学术关怀指向可持续性发展与环境保护。

总的来说,物候传播关注的是动植物的季节性信息的传播、接受与阐释,以及这些信息如何在人类社会与文化当中产生影响。但值得强调的是,物候传播并不是一个学科的“另类领域”,或是一个概念的“新鲜尝试”,而是业已存在于传播学领域之中,但却往往被人类所忽略的学科研究方向。可以明确地说,物候传播本身就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支脉。为了证明这点,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论述物候与传播的关联,以及物候传播作为传播学的“新”研究领域的学术合法性。

① 刘敏、方如康主编《现代地理科学词典》,科学出版社,2009,第99页。

② 刘敏、方如康主编《现代地理科学词典》,科学出版社,2009,第129页。

③ 竺可桢、宛敏渭:《物候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第1页。

④ 章戈浩、张磊:《物是人非与睹物思人: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2期。

二、物候何以传播：万物尺度下的传播学

（一）从“传播”到“感应”：重新思考万物互联

当我们梳理传播的观念时，一般会从苏格拉底所生活的古希腊时代开始谈起，认为城邦内外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构筑起了雅典文明的基础。而这一学术传统往往忽略了世界文明的复杂性，以及不同脉络体系下“传播”这一概念的多义性。那么回到中华文明的语境之中，“传播”意味着什么？它的多义性又体现在哪？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将视线转向中国叙事学。学者傅修延在其作品《物感与“万物自生听”》^①中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何为万物互联，也在无意之中拓宽了传播学关于“传播”这一观念的探讨。^①在这里，我们尝试将这两者进行勾连，进一步打开传播学的想象力。

我们常说“万物互联”，但何为“物”？在《说文解字》中，“物”指的是“万物”，“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②。这体现了中国农耕文明的思想。荀子认为，“物”的外延可扩展至所有类的总称，是万物的“大共名”。汉语里的“物”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非人类。在古人的探讨之中，人与物并非二元对立，庄子、程颢和王阳明等人提出了诸多观点，例如“万物与我为一”“与物同体”以及“心外无物”观点，体现了人与物之间的无差别性以及中国早期的去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物本身并不是毫无生气、受制于人的，具有衬人、代人、名人、助人甚至强人的功能。这与媒介环境学派的思想异曲同工，即认为技术会形成一种媒介环境，这种媒介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感知、态度与行为。例如尼采与球形打字机的故事。1882年，由于尼采的视力水平急剧下降，由此他购入了一台球形打字机——它由金属制成，按键围绕着一个中心的球面突起——以便于写作。尼采的好友海因里希·科泽利茨发现，使用打字机后，尼采的散文变得更加严谨简洁，他在给尼采的信中认为风格的转变源自打字机“钢铁质地的坚硬”。对此，尼采在回信中认为：“你是对的，我们所用的工具参与了我们的思考。”^③除此之外，《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宝玉与金箍棒对于他们而言并不只是简单的饰品或武器。

我们可以从古人文论中的“物感”看出关于“万物互联”的端倪。“物感”指的是人作为万物之一与他物之间的感应。例如在《礼记·乐记》中，“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指的是人的思想与感情的产生和变化，是由于外界事物的刺激。而“感”指的是“感应”。《世说新语·文学》中说“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周易·系辞》中说“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不管是有生命的鹤还是无生命的钟，不管是人耳能察觉到的声波还是无法感知的震波，相互之间都能够感通应和，这体现了万物之间冥冥之中的联系。另外，在古人“天人感应”的思想中，常常认为天能够预示吉凶祸福，人的行为也能够被天所感知。媒介理论家彼得斯也认为天空是一种媒介。中国人通过天空四时变换创造了历法，而古时皇帝通过颁布历法向天下宣告他的统治，以及作为“天子”传达天意的身份象征。^④

“听”可以看作是“感应”的缩写。一方面，听觉可以让万物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彼此传播，例如在王勃的《滕王阁序》中，“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塑造了一个宽广旖旎的声音景

① 傅修延：《物感与“万物自生听”》，《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②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第30页。

③ 尼古拉斯·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刘纯毅译，中信出版社，2010，第20页。

④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邓建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第215页。

观。另一方面,“听”不仅涉及耳朵,而是要诉诸人体所有感官的感应。在《庄子·人间世》中,庄子面对世事沧桑,不仅要“听之于耳”,还要“听之于心”“听之于气”。

万物都存在叙事本领。傅修延提出了两个具有启示意义的原创性概念——“听无”“无听”。“听无”指的是“听于无人之境”,表达了一种“超脱于心灵的体验”,“渊默而雷声”“大音希声”均以静默的方式震荡人心,是一种超脱耳根直诉灵魂的感觉体验。韦应物的《咏声》中,认为声音“还从静中起,却向静中消”,无声为有声之源,“听无”则是听声于无声之中。“无听”包括两个方面——“无人之听”与“无闻之听”。“无人之听”暗含着万物的自生自灭、自给自足。例如李华的“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花自落”与“鸟空啼”体现了自然之物相映成趣,不需要人类参与。“无闻之听”指的是对声音的忽略,而被忽略的声音并非一种干扰,而是若有若无地存留在意识之中,为需要关注的声音充当背景,最终“无闻之听”则为了“有闻之听”。例如在盛夏的旷野,虫鸣声作为噪声却突出了旷野的寂寥。在一些乡村短视频中,我们会发现“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的声音元素更加突出乡村的宁静。

“听无”和“无听”对于重新理解传播,以及重新理解万物互联具有重要意义。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将传播定义为传者与受者信息的传递,“听无”扬弃了人在传播链中深度介入的必要性,“无人之听”则鼓励去人类中心化,否定人类作为唯一受众在传播模式之中的必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传播学的“撒播观”相类似,但二者有本质区别。“撒播观”指的是单向的交流方式,信息“像雨水一样洒在每个人身上,无论正义与否”,例如广播的传播模式。“无人之听”则是从“万物尺度”的角度出发,把人类当成万物的一类,凸显了大自然“无人之事,亦不求人和”的高冷姿态。在香农—韦弗模式中,噪声被当作讯息衰减或失真的重要因素,“无闻之听”则强调了这种噪声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充当背景,我们得以透过噪声去感知所关心的讯息流动。

听觉叙事为理解物候传播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启示,也为当今国内学界所讨论的传播学本土化提供了借鉴。“感与听”“听无”以及“无听”等概念拓宽我们关于“传播”讨论的边界。人虽是万物之灵,但感官却不如自然界动植物那般敏锐。因此,在探讨人与动植物的跨物种传播时,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传播观念无法涵盖人与物彼此之间的联系,万物互联更多地是通过感应——或者称之为“听”的方式进行沟通。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我们经常能看到物候变迁对文学家起到灵感触发作用的例子。陆机在《文赋》中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意指诗人要与自然“心物相应”,对诗词的构思要与万物有所感应。

万物各具生存法则和叙事策略。以感应来理解传播,将人作为自然传播体系中的从属者,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之间对立关系的“万物尺度”,从“人是万物的尺度”到让人类回归到万物之中。这种视野拓展也是物候传播的立意之本。当然,从现实语境出发,我们所指的万物尺度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

(二)弱人类中心主义:超越人类与生态的二元对立

2000年,地球科学领域知名学者克鲁岑提出“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概念,用以指称人类主导的地质时代。人类世始于18世纪下半叶,地质学家们通过对极地冰层中的空气进行分析,发现当时全球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开始增加。这恰好与詹姆斯·瓦特在1784年发明蒸汽机的时间节点相吻合。作为以

“人类”为字眼冠名的地质年代,总会让人产生望文生义之惑,人类世是否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实际上,人类世并不是服务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具有危机性的概念。在这个时代,人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地球生态平衡。因此,克鲁岑呼吁科学家和工程师要引导社会迈向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活动。

人类自身在人类世中的境况与地位岌岌可危,使我们不得不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概念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关于人类中心主义,我们会想起普罗泰戈拉的名句——“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又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①。这种观点将人类置身于感知的中心地位,其他事物的存在与价值依赖于人类的认知与判断。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中心位置,他认为:“大自然不可能毫无目的毫无用处地创造任何事物,因此,所有的动物肯定都是大自然为了人类而创造的”^②。托勒密的“地心说”则将地球置于宇宙的中心位置,并持续影响了西方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中国古代也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礼记·礼运》中有云:“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尚书·泰誓》中也有“惟人万物之灵”的言论。我们常能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例如《白蛇传》中见到灵异生物通过苦修化身人形的情节,这似乎印证了“人是万物之灵”的论断,但东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

冯天瑜教授指出了这种区别所在。中国的人类中心主义具有温和道义的特点,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与工业文明产生本质冲突,而退居局外。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则是一种霸凌型,或称之为强中心主义。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将身份建构为“大自然的征服者”,而征服过后所产生的反作用则形成了一系列恶性循环。转向生态中心主义是否可行?答案是否定的。一来,生态中心主义具有“中心主义”的话语陷阱,将生态视为中心,边缘则是人类,而如果将人类视为生态的一部分,那么边缘又是什么?二来,生态中心主义的实际应用远比人类中心主义更为复杂与艰难,其背后涉及权衡与取舍等伦理问题。

那如何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呢?冯天瑜提出了第三条路径——“弱人类中心主义”。当代世界迈入了人类世,我们无法忽视社会文明的发展,这是否意味着生态中心主义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冯天瑜认为,重点是要有节制地利用自然以满足人的适度需求,大体合乎自然规律。由此,生态中心主义应加上一个“中庸的”前缀。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句话体现了自然万物相处的中庸之道。因而,“弱人类中心主义”的要领在于坚守底线,维持地球的生态平衡,它不仅是修正“强人类中心主义”的妥协物,也是对传统的“道义型人类中心主义”的创造性复归。“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庄子认为,自然万物各有其运行规律。“弱人类中心主义”以尊重自然规律、适度开发为前提,是一条适合于现实的发展路径。

回到传播学领域,“弱人类中心主义”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在传播模式中的位置,以及如何跨物种传播。彼得斯提出了一种“元素媒介哲学”。媒介一般被视为在传受双方搭建意义的桥梁,使二者得以产生联系;“元素”也会使我们想起中国古代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彼得斯的“元素媒介”既把元素当成媒介,例如把海洋(水)、火作为交流的中介;同时将媒介视作人类存在的根本,一如前文提到的五行说(中国古人将五行视为万物的基要)。“元素媒介”将媒介视作人类存在的环境,而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在彼得斯眼中,海洋、火、天空等自然物均可视为媒介,而不是仅仅将媒介内容视为传播的本质。人类学家也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第138页。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第23页。

无意识地介入跨物种传播的讨论之列中。从“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开始,人类学家们就致力于研究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21世纪初,这种兴趣开始发生转向。一批新兴的“多物种人类学家”开始重新强调与人类生活纠缠在一起的生物的主观性和能动性。例如,唐·库利克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传播分为六种模式,认知上的、心灵上的、心理上的、交互上的、本体论上的以及伦理上的。在人类学家们看来,人性其实是一种物种间的关系,动植物也参与到人类社会的建构中来,地球的故事不应该只由自诩为胜利者的人类来书写,应让多物种景观成为世界历史的主角。

与主流传播学所关注的人类传播实践相比,跨物种传播更像是一种“偏门”。但我们认为,这正是打开传播的想象力,解决传播学学科焦虑的一条路径。传播学学科的焦虑大体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传播学起源于多学科交叉,这导致学科边界模糊,缺乏中心理论支撑;行政研究与实证研究的主导研究范式难以拓展理论深度。^①目前,传播学学科反思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思考传播,我们会囿于视角的僵化,陷入一种“自我折磨式”的学科发展中。^②从“弱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出发,我们会发现,人类的传播只是万物之间传播的一类。“万物自生听,太空恒寂寥”,万物通过相互感应,参与到宇宙循环当中,人也不例外,这也是基于本体论角度的思考与探索。

(三)物候的容积:再思传播的语境性

每一种传播行为都是深深嵌入其所在的社会语境当中。上文我们提到,实证传播研究难以拓展理论深度,一定原因也在于缺乏对社会语境的分析。如果以跨物种传播视角来重新审视传播的语境性,我们会发现,自然界的传播现象同样具有语境复杂性。物候传播具有多重语境,这主要依托于物候的容积。竺可桢将物候的容积(在本文中,我们将其理解为物候传播的语境)分为四个方面:南北语境、东西语境、高下语境以及古今语境。^③

南北语境具体指由纬度差异而带来的物候现象变化。由于地球上各个地方的太阳高度角不同,由此带来了温度上的差异。一般而言,纬度越低,温度越高;纬度越高,温度越低,从而带来物候现象的变化。在我国,秦岭作为南北分界线,其北为暖温带气候,其南为亚热带气候。我国古人敏锐察觉到南北物候语境所传达的差异。柳宗元有诗云:“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这首诗的意思是,二月南方的花早已盛开,但一场大雨却将它们打落了,借由落花抒发了作者被贬的哀怅。柳氏之所以对物候变化敏感,一方面是他出生和成长于北方,同一时节南北物候现象不同;另一方面是物候变化所传播的信息,使其联想起自己被贬的经历。从传播角度看,二月落花成为传者,柳宗元成为受者,物候的南北语境差异成为完成这一传播链的重要动因。

东西语境指经度差异。经度对物候变化的影响在于以下两点:首先是温度差异。东经地区日出较早,温度升高较快;西经地区日落较晚,温度下降较晚。由此产生了东西经温度的差异,并且由此产生的时差也会进一步影响季节的长短。其次是海陆距离。沿海地区海洋性气候明显,夏季温暖而潮湿,冬季较温和,气温波动相对较小,例如我国的东南沿海一带。内陆地区的主要气候类型是大陆性气候,特点是

① 龙强、吴飞:《认同危机与范式之惑:传播研究反思之反思》,《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

② 邱新有:《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困境与路径选择——兼谈问题方法论》,《新闻记者》2014年第12期。

③ 竺可桢、宛敏渭:《物候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第28—38页。

四季分明,降水不均匀,该气候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东北、西北地区。唐代诗人岑参在《送江陵泉少府赴任,便呈卫荆州》中说“渭北草新出,江南花已开”,是将渭北地区与江南地区进行比较,认为当渭北的草刚发出新芽之时,江南地区早已百花盛开。

高下语境指由于地形原因,分布在盆地、平原以及山地、丘陵的动植物所显现的物候现象各有不同。通常情况下,随着海拔每升高100米,气温会下降约0.6℃。当地形起伏到数千米以上时,气温差异变得更加明显。此外,不同植物对气温的适应能力各不相同,因此,不同海拔地区的植物景观也会有所不同。白居易的名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就描绘了高低位置之下的物候差异,而后他又说“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意思是常常为春光易逝无处可觅而感到怨恨,但是没想到春色转到了此处。大林寺位于今日庐山,海拔1100余米,气温较山下低6℃~7℃。而情感转变从怨恨转到了惊喜,正是白居易对物候变化所传播信息的反应。

古今语境指物候的时代性。物候并非一成不变,重要原因是气候系统本身是一种混沌现象,难以捕捉其规律,气候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物候的状态。一些研究发现,气候变化正在影响陆地和水生迁徙物种,导致它们的物候发生变化,也可能对它们的数量产生潜在影响。例如,近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通过持续追踪鸟类迁徙数据,发现由于气候变化,迁徙日期通常会发生变化,往往会提前。我们开始逐渐了解个体行为、世代变化以及温度变化如何导致这些新的物候模式的形成。

从物候传播多重语境的讨论中可以发现,大自然语言有其独特的语法规则,可以视为一种非语言的、符号化的、通过自然界中的各种现象、形态和过程传达信息和意义的方式。这些不断变化的信息在生态圈中传播,对植物生长、动物迁徙、农业耕作等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将人类的社会文化语境包含在内,并时刻影响着人类社会。传播学作为一门对关系敏感的学科,应该将多物种的间性纳入考察范围之内。^①在聚焦于“感应”的万物互联时代,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研究应该超越人类语境的限定,将视野投射进自然生态的循环中。

三、物候传播的人文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科普与通识:作为互通桥梁的物候传播

物候传播是一个具有公共性的学科领域,旨在促进科学知识的传播,以及自然与人文之间的跨界交流与对话。人与自然的互动对话历史久远,在传统哲学领域,天地日月、山河云雨、草木虫鱼、人畜神鬼之间,都可以相互感应、情理互通,一切道法自然。在古代,这种知识生产与解释权主要集中在文人、圣贤与祭司手中。现如今,自然科学家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格局存在着一个尴尬的局面:复杂的专业术语、数据模型阻碍了公众对科学的理解,虽然自然科学家擅长与自然“打交道”,但并不擅长人文传播,结果自然价值难以被发现,甚至因误解而引发冲突。英国学者杰夫·埃文斯等人曾在《自然》杂志上发文呼吁,科学需要得到公众的支持,而这种支持至少应该建立在最低限度的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之上。

理解就需要对话,传播学是一门将沟通、对话作为核心概念的学科。从物候传播角度出发,会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理解自然语言。物候是跨界对话的自然语言,竺可桢开创中国物候学,通过物候表象和自然

^① 杨航:《人—物—间性:多物种民族志的意涵、演进与对话传播学》,《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

行为,探索自然万物之间的内在响应机理,理解万物间的因果逻辑关联。而搭建对话体系的前提是理解物候表征,提高对话的准确性与专业性。二是理解公众语言。在新媒体时代,移动互联网赋予受众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受众不仅难以接受传统媒体时代的硬性话语,甚至会对其进行抵制。而如何搭建软性话语,顺应公众语言,让公众参与到自然与人文跨界对话中则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就前者而言,理解自然语言需要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工作者跨界联动,搭建智库平台,加强科普队伍建设,并使其规范化。同时,人文工作者需要提升自身科学素养,了解必要的自然科学知识。就后者来说,需要自然与人文工作者具备互联网思维,顺应媒介发展逻辑,针对不同平台的特点进行内容生产与分发。“无穷小亮的科普日常”在抖音上拥有2423.1万粉丝数,科班出身的他通过专业而诙谐的方式普及科学知识,制作的视频合集“身边的花鸟鱼虫”就是通过观察不同季节下、生活中常见的动植物呈现出的特点,也就是所谓的物候现象。我们也发现,非科班出身的自媒体账号也在无意间传播了物候知识,这主要集中在乡村自媒体。在这些“野生的”视频中,他们遵循四时变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向现代受众展示传统农耕文明。来自云南乡村的“滇西小哥”在哔哩哔哩、抖音与微博分别拥有137万、340.8万、842.4万粉丝量,她的作品如《能让我凌晨4点起床的,只有上山找菌子了!》《处暑吃点啥,摘桂圆换胖鸭》《立秋至,禾谷熟,贴秋膘,啃西瓜,再晒个秋》等,我们都可以发现物候学常识。

总而言之,物候传播并不满足于关注人—物、物—物间的感应,仅作理论上的探讨。我们希望物候传播在“弱人类中心主义”的当代社会,能够作为搭建自然与人文之间的互通桥梁,促进通识教育。在发挥物候资源价值的同时,让人类意识到物候之于社会的重要意涵。

(二)传播与发展:作为发展理念的物候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如何既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又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似乎成为一道悬而未决的难题。我们在前面谈及了许多关于人与自然传播理念的探讨,尤其是如“物感”“弱人类中心主义”,这些理念很好地解释了人类以何种姿态与自然相处,顺应了关于“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经济社会发展”^①的理念。显然,作为发展理念的物候传播只是谈及物候或自然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够的,完全忽略了传播学的学科特性和使命。

关于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特纳基于中东地区的调查,建构了传播之于社会发展的四个量化指标:城市化、教育普及、社会参与、媒介发展。这四个指标相互联系,共同促进社会变革,其中他将大众传播称为“奇妙的放大镜”。美国传播学科创始人施拉姆在《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中提出让传播研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臂膀”。施拉姆认为,在国家发展中,传播的任务有三种:第一,发挥传播的告知功能。民众必须得到国家发展的信息,有必要的話,通过信息唤醒他们对祖国发展的抱负。第二,发挥传播的决策功能。通过领导者与民众之间信息沟通实现高效率的决策。第三,发挥传播的教育功能。通过大众媒介传播文化知识,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② 传播之于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第355页。

② 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金燕宁、蒋千红、朱剑红译,华夏出版社,1990,第132—133页。

发展,不仅对内,还需对外。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创始人达拉斯·W. 斯迈思曾提出“文化依附论”,认为加拿大的文化与传播体系(例如印刷媒体和电影、电信业、广播电视业等)均迁就于美国的商业与资本组织,加拿大的大众媒体一直以来在为美国生产受众。^①这种文化帝国主义导致世界信息传播秩序的失衡,阻碍了国家文化自主权的发展。因此,追求“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成为构建新世界信息秩序的重要指南。

上述“发展传播学”代表人物并没有将传播简单视作信息的传递,而是一直与社会勾连起来,将其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因。但上文所提及的发展传播研究史主要涉及内容、文本与意义,除此之外,以传播促发展是否还有其他可能?传播学在经历了物质性转向后,我们又是否能从文本中跳脱出来研究文化、传播与发展?我们提出的“物候传播”对于回答这两个问题有所裨益。冯天瑜指出:“文化生态的物质前提是地理环境……如果把各民族、各国度有声有色的文化表现比喻为一幕接一幕的悲喜剧,那么这些民族、国度所处的地理环境便是戏剧得以演出的舞台背景。”^②这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生态学视角,其“不赞成把文化归结为经济的直接产物,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的生成与演变”。因此,将物候传播作为发展理念,不仅体现了文化生态视角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环境哲学,也顺应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道路”^③。从这个角度看,物候传播不仅使我们重新审视传播学学科的突围方向,也为打造面向众生的价值流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简而言之,物候传播目标是通过经营自然生态资源释放资源红利,从而激励人们保护和高效开发自然。开发面向社会的物候传播价值流工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农耕物候公园及博物馆传播工程。充分利用山川乡土记忆馆,利用自然场景和剧场模式,促进自然人文对话与传播,宣讲气象物语、农耕谚语、民俗传说、行为禁忌、医药饮食、乡土物种、传统工艺等内容,使古老生存经验和人文体系得到现场教授。第二,组建农耕文明研究院或学院,传承传播农耕文化。组织相关研究人员和物候人文爱好者,结合考古探索,梳理各地物候知识,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推广活动。第三,建设线上农耕物候文化园,推进农耕物候文化数字化现代化。深入挖掘农耕物候文化的时代元素和艺术元素,延伸周边产业链,运用新科技建设互动式虚拟展厅或网上展厅,设计数字藏品,以新科技新业态促进传统农耕文化焕发生机活力。第四,打造有地方特色的物候文化IP体系。以湖北为例,构建荆楚农耕文化IP体系,打造“工农文旅研”融合品牌。打造一批具有长江流域湖北特色的农耕物候文化IP,围绕每个IP形成产业链,创建名优品牌,创造新的价值链并借助产业消费途径进行传播。

几千年来农耕文明积累的大量物候人文知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馆藏乡土、山水以及民俗民生之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物候传播正是依托“两山”理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力。

四、结语

生态人类学家科恩认为,人类世界是一个“在属于我们的、超越人类之上的世界,正在越来越多地被

① 达拉斯·W. 斯迈思:《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吴畅畅、张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第3—4页。

② 冯天瑜:《中华文化生态论纲》,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第54—55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第124页。

‘太人性’之物占据的不确定时代”^①,如果我们要幸存于此,就必须不得不主动培养这些跟森林一道思考、像森林一样思考的方式。当前的全球环境景观迫使我们深刻反思人类的身份认同问题。人类文明诞生至今,我们从未脱离自然,与其说人类是万物之灵,不如说人类是万物之一。我们的愿景,是通过物候传播这一概念,重新思考全人类的身份认同,重新理解万物之间的关系。传播学作为将关系、沟通以及信息作为中心概念的学科,更不应将视角完全拘囿于社会自身。生物话语具有多样性,跨越学科的藩篱,进行跨物种、多物种的交叉性传播研究,不仅可为应对“人类世”危机提供更多学科思考,也可视作解决传播学内卷化的新探索。

基金项目:2023 年中国气象局气象软科学课题资助项目“‘气象+’视域下我国物候资源化研究”(项目编号:2023ZZXM3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文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物候文化生产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023WKYXZD017)。

作者简介:

王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新闻生产与传播、传媒经营与管理、物候文化传播;

陆锦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传播、文化传播;

薛嘉文,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传播。

(责任编辑:林丽)

^① 爱德华多·科恩:《森林如何思考:超越人类的人类学》,毛竹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第228页。

元宇宙赋能下武汉城市文化 数字博物馆设计路径研究

陈为铮 涂戈尔

摘要:随着国家文化战略的推行,群众文化消费逐步升级,文化消费市场正在由传统的实体空间向数字的虚拟空间转变。建设城市文化数字博物馆,有利于探索数字时代文化传承与文化发展的新思路。本文将文化空间划分为实体文化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红色文化遗产三大类,在借鉴元宇宙融合模式下数字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武汉市城市文化数字博物馆建设更新的三种模式;认为区域内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利用,需要在正确解读城市文化精神内涵的基础上,遴选出可以引发群众共鸣的城市文化符号,依靠历史沉淀而在特定区域形成的“地方感”召唤,激发人们的恋地情结,从而实现城市文化数字博物馆中文化内容物的精准填充。

关键词:元宇宙;数字博物馆;武汉城市文化建设

2023年7月18日在武汉市举行的“武昌1800年·长江文明与文化产业论坛”提出了要建成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武昌样板”,并达成三点共识:一是促进长江文化创新转化,二是推动文化产业园区与城区融合,三是推进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①

武汉作为长江经济带和长江流域文化带的核心城市,在经济基础、技术手段以及文化创新传播模式上具备先天优势,建设武汉城市文化数字博物馆,有利于发挥先行试点的“棋眼”的作用,探索出数字时代文化传承与文化发展的新思路,这是基于传统“说教式”文宣模式影响力衰退与互联网技术迭代升级所形成的时代思考。在传统博物馆“说教式”互动方式逐渐无法满足群众“个性化”文化需求的情况下,数字技术与博物馆携手并进,将成为新时代解决传统博物馆“滞胀”问题的新答案。第三代互联网技术迭代升级带来的交互式集体共享的虚拟文化空间——元宇宙的出现,为城市文化数字博物馆提供了新的建设维度。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上,依托数字孪生技术实现文物元真性和利用性的统一、在教育与传播过程中,以混合现实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升级,将打造一个全身沉浸的文化场域,改变“走马观花”式的人地互动模式,改善公众与文化场景的互动关系,焕发地方文化魅力。

^① 秦然然、钟晟:《武昌1800年·长江文明与文化产业论坛综述》,《文化软实力研究》2023年第4期。

一、元宇宙助推数字博物馆发展模式更新

(一) 元宇宙的构成逻辑

“元宇宙”一词,来源于美国科幻小说家 Neal Stephenson(尼尔·斯蒂芬森)在出版的小说《雪崩》中所提出的“Metaverse”。这一词汇诞生距今已有30年之久,而在近两三年来突然爆火,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对移动互联网之后下一个划时代信息技术的想象。

元宇宙的目的在于打造一个适应人类生存发展的数字虚拟世界,是一个系统性的地景营造工程。这项工程的建设包括三个维度:首先是技术维度,即区块链技术、交互技术、电子游戏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智能网络技术、物联网技术;其次是一种作为社会规范与契约的规则系统维度;最后则是数字空间的内容物和功能性填充维度。

在这三个维度中,技术支持是基础动力,它规定了后两者的实现路径与准则,而“ANI”技术,即人工智能技术、智能网络技术和物联网技术,是夯实元宇宙世界连接能力与连接效能的基础,构成了技术支持中的核心部分。同时它也体现着元宇宙的四大特征——超强算力的“无媒介感”媒介连接、增强现实的沉浸体验、镜像现实的拟真世界、创造未来的虚拟世界。这四大特征与元宇宙的技术发展,形成了相对应的互构逻辑(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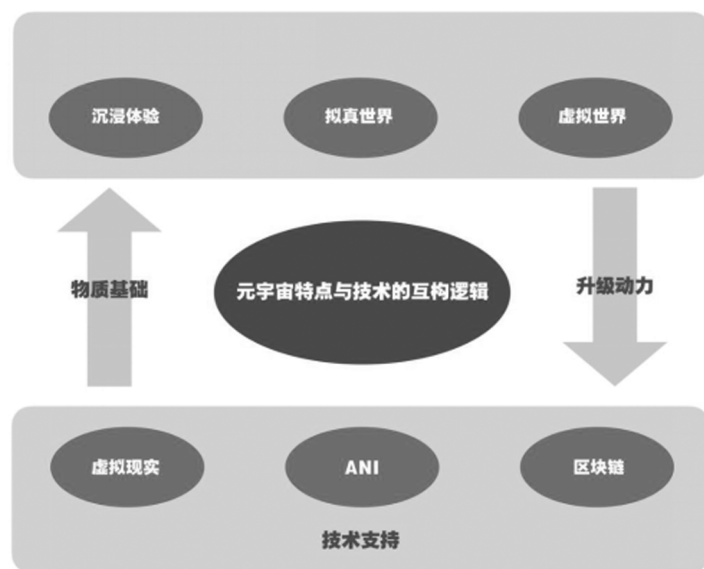


图1 元宇宙特点与技术的互构逻辑

(二) “元宇宙+文化”双向融合成为新趋势

随着国家文化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与推行,群众文化消费思维 and 习惯逐步升级,文化消费市场正在由传统的实体空间向数字的虚拟空间转变,文化消费结构发生着历史性的改变,城市的发展也跳脱出拥挤的物理空间,向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进军。而元宇宙的兴起,则让“元宇宙+文化”产业双向融合发展成为一股新趋势。2022年在上海举办的“全国首届文化元宇宙高峰论坛”,从“元宇宙文化概念、数字文化产

业新业态、元宇宙赋能产业升级”等方面,讨论了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文化元宇宙体系。^① 陈少峰等人则从文化要素结构、文化基因映射、文化舒适物供给以及文化场景生成四个维度,论述了元宇宙视域下虚拟文化空间建设的过程逻辑。^② 从实践层面来看,国内外也有许多成熟的案例支持:电音盛会“Tomorrowland”运用3D技术,在线上举办了为期两天的“The Reflection Of Love”线上虚拟音乐节;利物浦国家博物馆通过NFT的技术手段,举办“博物馆的社区记忆项目——Crypto Connections”,进一步增进了博物馆与观众的联系;在疫情防控期间,国内以中国美术馆、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各大博物馆举办了“云游博物馆”,满足了疫情防控期间群众的文化需求。

近年来国家政策也开始关注元宇宙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和文化艺术领域的双向融合。2022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强调要发展元宇宙,“数字孪生与全息呈现技术,实现高逼真、超时空的新型文化体验,促进线上线下的一体化发展等”。“元宇宙+文化”双向融合发展,将推进文化消费与文化生产走向以沉浸体验为代表的新方向。

(三)元宇宙助推数字博物馆发展模式更新

21世纪博物馆的发展方向正在进行着由审美客体的“物品”向审美主体的“人”发生转移。伴随着与互联网、潮流文化共同成长的Z世代(指出生于1995—2009年的一代人)成为文化消费的主力群体,博物馆如何在“众口难调”的文化消费环境中,实现“美美与共”,达成文化传承与审美教育的功能?目前阶段搭乘元宇宙的春风,未尝不是一种解决方案。

总体来看,元宇宙作为技术融合的集成器,对文化传媒产业将会产生颠覆性的变革,而数字博物馆作为信息时代社会美育的重要阵地,与元宇宙的融合发展也有望加速。例如,以激光扫描和3D建模为代表的数字存储与展示技术实现藏品的线上与线下双链在场;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数字藏品,让每个人都拥有打造“物”与“我”连接方式的见证,实现对藏品进行图示创作和现代化转译,在不忘本来的基础上,面向未来;以打造虚拟文化体验空间的方式,让观者实现“做中学”,在“游戏空间”中将严肃的历史文本去精英化,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如图2所示)。此外,元宇宙通过媒介的更新,将助推数字博物馆在传播方式上走向“数字化”“个性化”“沉浸化”,建立起公众与博物馆平等交流的文化场景。这区别于旧博物馆精英主义理念,而强调与大众共同携手,以观众文化需求为导向,注重文化多样化以及与人的终身教育的新博物馆学理念的核心价值追求相匹配。^③

建设元宇宙赋能下的城市文化数字博物馆,是城市肌理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模式,可以有效推动区域内文化遗产数字化整合,由二维图像记录向三维立体记录转型,实现文化保护;有效建构集体记忆场景,由文本教育向沉浸教育转变,实现文化传承;有效促进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挖掘藏品的经济价值,提高创意能力,激活文化资源价值,实现文化“出圈”。

① 赵乐梅、解学芳:《构建中国特色文化元宇宙话语体系——全国首届文化元宇宙高峰论坛综述》,《艺术管理》2023年第1期。

② 陈少峰、宋菲、李微:《元宇宙中文化空间建构与结构特征研究》,《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③ 甄朔南:《什么是新博物馆学》,《中国博物馆》2001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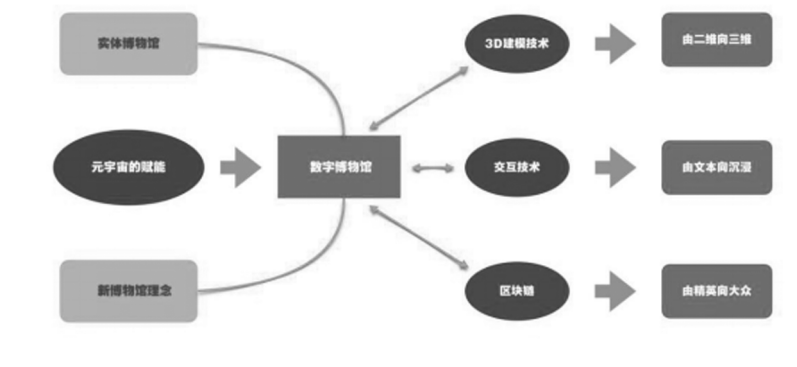


图2 元宇宙赋能数字博物馆新发展

二、元宇宙融合模式下数字博物馆发展路径的经验借鉴

（一）CyArk 项目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展示研究

CyArk 项目由 Ben Kacyra(本·凯希拉)于2003年创立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非营利慈善机构,该机构的宗旨是通过依靠激光扫描与3D建模技术,建立世界遗产的数字档案库,并通过开源的方式,向公众开放,实现保护与教育的目的。项目成立至今已经建立以包括吴哥窟、庞贝古城等在内的3D数据资源,并以开源的信息门户进行展示,实现了所有数据民主化传播,成功助推文化遗产研究与展示方式的更新。

CyArk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首先通过强大的数字测绘技术(以激光测绘与摄影测量技术为主体)和强大的算力引擎,对实体文化遗产空间实现厘米级的数字复刻,这是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技术基础。其次依托VR技术的“TAPESTRY”线上旅游,给大众打造了一个“随时在场”的数字空间,简易的操作模式和沉浸式的体验,激发了大众的参与热情。这些典型项目,可以让大众从具体的文化遗产入手,不断深化对“地球村”这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有利于数字时代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最后积极与相关机构合作与开展开放性的数据共享,实现数字资源的规模化、集成化、类型化建设,助推文化遗产的跨学科研究与交流,为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实践创新提供一个共建共享的平台。

（二）Bored Ape Yacht Club 项目的文创融合的研究

Bored Ape Yacht Club(无聊猿俱乐部)简称“BAYC”,是迄今为止NFT世界中成功的案例之一,近年来,“BAYC”通过与传统文化产业融合的方式,强化了自己的IP形象影响力。

2022年在ApeFest年会上,Snoop Dagg与Eminem联合“BAYC”发布了最新单曲《From The D2 The LBC》,在歌曲MV中,Snoop Dagg和Eminem的无聊猿化身和实景MV不断相互切换,展现了元宇宙空间的西海岸世界。同年在“MTV SHOW”上,《From The D2 The LBC》被搬上了实体演唱会空间,MV中的二维图像转化为三维立体的形象,舞台设计上更是运用了三维灯效,打造了一个奇幻的嬉皮世界。

《From The D2 The LBC》与“BAYC”联名文创项目的成功,有许多可供参考的模式。在创意设计,“BAYC”作为一个原创性的IP,在这次联名项目中,打破了基于对实体文化形象“搬运式”的“签名上链”NFT生产模式,实现了传统文化元素与自我文化形象的融合。此外,在视觉重构的创新方面是具有逻辑

关系的,通过对典型文化形象的提取与“BAYC 模式”的风格化处理,使得传统的文化元素在新的文化语境下被赋予了一种超现实的表现力。

“BAYC”联名项目,实现了人际生态的培养。通过联合互联网社交媒体,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舆情环境,以 Ape follow Ape 社群为收藏者提供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再辅之以对核心藏家进行空投 NFT,不断增强藏家与项目之间的黏性,推动传统流行文化与 NFT 的连接模式的更新。实现虚拟空间的二次生产,增强了虚拟空间内部的文化活力,与此同时,NFT 为实体文化艺术提供拓展文化创收的路线渠道,两者相辅相成,最终实现共赢。

(三)Fortnite 虚拟音乐节沉浸式体验研究

“Fortnite 虚拟音乐节”,是通过游戏引擎与游戏规则,让体验者在虚拟空间内部有了相互联系的可能,形成了具有情景化的社会体验感。

2019 年 2 月堡垒之夜创造性地与世界百大 DJ 之一的 Marshmello(棉花糖)联名,在线上举办了一场虚拟音乐会,然而这场只有 10 分钟左右的音乐会,吸引了全球超过 1000 万名玩家同时在线参与,这突破了线下音乐节 420 万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搭载 Unreal Engine5(虚幻引擎五)的游戏空间,不仅仅模拟了现实场景中的灯光效果,更加载了梦幻般的舞台场景,特别是通过实时动作捕捉技术和三维建模技术,主办方也将歌手的虚拟化身搬进了舞台中,玩家与音乐的节奏实时绑定,所扮演的虚拟化身伴随音乐的节奏做出相关的舞蹈动作。如果说 Marshmello 的虚拟音乐节是一次对现实演唱会场景的模仿,此后随之而来的 Travis Scott《Astronomical》、Easy Life《The O2》等则通过每首歌不同的意蕴与内涵,将作者的思想融合到场景构建中,每首歌曲分别对应不同的虚拟主题和互动环节,形成了创作者音乐空间的超元宇宙,真正实现了对无形意境的数字诗画呈现。

Fortnite 虚拟音乐节可以说是沉浸体验的典范模式,高质量的虚拟空间模型,极大程度地吸引了文化体验者参与到虚拟文化空间生产中;从 Fortnite 虚拟音乐节的嘉宾模式结构上看,多为欧美乐坛的顶流人物,他们所带来的强大的文化号召力,有利于快速地将虚拟空间的项目带入文化体验者的视野中,实现广泛的虚拟空间文化参与;与此同时,玩家在虚拟空间中拥有极强的互动感与自由度,在每个沉浸场景中,玩家通过不间断地刺激可触发点,实现场景的变化。超现实空间的“真实物理感”的塑造,以及玩家可根据个人文化认知,对虚拟角色进行特定的选取,都使得虚拟空间的构造上坚持了以“文化主体”为导向的建构模式。

以上三个案例,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利用元宇宙的架构逻辑,助推数字博物馆更新升级的建设经验,即通过数字扫描、数据修复、3D 建模、档案规划等方式完成博物馆的保护职能;通过区块链和 NFT 等方式进行研究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和市场营收;通过沉浸空间的打造推动文本教育向沉浸教育的转向,赋予观者新的文化权利。这三大方向符合了新博物馆理念对“人”的赋权,也是元宇宙“以人为本”建构理念的生动诠释。无论是元宇宙或是数字博物馆,都是人理解自我、国家、民族记忆的媒介,它们将赋予更多普通人接受文化教育的实践权利,促使个体对社会文化资源的调动半径不断扩大,文化实践能力进一步得到释放,人的意志和情感将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而被重视,最终达到“技术为人服务”这一亘古不变的科技发展逻辑。

三、武汉城市文化数字博物馆的设计路径

城市文化数字博物馆的建设主要包括技术手段支持、文化资源整合与利用、虚拟文化空间建设三大要素。其中,对于城市文化资源的整合是灵魂所在,它主导着虚拟文化空间中文化景观的塑造,影响着空间中参与群体的核心价值走向。实现区域内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利用,就是要在正确解读城市文化精神内涵的基础上,遴选出可以引发群众共鸣的城市文化符号,依靠历史沉淀而在特定区域形成的“地方感”召唤,激发人们的恋地情结^①,从而实现城市文化数字博物馆中文化内容物的精准填充。

(一)武汉城市文化精神的内涵解读

冯天瑜等人指出,长江流域按上、中、下游划分,依次为巴蜀—荆楚—吴越三大文化区域,形成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流域文化特征。^②荆楚位于长江流域的中心地带,其文化在长江流域文化共同体的交流互济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沟通交流的作用;武汉地区作为荆楚文化的重要地理区域,是长江流域的心脏,兼具人文与自然的地理优势,具有丰富的人文历史遗产。

武汉城市文化研究学者涂文学指出,长期的商业活动,形成了武汉人民崇实尚利、诚实守信的商业文化;长期的革命斗争,形成了武汉人民富于韧性、负重前行的坚强秉性;与此同时,优异的科教环境,形成了武汉人民锐意革新、勇立潮头的创新理念。依照这三大具有武汉特色的精神品质,我们可以设计相对应的数字文化体验线路,如以汉口近代建筑群为代表的中西文化融合带,在数字博物馆的展示过程中,利用元宇宙带来的媒介更新,要尽量做到“修旧如旧”“可游可居”“随时在地”;在设计以八七会议旧址等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体验线路中,要以纪念遗址为线索,实现空间的延伸,通过沉浸式游戏场景的设计,让观者通过“数据躯体”了解中华民族的近代斗争史;最后在创新精神这一板块,要合理利用数字藏品这一手段,对武汉地区具有开拓创新的记忆、传统的“非遗”文化、新兴的城市小众文化,进行有针对性的线上社群的打造,让个体能够在集体中发声,在与古为徒的过程中,也要允许娟娟发屋的书写。这以城市精神为线索的三大板块,将与下文中以三镇空间为线索的空间区域分析,相互交叉共同构成城市数字博物馆的设计的索引线路。

(二)武汉中心城区城市文化空间分布格局

武汉拥有独特的建城方式,“汉口、汉阳、武昌”三镇鼎立,互相联通,以下将根据武汉文旅名录,将武汉地区的文化舒适标识划分为文化标识类(历史古迹标识、革命文化标识、中西方融合文化标识)和公共文化服务类(以博物馆、美术馆为核心,文化创意街区为辅助)这两大类五小类,统计三镇各自区域内国家级文化标识物分布状况,由点连线及面,形成了一张武汉文化空间分布的脉络网络数据可视化统计图。

综合来看,三镇都十分重视对革命文化遗址的保护,且区域内的传统古迹也得到了重点关注;在文化创意街区的打造上,三镇结合自身不同的优势,形成了有区域特色的“文创步行街”。分别来看,受城镇发展的历史与政策影响,三镇的文化发展各有侧重,汉口(江岸、江汉、硚口)拥有悠久的商业传统,先天所具

① 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9,第5页。

② 冯天瑜、马志亮、丁援:《自然与人文双优的长江文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有的先锋性,使汉口的文化空间极具包容性;武昌作为传统的文教老区,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它的独特优势,同时作为打响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第一枪地区,革命红色文化在武昌也得到了传承,丰富的教育资源将成为未来武昌数字文化空间打造的重要引擎;汉阳作为工业实力雄厚的区域,虽然在城市文化历史深度上与其他两个区域相比有所不足,但汉阳以古琴台为基点打造了良好的文化服务集群,此外“汉阳造”已然成为汉阳地区的品牌形象,未来汉阳通过对传统工业文明遗留区进行更新,在保留区域特色文化肌理的同时,打造工业文明遗留区的文化创意发展新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武汉也拥有诸如汉剧、楚剧等“非遗”资源,它们大多通过“非遗”传承人的方式进行保护,依托地方剧团得到发展,同时对其展开数字化赋能,打造数字“非遗”博物馆,将是未来“非遗”发展的方向之一。

(三)武汉城市文化数字博物馆的设计路径

不同的文化类型在数字化的过程中,由于保护形式与传播要求的不同,需要运用不同的技术手段与建设模式。根据上述文化空间的划分,本文将其实体文化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红色文化遗产三大类,通过类比“CyArk项目”“BAYC《From The D2 The LBC》项目”“Fortnite 虚拟音乐节项目”,提出武汉城市文化数字博物馆建设更新的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以汉口近代建筑群为代表的实体文化遗址,可类比“CyArk项目”建设逻辑,利用激光扫描技术和摄影测量技术,对目前保留程度较高、史料价值较大的实体文化建筑、街道等进行数字化的转译,通过建筑信息模型技术进行三维模型的复原,之后运用二次建模进行模型修复,虚幻引擎进行空间渲染,在虚拟空间中实现对原真空间的数字化模拟,最后针对不同人群的需求,建立分门别类的“开源数据库”和沉浸体验的“数字旅游”平台,在满足保护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公众更广泛、更高质量地参与到数字文化遗产建设当中。

第二种模式,是以汉绣、汉剧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类比“BAYC《From The D2 The LBC》项目”的设计与运营方式,通过NFT解决文化遗产传承人被侵权问题。“非遗”作品通过数字铸造、作品转译上链,生成不可篡改且具有唯一性质的确权代码,从源头上杜绝作品在互联网空间“冒名顶替”的侵权行为。同时,基于NFT的智能合约系统和可编程性,引导公众深度参与,来激发“非遗”藏品的活力,创新“非遗”的保护形式与参与模式。最后,在“非遗”作品的数字化创作过程中,要坚持原创性,引领“国潮风尚”,在传承经典技艺与深入挖掘传统审美元素的同时,结合当代审美表现,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创意风格,积极与其他艺术门类融合,取长补短,展开跨领域合作。

第三种模式,是以八七会议旧址为代表的红色革命文化遗产,可类比“Fortnite 虚拟音乐节项目”的表达模式。在根植红色文化历史的基础上,运用游戏引擎和游戏规则的体验逻辑,打造符合历史场景的虚拟历史空间,以参与者为第一视角,赋予其历史空间身份,形成一种游戏闯关式的体验路线,场景之间的转换既要合乎历史事实的逻辑,又要强调一种艺术化的起承转合;此外,要增强虚拟空间中的可互动性,通过参与者与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参与者与数字化历史形象的互动,让参与者在虚拟空间中不仅仅局限于“观感体验”,更强调“可玩性”,激发参与者自主融入空间叙事逻辑,带着线索主动寻找革命精神代代相传的路线。

基于上述武汉城市文化数字博物馆建设的三大方向,通过不同的技术手段赋能不同的文化遗产,最后统筹规划建立一个开放式的门户网站,为游客和市民提供一个参与武汉城市文化虚拟空间的入口。

四、结论和建议

城市本应该是一本形象指南,讲述地区的现实生活与历史记录,作为一个人类文明的象征和标志而存在。^①当代城市的更新发展理念已经从传统的“大拆大建”的物质形态改造,转向了“润物细无声”的在地性文化形态塑造,那些曾经受高速城市化发展而被割裂的城市文脉、文化遗产、风俗人情需要我们将之重新唤醒,打造有底蕴的城市肌理。通过当代数字虚拟技术建设城市文化数字博物馆,将打破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壁垒,以线上线下并行发展的方式,实现博物馆与城市文化的互利共赢,为城市文化空间的更新提供更加开拓的思路。

《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探索发展数字文化大众化实体体验空间,加强数字艺术、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文化业态在公共文化场馆的应用。由此可见,当今人民群众对文化消费的需求提出了更高的精神要求,城市文化数字博物馆的营造逻辑,降低了人民群众文化参与的门槛,让参与主体由“走进城市”到“走进文化”,变“听说”为“参与”,由“走马观花”到“沉浸互联”,人民群众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城市的脉动。

城市文化数字博物馆的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以贯之的长期积累。支撑数字世界建设的六大技术要素——“BIGANT”的发展程度,决定了数字博物馆的表达方式;跨学科交叉人才的储备深度,决定了数字博物馆的发展动力;现实空间中的文物研究与考古发掘,决定了数字博物馆的发展上限;合理处理数据公开的风险以及版权纠纷的能力,决定了数字博物馆的发展底线;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要克服因只重视商业效能和情感发泄而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这决定了数字博物馆的社会效能;要确保数字博物馆的持续更新能力,这决定了博物馆与群众之间的文化黏性。这六大“决定”是在元宇宙赋能下,城市文化数字博物馆的价值评判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文化数字博物馆的建设不应该沉浸在技术狂欢的浪潮中,从而导致“文化失语”、核心价值错位的现象。科学技术对于城市文化的更新发展而言,是一种启发性的思维浪潮,但真正令城市文化获得长久生命力的是永恒不变、触动人心的那一部分。

武汉城市文化数字博物馆的建设,符合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虽然目前元宇宙概念下的数字博物馆建设还处在萌芽阶段,前方还存在着许多未知的挑战,但时代发展的车轮是滚滚向前永不停歇的,我们要积极探索传统文化遗产与当代文化相结合的新途径,满足人民群众线上线下的双线文化体验消费新需求,牢牢把握新时代文化生产的新高地,借助数字技术将中华文化精神推向世界舞台。

基金项目:江汉大学2022年度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数字加密艺术概念下的区域文化符号虚拟视觉化研究——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武汉段)建设为例”(项目编号:S202211072049)。

作者简介:

陈为铮,江汉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系本科生,研究方向为新媒体视觉与创意表达;

涂戈尔,江汉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化产业与市场研究。

(责任编辑:王俊)

^① 涂戈尔:《以数字虚拟文化空间营造为导向的城市更新》,《江汉学术》2023年第5期。

Z世代大学生就业心态及其引导策略

——基于武汉部分高校的调查分析

邹梦瑶

摘要:作为今后一段时期职场新生主力军,Z世代(指1995—2009年出生的人)大学生就业心态的考察与分析对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研究通过对武汉部分高校大学生的实证调查,从就业形势感知、择业倾向认知与求职策略预知三方面揭示了当前Z世代大学生的就业心态具体表现。研究表明,在严峻的就业形势、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以及混杂化的信息渠道等因素综合影响下,Z世代大学生在就业认知与就业期望上表现出多重矛盾心态,并进一步呈现就业压力两极化、职业理想模糊化以及就业认知片面化等风险趋势。引导Z世代构建积极的就业心态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需要从完善就业支持服务体系、深化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营造多元健康的就业氛围以及探索推进全过程职业生涯教育等多方面协同发力。

关键词:就业心态;Z世代大学生;政策引导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社会稳定与发展之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作为重点就业群体,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关系民生福祉、经济发展和国家未来。

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与社会流动的加速,使得大学生群体就业态度也处于不断流变过程中,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世代分析是青年研究重要的分类视角,国内通用的青年世代符号有“80后”“90后”“00后”等;在欧美,则有X世代、Y世代、Z世代等。受全球化影响,国内世代分析逐渐与国际接轨,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界定,Z世代是指1995—2009年出生的人,也即“95后”和“00后”。不同于前几代,我国Z世代成长于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新科技蓬勃发展的时代,被誉为“新媒体一代、新知识一代、新判断力一代、新文化一代”。但同时,作为高校毕业生的主力军和后备军,Z世代又面临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竞争白热化的现实压力。近年来,“孔乙己文学”“00后整顿职场”等一系列教育和就业热门话题频上热搜,反映出Z世代大学生就业心态正在发生集体性、代际性变迁。从社会调查来看,前程无忧发布的《2023职场代际群体洞察》指出,Z世代职场人“自我经营主体”特征突出,更关注工作压力和团队氛围。58同城发布的《2023年毕业季调研数据报告》、智联招聘发布的《2023大学

生就业力调研报告》则显示,毕业生选择体制内就业和“慢就业”比例在近两年呈上升趋势。实证研究方面,有学者通过抓取“毕业去向”“就业评价标准”“就业考虑要素”“择业方式”四个方面偏好分析了“95后”大学生就业态度功利化倾向。^①有学者则进一步指出大学生就业的“体制内偏好”和“地域偏好”存在内部结构动态变化趋势。^②还有学者调查发现,青年职业观念与生活环境、职业发展前景、进取精神等密切相关。^③整体上看,我国Z世代大学生就业心态相关的既有研究正在逐步丰富,并有待更具象且深入的剖析。据此,本研究以武汉地区三所高校在校大学生为对象开展就业心态问卷调查,试图从就业形势感知、择业倾向认知和求职决策预知三个维度呈现Z世代大学生就业心态的矛盾特征与潜在风险,并尝试提出相应的引导策略。

二、Z世代大学生就业心态的具体表现

本研究共选取武汉三所高校^④在校本科生作为抽样对象,采取分层比例抽样的方式,根据院校特色分别从每个学校抽取相同专业不同年级的2~3个班作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星定向发放网络问卷,发出33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回收301份。调查对象为1998—2004年出生的人,基本情况如表1:

表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样本信息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54	51.2%
	女	147	48.8%
年级	大一	95	31.6%
	大二	99	32.9%
	大三	30	10.0%
	大四	77	25.6%
专业类别	自然科学类	152	50.5%
	人文社科类	149	49.5%

经过对调查结果的整理和分析,发现武汉地区Z世代大学生整体上仍呈现出理性、主动的精神面貌,但同时,在具体维度上又呈现焦虑敏感、务实求稳、本领恐慌与意向迷茫相互交织等异质化特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就业形势感知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上升,在疫情冲击、产业结构调整、网络信息化等时代性环境因素叠加

① 刁莹、徐宝贵:《95后本科毕业生择业价值观的分析和对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

② 刘保中:《时代变迁与就业选择:新时代大学生就业意愿的新特征》,《青年探索》2020年第1期。

③ 曾燕波:《“佛系”抑或奋进:青年职业价值观调查》,《当代青年研究》2018年第6期。

④ 含部属高校1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省属高校1所(武汉科技大学)、市属高校1所(武汉商学院)。

影响下,大学生就业市场供需矛盾突出。在此背景下,Z世代大学生对就业形势和职场前景均表现出了较为悲观的心理预期。

1. 风险意识上升,对就业市场变化高度敏感

调查显示,认为当前“就业形势非常不好”和“就业形势不太好”的受访者分别占比 54.49% 和 22.92%,也即近八成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而在“当前就业形势不利因素”的调查中,受访者认为“经济增速放缓加大就业压力”“就业信息不对称,政府、学校、用人单位及学生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以及“高校扩招导致的阶段性人才过剩”是影响当代中国大学生就业的主要不利因素。

2. 焦虑情绪明显,对未来就业形势态度悲观

在本次调查中,对所学专业的就业前景持较为乐观态度和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分别占比 23.92% 和 28.26%。结合当前热点舆论话题“孔乙己文学”来进一步考察 Z 世代对当前就业形势的深层认知。可以发现,尽管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表示对“孔乙己文学”反映的“学历预期与现实反馈的巨大落差”有不同程度的共鸣,但只有三成左右的受访者认同其背后代表的“自我设限,踌躇不前”的价值观。这说明,虽然就业形势严峻给 Z 世代大学生带来了普遍的压力感知,但他们并不认为学历真的是他们自身脱不下的枷锁,也并非决定个体成败的唯一因素。

3. 权利意识突出,追求公正平等的职场秩序

调查数据显示,Z世代大学生对自身特质的定位集中于有主见和个性、不愿受拘束(78.4%)、强烈的网络表达欲(68.1%)、多元的价值观念(66.8%)和开阔的认知视野(57.8%)等方面,这些特质与 Z 世代成长环境密切相关,也在其社会参与过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如针对“00 后整顿职场”这一现象,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7.5%)持“支持”或“十分支持”的态度。谈及“00 后整顿职场”议题对未来职场发展的影响,受访者更多肯定了其正面价值,认为“能够推动职场改革,促进用人单位尊重劳动者的合法权利”“有利于鼓励人们在面对侵害自身权益时勇敢斗争”,但也认识到该话题可能会进一步强化“社会对 00 后产生‘不服管,惹不起’刻板印象”等负面效果。这说明,Z 世代的主体权利意识突出,敢于善于维护自身权益,但在职场认知方面又并不完全受情绪主导,而是能够较为理性地认识到与自身特质相关的热点话题可能产生的双重效用。

(二)择业倾向认知

相较于前几代人,Z 世代的成长环境和发展条件更加优越,也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在此背景下,Z 世代的择业倾向呈现出了体验感至上、强调“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兴趣与职业的结合”、短期职业目标保守务实等特征。

1. 体验感至上,不愿“为了生活而工作”

在关于择业影响因素的调查中,最受关注的依次是“薪酬(80.4%)”“喜欢的工作内容(56.8%)”和“稳定的工作前景(54.5%)”“良好的 work-life balance(54.2%)”与“和谐的职场关系(36.9%)”。可以看出,Z 世代的择业倾向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态势,呈现出物质追求与精神享受并重的特点,对工作氛围等软性条件更为重视,表现为“既要有生活,也要有工作”的态度。

2.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看重个人兴趣与工作岗位的匹配度

在“最关注的工作属性”的调查中,除“高薪(70.4%)”之外,“热爱”“价值感”和“成长”是较受关注

的工作属性,分别占比 68.4%、68.8% 和 52.8%。对于 Z 世代而言,工作不再是解决生存焦虑的重要手段,而是通往理想生活方式的途径。因此,Z 世代更愿意将个人兴趣与工作结合起来,在就业选择上更倾向高成就感、高获得感的工作,希望从工作中获得乐趣和愉悦。

3. 存在保守倾向,创业意愿不高

在“最关注的工作属性”的调查中,创造是最少被关注的工作属性,只有 33.9% 的人选择了该选项。而针对“毕业后去向”的调查中,选择“自由职业”和“自主创业”的受访者分别占比为 22.3% 和 15.6%,相对较低。可以看出,在经济环境更加趋于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Z 世代大学生的就业意向趋于稳定保守,在锚定职业目标上呈现“求稳”态势,创新创业的热情不再高涨。

(三)求职策略预知

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就业模式更加丰富,就业选择更显多元,Z 世代的求职策略也随之发生变化。一方面,“毕业就工作”不再是第一选择,“慢就业族”和“待业族”正兴起;另一方面,受本领恐慌和信息焦虑的叠加影响,就业规划不够明确,迷茫心态仍然较为普遍。

1. 求职态度积极,但就业信心不足

九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就业是人生中的必经阶段。在“毕业后预期取向的调查中”,排名前三的依次是市场化就业(54.2%)、深造学历(47.8%)以及体制内就业(43.2%)。而大学期间的就业尝试主要是兼职(56.8%)和实习(41.2%),自主创业仅占比 4%,还有 27.2% 的人没有相关就业经历。可以看出,在大学毕业前,进行过就业尝试的学生整体占比不高,因而社会实践能力相对较为薄弱。当然,不能排除受前三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进一步调查显示,最困扰大学生求职的三大因素依次是“缺乏实践和工作经验(75.4%)”“就业信息不足(56.8%)”以及“缺乏人脉资源(55.1%)”。

2. “慢就业”心态普遍,学历深造成为求职失败后的第一选择

“慢就业”是当下 Z 世代毕业生的显著特点,越来越多的 Z 世代年轻人告别传统的“毕业就工作”模式成为“慢就业族”甚至“全职儿女”。据智联招聘 2023 年 5 月发布的《2023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3 届毕业生中,“慢就业”比例从 2022 年的 15.9% 上升至 18.9%,接近总体的五分之一。而本次调查也显示,如果毕业季求职暂未找到理想工作,大多数受访者会选择深造学历(45.5%),其次是先就业后择业(35.9%),少数人选择待业,直至找到理想工作(11%)或自主创业(7.3%)。

3. 本领恐慌与信息焦虑叠加,就业规划模糊

后疫情时代下严峻的就业形势已成为 Z 世代大学生的共同困境,在就业心态的影响因素中,近八成受访者认为“就业市场形势”是最主要的压力来源。在就业预期方面,大学生呈现出了低自我效能感的倾向,表现为就业信心的低迷和对个人发展的不确定。此外,对专业前景的不看好、求职经历的欠缺以及父母家庭的期望和同辈之间的比较压力也是重要的负面影响因素。“焦虑”“迷茫”成为后疫情时代大学生的普遍心声。调查显示,对自己今后的就业方向有明确规划的受访者不到 10%。

三、Z 世代大学生就业心态的矛盾特征及其根源分析

青年的个体发展总是体现着时代的特征,在严峻的就业形势、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以及混杂化的信息渠道等多重因素影响下,Z 世代大学生的就业心态正呈现出就业压力两极化、职业理想模糊化以及就业认

知片面化等风险趋势。

(一)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糅合,就业压力呈现两极化趋势

一方面,在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影响下 Z 世代大学生就业动力相对不足。作为享受改革红利的一代,Z 世代大学生大多成长于中国“富起来”的历史进程之中,成长过程中较少感受到物质的匮乏。本次调查样本中,45.8% 的大学生认为对自身家庭经济情况的评价为“小康”,仅有 9.3% 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家庭条件贫困。家庭社会资本的提升给 Z 世代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底气,使得其对工作的经济依赖性下降,更多呈现出对自由的追求、对个人兴趣和发展的重视等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慢就业”“跨专业就业”“灵活就业”逐渐成为 Z 世代毕业生求职就业新常态。

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带来的群体性焦虑又持续激化着 Z 世代的择业压力。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增速换挡期,青年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流动性放缓、机会减少,因而对就业形势整体呈现出消极的认知态势。同时,从时间推算,大部分 Z 世代在大学期间经历了疫情,“风险社会”的整体性危机、“加速社会”的时间焦虑等一系列叠加的现实背景加剧了 Z 世代的就业焦虑。社交平台上曾有学生总结道,2020 年以前的毕业生更倾向付出高昂的时间成本去尝试大厂内的各种不同岗位;而现在的毕业生则更强调工作生活平衡。对互联网公司的“笃定”,相信“未来会更好”的乐观,变成了追求“及时行乐”和不要“一眼看得到头的生活”。

总体来看,Z 世代大学生承受着结构性张力的塑造,他们成长于代际快速更替、中西思潮交汇、时代不断加速的背景之中,其就业动机呈现出从谋生到自我实现的融合转型趋势,表现出了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大学生中的糅合与矛盾。结合调研结果来看,一方面,物质需求不再是他们最迫切的需求,Z 世代大学生对工作意义的定位更为丰富、多元。但与此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又培育了其较强的风险意识和务实精神。因而,在理想与现实、付出与回报的两极化对比中,Z 世代往往可能通过拖延来等待和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

(二)个体追求与现实境遇碰撞,职业理想存在模糊化倾向

对 Z 世代大学生来说,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不是能否找到工作,而是 Z 世代对高质量工作岗位的需求和高质量工作岗位的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处于转型时代进程中的 Z 世代大学生们,其就业价值标准更多表现出市场经济色彩,呈现出更多的自主意识和竞争意识,“哪里需要去哪里”的传统择业观不再成为主流。享受改革红利的一代对未来有更高的预期。但是严峻的就业形势又会让大学生充满务实和理性。就业期望与就业选择背后所展现的私人事务与社会事务的异构本质,造成了大学生入学时对未来生活的踌躇满志与毕业时对个人前途的苦闷彷徨的反差状态。

与此同时,很多年轻人对于工作的一种普遍感受是,工作的价值感和意义感似乎在不断消失。分工的细化,让个体在大系统中找寻自身的独特意义变得更加困难。劳动呈现出一种工具理性的样态。当代的年轻人经历的不是经济贫困,而是意义贫困。因而,倾向于通过“躺平”“佛系”等去意义化的自嘲来尝试消解自身的无力感。规划不清、自我实现困境、社会认同减弱等问题在 Z 世代大学生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Z 世代大学生自我关注与他人视角并存,既存在传统就业思维定势,又具有先进就业理念;既想实现自身价值,又担心无法承担试错风险。因此,在就业决策出现两难时,往往陷入矛盾、纠

结甚至逃避的态度。

(三)信息过载与信息匮乏同存,就业认知存在偏差风险

一方面,互联网作为青年大学生获取社会信息的主渠道,在就业薪资预期、职业选择偏好、职场认知等方面对青年大学生存在认知误导。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Z世代大学生在就业价值观形成、职业意向、就业行动中,会融入许多互联网偏好。通过网络渠道获取自己想要的就业信息,借助网络平台开展求职行为等等。同时,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大学生对互联网上的各类就业信息并不具备较强的分析和甄别能力。互联网的部落化加剧了大学生就业信息获取的单一化,单向度虚假信息长期浸润加剧错误认知升级,而大学生实践不足导致信息纠偏机制不畅^①,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大学生对真实就业市场的认知。互联网舆论对大学生就业认知的误导,是互联网平台逐利机制与大学生尚未成熟的心理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存在着不断强化的趋势。

另一方面,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新兴行业的快速崛起也对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各类就业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现实中大学生对行业发展趋势与职业了解仍然存在很强的滞后性。在关于“现行高校教育模式对当前大学生就业的影响”调查中,约70%的学生认为“学生实践教学薄弱,学生实践能力差”是其感受到的最主要负面影响。同时,60%的学生表示“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是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此外,还有近半数的学生认为“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滞后”以及“就业指导与创业教育工作不理想”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些受访者指出,只有教写简历的课程有点用处,但是老师分享的优秀简历模板也过时了。甚至于怎么美化实习经历,用什么样的话术跟HR沟通,聊薪资时怎么讨价还价,这些具体可用的信息都是小红书教给他们的。

四、优化引导Z世代大学生就业心态的建议

透过教育和就业热点现象看本质,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作为一种价值观念,青年人的就业心态高度嵌入制度化的社会结构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②。大学生就业观培育也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发力,共担大学生就业教育的时代重任。

(一)分类化做好就业观念调适与引导,全面增强Z世代就业信心

一是加强对就业观健康发展的引导。做好学生职业意识启蒙及价值观教育,加强对大学生就业意识的启发和积极就业心态的培育。加强毕业生求职意向和求职进展的摸底跟踪,分类帮扶毕业生调整就业预期、明确求职定位;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每一名大学生个体问题,既要加强对学业困难、经济困难、心理困难等学生群体的个体指导,也要做好考研学生、“考公”学生、出国学生、创业学生的分类教育。针对当前“毕不了业”“要二战”“啃老”等情况,做好其就业思想工作,针对“求稳”“佛系”“躺平”等情况,究其缘

① 张刚生:《互联网舆论对青年大学生就业认知的误导与对策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5期。

②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第280页。

由,帮助学生调适就业心态,以正确的心态应对求职。加强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教育培养,引导树立多元灵活的就业观。

二是做好就业心理咨询辅导。跟踪掌握就业困难学生群体的就业进展并及时给予帮助,主动关注消极被动就业学生群体的心理状况,开展心理咨询服务,有针对性地采取成熟有效的干预措施缓解大学生的就业焦虑情绪,及时纾解就业压力。引导学生将个人就业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教育其关心国家就业创业的政策风向,适时调整自身的就业期望和职业目标,鼓励其积极投身新产业、新业态就业和灵活就业。

三是积极引导正确的就业舆论,不断提升主流就业观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倡导胸怀“国之大者”的择业观和“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价值理念,鼓励Z世代放宽择业目光,积极投身于推动时代进步与发展的社会事业,“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就业创业。同时,要推动构建以家庭教育为核心的就业观生成场域。以热点话题“全职儿女”为例,现代家庭的养育模式在给予大学生权利和自由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大学生的责任教育。因此,需要适度强化对Z世代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和独立意识的培养,激发Z世代自我发展的内驱力和效能感,拓宽青年“人生之岸”。

(二)系统化推进全过程职业生涯教育,指导帮助Z世代锚定职业方向

一是进一步扩大职业生涯教育的范围。“生有涯而学无涯”是智慧,“学有涯而生无涯”是现实。面对诸如无边界职业生涯和多变性职业生涯等新职业思潮的影响和冲击,需要探索推进全过程职业生涯教育,助力Z世代大学生在时代进程中构建起明确的人生价值定位。一方面,教育部门和高校要进一步完善职业发展和就业指导课程体系,统筹联合企业、社区等社会资源开展生涯规划教育。另一方面,进一步放宽、延长毕业帮扶范围与年限,把职业教育的内容从技能扩展到职业观念、职业信心、职业认定等更多维度,从而帮助大学生们逐步顺利完成成年身份与角色的转型。

二是引导大学生不断更新拓展对自身和就业市场的认知水平。鼓励大学生结合个人兴趣特长与发展规划,主动适应国家、社会和市场需要,充分了解就业形势以及就业市场的需求,动态掌握就业环境的发展变化,构建对就业外部环境和自身就业能力的动态评价与综合认知,合理制定职业规划,调整就业预期,避免选择性失业或人才供求的错位,以多元择业观破除传统就业观念的束缚。

三是强化不断线的就业指导与服务。搭建各类智慧服务平台,为高校、企事业单位和毕业生提供一站式、数字化以及线上线下一体化智慧就业平台和供需服务。^①实现招聘联动、信息共享、精准输送,推进信息智慧匹配,打造高效的学生就业信息获得渠道,用Z世代喜欢的、习惯的方式有效发布和投送就业资讯;支持高校积极引入优质的行业咨询公司、人力资源服务等第三方机构,为Z世代就业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专业性解答与指导。

(三)协同化开展就业服务的建设与保障,多维重塑Z世代就业认知

一是全方位提升大学生综合就业能力,帮助其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支持高校以就业为导向打

^① 许涛:《共同富裕与高校大学生高质量就业: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审视》,《黑龙江高教研究》2022年第12期。

通“专业—学业—就业”的教学闭环,将就业教育前移并贯穿到学生学习全过程,辅导大学生制定职业发展规划,引导唤醒学生就业意识,推进企业实习、职场体验等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保证青年学生能够在进入职场前,对社会形势、行业发展、职场环境有初步认识,帮助其规避因“不了解”而产生的迷茫或纠结。通过开展信息甄别、行业分析、洞察力提升、创新思维等训练,帮助其具备就业环境分析的能力,助力其有效进行就业决策。教育引导大学生积极地应对就业环境中的消极因素,充分发挥互联网求职便捷优势,积极开拓视频简历求职等新的求职方式。

二是以市场需求带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促进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精准匹配。探索推进高等教育供给端的改革,支持高校聚焦国家产业需要、高等教育需要和用人单位需要,优化学科专业建设;鼓励高校立足地方产业布局,明确学科优势,着眼于毕业生市场供需双方高适应性的长远对接,衔接好行业发展和企业发展需求,进一步加强校企联合共建机制,深化校企合作,并将其岗位要求和用人标准有机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加快培养“定制式”人才,持续提升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契合度,让每一个有就业意愿的大学生能够在就业市场中找寻合适机会。

三是推出更具吸引力的就业激励政策,全面拓宽 Z 世代大学生就业渠道和就业空间。目前“有业不就”与“无业可就”的现象并存,一方面,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开发政策性岗位,进一步扩大“特岗计划”“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中央基层就业项目,鼓励开发城乡社区服务等基层公共管理岗位。同时,积极开辟市场化空间,支持新增投资向高校毕业生就业带动强的项目和领域倾斜,建议政府对各类企业招用应届高校毕业生分层分等级给予就业补贴、社保补贴和税费减免等。另一方面,加快营造更加公平、宽松、活跃的就业环境,规范就业者的安全、作息、薪酬等劳动保护标准,引导和支持高校毕业生积极运用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创业,鼓励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创造更多弹性化、多元化、灵活化就业。

作者简介:

邹梦瑶,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责任校编:熊莉)

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 和压力来源研究

——基于武汉市六所中小学师生的调查分析

张玉

摘 要:中小学时期是人的行为、性格和智力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由于身心变化较快,加之文化知识及社会经验不足,中小學生很容易产生不健康的心理,导致心理问题或心理疾病。近几年来,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十分突出,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本文选取武汉市6所不同类型的中小學校,在对学生心理压力来源调查的基础上,从多角度和不同成长阶段、环境、人际关系等方面探求引发中小學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为中小学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寻求路径、方法。

关键词:青少年心理健康;心理压力来源;不良情绪;抑郁症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不仅需要物质保障,更需要精神赋能。近几年来,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成为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聚焦的热点。《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患抑郁症人数达9500万人,18岁以下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中小學生厌学、抑郁现象严重制约其身心健康发展,了解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压力来源,有效改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已成为家长、学校和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一、国内外青少年心理健康理论和文献研究

国外心理健康教育从19世纪末便开始萌芽,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而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小學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受到全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陆续出台了很多支持中小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政策。

马炎楚、赵伟(2023)^①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国知网为数据来源,对1992—2022年701篇外文文献和201篇中文文献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研究热点方面,国内外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群体都集中于学生,国内的研究内容主要围绕现状分析、教育对策、模式探索、师资队伍建设展

^① 马炎楚、赵伟:《基于CiteSpace的国内外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现状及趋势》,《校园心理》2023年第2期。

开,而国外除了对问题行为进行干预研究之外,也更关注教师和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研究前沿方面,国内对心理教师的研究热度呈上升趋势,国外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前沿是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研究演进方面,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是从摸索期到稳定发展期再到冷却期,研究主题逐渐多元化,由宏观层面的政策引领逐渐细化深入对不同心理问题的预防方法等,研究群体也在逐渐扩大,由学生扩展到心理教师。国外对该领域的研究经历了缓慢发展期、稳增长期和爆发期,由关注对问题行为的矫治到关注学生的情绪、学业等问题,研究范围更加具有综合性与多样化。

总体来说,国内外的心理健康教育都秉持预防大于治疗的原则。国外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更重视生命早期的阶段,重点在心理健康社区、家庭伙伴关系、学习抗逆力、早期支持和共同应对等方面。培养教师对学生心理问题的识别与干预手段,也会开展关于改善教师心理健康的干预措施,让社会全体教育工作者通过专业能力的培养,促进和支持积极心理健康,以满足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需求。

而我国关于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理论方面至今依然围绕政策展开,关注重点是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症状类型、影响因素等方面,并且多采用问卷法进行调查,常用的测量工具主要有心理健康诊断测试(MHT)、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MMHI-60)三个量表等。总体来看,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心理健康的判定标准暂未统一,这对心理健康研究结论的一致性产生影响;其二,研究工具不统一,研究者所用的量表各不相同,常见的量表中只有一部分是专门针对心理健康编制的;而且目前常用的量表多是测查有无心理症状,没有评估被试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对其未来的发展状态也没有涉及;其三,检出率结果不一致,不同的研究结论具有矛盾性,对检出症状的严重程度没有设定统一标准,因此很难进行群体间的比较。

导致青少年精神疾病的原因主要有两类,一个是生物性因素,主要指先天遗传等情况;另一个是社会心理因素,主要是家庭和社会给孩子心理带来的伤害。因生物性因素导致的精神疾病中,有一部分是可以痊愈的,另一部分虽然不可治愈,但能够做好预防工作以避免发病。而社会心理因素方面,多位相关专家都表示这是近年来导致未成年人精神疾病增加的主因。家庭缺乏温暖、学校竞争越来越激烈、社会评价急功近利等,都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①

综上所述,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因素众多,探讨其相关影响因素,需要考虑多种影响因素的重合效应,既需要重视其生物性因素,还应该重视在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背景下社会因素和整体教育系统对其的影响。

二、武汉市青少年心理健康现实状况

早在2009年,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主任王晓萍教授就注意到未成年人患精神疾病比例迅速上升的情况,她表述了自己的担忧:“心理问题若处理不好,很多情况下会发展成为精神疾病。”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病区负责人介绍:从门诊和住院情况看,未成年人精神疾病患者越来越多。该中心儿童精神疾病患者原来和成人混在一起住院。早在2007年该院就收治了200多名孩子,而2008年由于未成年人数增加太快,成立了专门的儿少病区,时至今日仍然难以满足需求。近年来,由于武汉市儿童青少年的各类情绪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且发病年龄下降,市精神卫生中心在2021年10月专门开设了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夜间门诊,并与多所学校建立“点对点”的学生心理问题就诊绿色通道,每个学校都配备

^① 李新影:《环境和遗传因素对儿童青少年抑郁的影响》,《教育家》2019年第24期。

联络医生,担任学生们的心理老师。2022年武汉儿童医院、武汉市武昌医院、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等多家医院专门开设了“学习困难”门诊。医生表示“来到学习困难门诊就诊的孩子当中,大约三分之一存在一些情绪和精神心理障碍。中学阶段来就诊的孩子情绪问题比例很高”。武汉市首条心理咨询热线设在武汉市心理医院,据该热线心理咨询师汪智慧介绍,每天电话量中约有1/5是关于未成年人问题,其中又有1/5的未成年人已存在精神问题,而家长还没意识到。

针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武汉市政府相关部门正在建设一个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联动机制。武汉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连续几年就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提交提案;教育主管及相关部门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教育教学,设置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建立心理健康教育定期评估机制,落实“一生一策”心理健康档案,引导学生自我调适,减轻心理压力,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加强教师和家长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培训 and 提高;武汉市教育局这两年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兼职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推进课程育德重中之重,切实在教师的引、用、培、留等方面做文章。截至2021年底,武汉市中小学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配备率达100%,共8228人,其中专任教师531人,师生配备比达到1:1000的要求,每所中小学至少配备一名具有心理学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的专职心理教师。同时聘请校内外专家,对家长开展关于孩子心理健康发展、青春期性教育、情绪问题识别等教育,做到家校联动,早发现、早干预,科学治疗;市教科院组建武汉市心理救援与危机干预教育小分队,为有效应对中小学心理危机事件提供专业支撑;市妇联打造“妇联干部+专业团队+社会组织+志愿者”“四位一体”的心理服务队,形成“专业+社会、专职+兼职”的心理团队特色,从构建社会服务体系层面充实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服务力量,打造心理健康教育共同体。

三、武汉市中小学生心理压力来源调查

为进一步深入了解青少年心理健康情况和压力来源,武汉市社科院课题组对武汉市6个不同类型的中小学校300名学生进行了心理压力来源调查,方式为校园门口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其中,两所小学(其中一所为省级示范小学)共102名小学生,占比34%;两所中学(其中一所为市级示范中学)共99名中学生,占比33%;两所高中(其中一所为省级示范高中)共99名高中生,占比33%。300名学生中,男生151名、女生149名,分别占比50.33%和49.67%。另外,通过访谈和小型会议讨论方式对4位老师、16位家长进行了调查。4位老师分别是:1名普通小学教务处老师、1名省级师范高中心理咨询室老师、1名普通中学老师和1名市级示范中学老师。课题组试图从学生、家长、老师三个角度,从学生不同成长阶段、环境、人际关系等方面,探求中小学生心理压力来源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分析并提出建立有效的心理健康防御机制,以及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问卷调查结果

1. 本次调查中,发现中小学生心理压力的主要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习压力方面。学习是中小学生主要的活动内容,也是他们获得外部评价、建立自身价值体系的主要方式之一。此次调研中,39.67%的学生的心理压力源自以下与学习相关的因素:无法或没有达到期望的学习成绩,这部分占比59.33%;作业太多,感觉做不完,从而引发的着急焦虑,这部分占比55%;培

训太多,出现学习倦怠感,这部分占比 30.67%;某些科目感觉难,吃力,跟不上,心存恐惧,这部分占比 34.55%。

二是父母家庭方面。由于孩子主要的生活环境在家庭,孩子在家庭中与父母或主要监护人的关系氛围成为影响他们情绪和心理压力的主要因素。主要体现在:无法与家长沟通,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和理解,这部分占比 81.67%;言行举止没有达到父母期望值时受到责骂,这部分占比 47.78%;由父母离婚、再婚或家庭成员人数的变化引起的情绪变化,这部分占比 33.33%;由于家庭成员的性格情绪认知等问题引起的恐吓、打骂等家暴行为,这部分占比 15%;出于各种原因造成的父母至亲的陪伴较少,这部分占比 10.33%。

三是学校老师及同辈同学方面。以下情况也会造成青少年心理压力和情绪变化:得不到老师认同,被批评,感觉沮丧,这部分占比 19.67%;害怕得不到同辈集体的认同,被同学孤立,这部分占比 32.67%;担心害怕学校或学校周边环境存在欺侮霸凌的现象,这部分占比 13%。

四是成长环境的变化引发的心理压力和情绪变化。主要包括:在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的新生中,由于学习环境和老师同学关系的改变、学习科目难度的上升、学习项目和作业量的增加以及外在评价标准的不同造成的心理不适,这部分占比 49.33%;学习地点的迁移,新的学习环境所带来的语言、交流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造成的各种不适应引发的情绪和心理压力,这部分占比 3.33%。

五是成长过程中的烦恼和叛逆。主要包括:对自身的生理方面的不满意,比如高矮胖瘦或长相等生理缺陷引发的自卑感,这部分占比 36.67%;对自身的性格比如内向、胆小、懦弱等不满意引发的无助感,这部分占比 13.67%;成长过程中,身体的各种生理变化,比如青春痘、初潮等引发的情绪和压力,这部分占比 9%;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绪无法宣泄或排解,这部分占比 14.67%。

2. 由心理压力引发的心理障碍情绪表现

本次调研了 5 种心理障碍情绪在孩子们情绪中的存在率。调查结果显示,由各种压力引发的情绪感觉中,困惑感、焦虑感、沮丧感的比例非常之高,分别达到的 65.67%、57.67%、56.67% (见表 1)。

表 1 不同的成长阶段孩子障碍情绪感受 单位:人

学生	孤独感	沮丧感	焦虑感	困惑感	恐惧感	极少或无以上感觉	总人数
小学生	25(24.51%)	47(46.08%)	33(32.35%)	49(48.04%)	6(5.88%)	21(20.59%)	102
初中生	15(15.15%)	64(64.65%)	69(69.70%)	67(67.68%)	2(2.02%)	10(10.10%)	99
高中生	8(8.08%)	59(59.60%)	71(71.72%)	81(81.82%)	8(8.08%)	5(5.05%)	99
合计	48(16.00%)	170(56.67%)	173(57.67%)	197(65.67%)	16(5.33%)	36(12.00%)	300

这些“丧”“虑”“惑”情绪感觉的背后,反映的是青少年价值观的建设过程中自我认同感的缺乏。当评价标准过于单一,只有学科考试成绩,或者只凭考试排名才能显示学习价值和成果时,主体就会容易产生对被评价的恐惧和对结果的迷茫、困惑、沮丧、消沉,从而最终导致自我认同感的缺失。

在孩子不同的成长阶段,各种压力引起的情绪障碍感受不同。从表 1 可以看出,小学生极少或没有障碍情绪的占比最高,为 20.59%,初中生的占比为 10.10%,而高中生的占比仅为 5.05%。这个调研结果验证了中国 2020 年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中的专题报告《2019 年和 2020 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年际演变》中关于青少年抑郁症随年纪增长的观点,此文提到,随着

年纪的增长,抑郁的检出率呈现上升趋势。小学阶段的抑郁检出率为一成左右,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1.9%~3.3%,初中阶段的抑郁检出率约为三成,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7.6%~8.6%。高中阶段的抑郁检出率接近四成,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10.9%~12.5%。

3. 由心理压力引发的行为表现

调研“当心情不好或感受到心理压力时,你有如下症状吗?(多选)”时,回复不想干任何事情、注意力难以集中、只想玩游戏的占比最多,分别为60%、48.67%、47.33%,占比如图1所示。心理学家认为,心理健康问题外在表现包括内疚自责、痛苦、无助感和无意义感等情绪问题,入睡困难、早醒和醒后难以再入睡、进食异常等行为问题,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困难等认知障碍问题,这些不仅是青少年群体最为常见的心理障碍表现,同时也很符合抑郁症的典型症状,所以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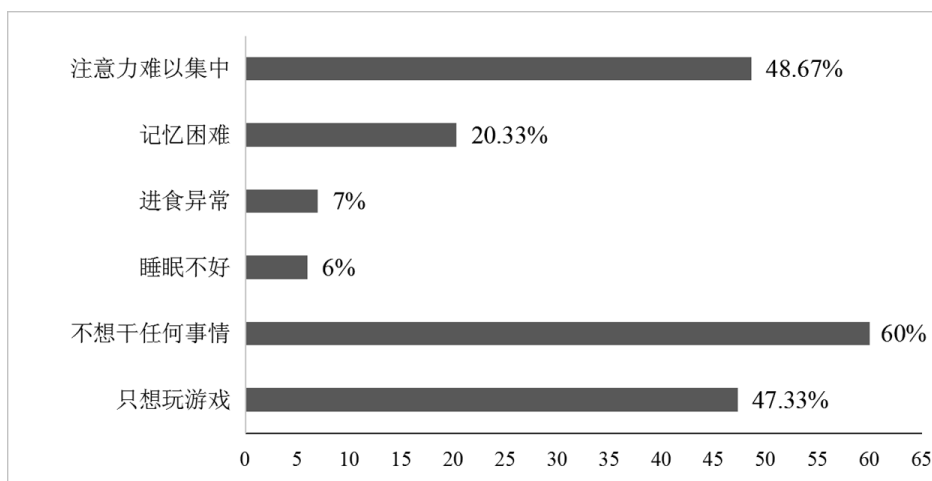


图1 抑郁症中小学生存在心理压力时的状态表现

4. 中小学生对不良情绪的处理方式

本次调研中问及“当你情绪不佳时,会去学校心理咨询室寻求心理健康老师的辅导吗?”时,60%的学生没有想过去咨询老师,仅有6.33%的偶尔去过,1%的经常去(见图2)。由此可见,当学生面临心理方面的问题时,并不习惯与专业的心理健康老师沟通,也没有想得到专业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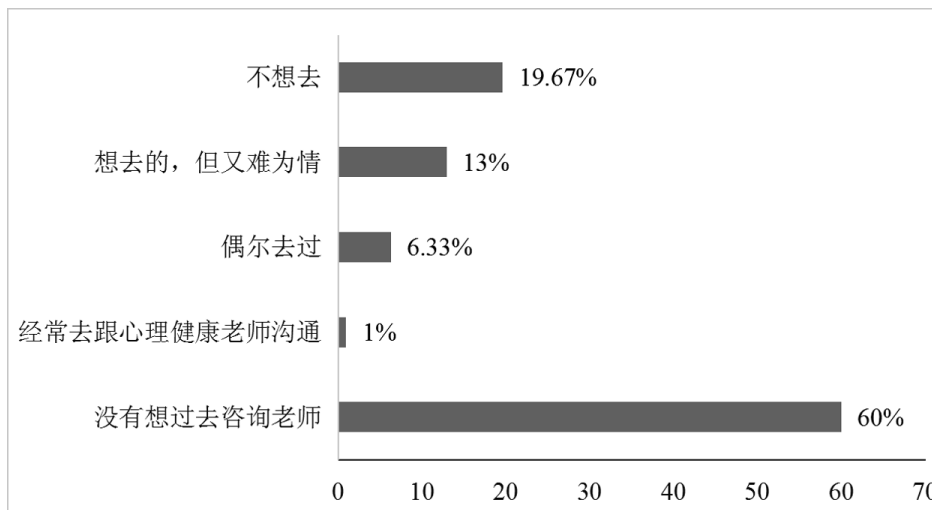


图2 中小学生对情绪不佳状态时对寻求心理健康老师帮助的反应

当问及“当你情绪不佳或心理压力过大时,你会怎么处理?(多选)”时,寻求同学、老师、家长以及心理辅导老师的帮助与指导的方式占比最低,为16.67%,而通过学习、听音乐、体育活动、打游戏转移不好的情绪占比最多,占49.67%(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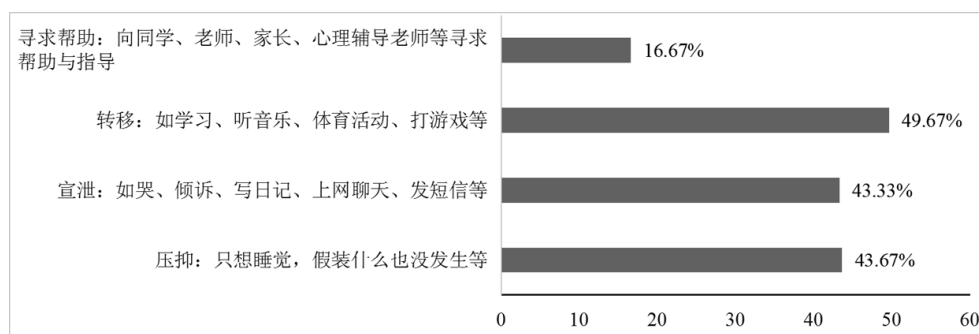


图3 中小学生学习情绪不佳或心理压力过大时的处理方式

以上两个问题的选择结果显示当学生面临心理方面的问题时,寻求他人的帮助并不是学生们的首选,他们更倾向于自己解决心理压力带来的情绪问题。和成年人相比,他们也往往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不好的情绪,常以儿童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快乐”。当他们出现扔东西、发脾气、烦躁不安或不爱与人交流、独自发呆等情况时,很多家长并不会把这些表现与心理健康相联系,反而以为是孩子不懂事、闹脾气,导致儿童的心理压力得不到释放,心理健康状态很容易被忽略。

(二)访谈和小型会议调研结果

本次调研对4名老师、16名家长进行了访谈,话题围绕“如何看待现在学生的心理压力”展开,主要有以下三个结论。

一是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不再是个别现象。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之一是家长、朋友、熟人之间相关的聊天话题已经经常性出现,不似以前几乎不被提及;原因之二是熟人、朋友的孩子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现象增加了。

二是当前学生心理压力大。主要表现为:学校作业太多,尤其重复性机械性作业多;学生睡眠时间短,活动时间少,有的学生甚至课间休息时间也没有,课间圈养现象严重,吃饭上厕所时间靠挤;在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多数学生和家长目前在“智”方面疲于应付,没有时间关注其他四个方面的培养。孩子们的厌学情绪是普遍性的存在,不是个别现象。

三是当前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乐观,究其主要原因是:学生能够宣泄不良情绪的通道被严重堵塞,对比20世纪学生生活学习状况,可以看出能释放、缓解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的课间课后劳动、玩耍休闲、体育锻炼、睡眠时间被大大压缩甚至被挤占被取消;家庭人口数量的变化以及物质生活的提高导致学生受到的家庭关注度和期望值较之以前提高,使得学生思想意识乃至行动的自由度降低;一直以来,学生的学习成绩是老师工作的量化评价重要指标,老师们在育人和育分之间无法做到统一,只好先选择育分,而布置作业是育分容易获得成效的方式之一,每门课程老师都有育分的压力,加起来自然导致孩子们的负担大,虽然这种校内的评价体系一直存在,但是近十几年来,来自社会的评价和家长的评价加大了学习成绩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这种压力最终落在学生身上;具有“剧场效应”的校外培训的兴起,成为学生以及家

长内卷的起源,成为学生乃至家长焦虑的源头。

四、青少年心理压力环境诱因分析

中小学时期是人的行为、性格和智力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由于身心变化较快,加之文化知识及社会经验不足,中小学生很容易产生不健康的心理,导致心理问题或心理疾病。尤其是,对于那些由于身体生理性因素、家长教养方式、家庭关系或家庭教养环境变化等因素导致的高敏感孩子,承压能力较弱,更容易产生抑郁等心理问题,甚至自我伤害。但对于高敏感孩子群体的认定没有明确标准,简单的问卷调查无法确保答复的真实性,在与老师或家长访谈中也只了解到极端个案,因此,在调查研究中我们将所有调查对象都假定为非高敏感群体,不做筛选或剔除。心理学中的“生态系统论”认为,孩子的成长受到诸多环境的影响。这些环境是一层层嵌套的,小环境包括家庭和学校,大点的环境包括社区等,更大的环境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每一层环境对青少年的成长都起着重要作用,并且层与层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本次调查的结论表明我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较为普遍且日益严重,深入分析可知,中小学生心理压力过大的环境诱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学生处于学业压力链环境的最底端

在高校从事心理健康工作多年的大儒心理创始人徐凯文博士表示,回顾近20年高校的情况,他发现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高校心理咨询量、危机干预量,基本上是10年前的10倍。同时,心理健康问题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在中小学阶段更是日益严峻。徐凯文认为,在导致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各种因素中,学习压力是第一位的。“如今我们的孩子,是处于整个社会压力焦虑链条的最底端。”学校要出成绩,要提高升学率,“教育资本市场贩卖的焦虑,升学考试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使得教育‘内卷’的氛围从高中下沉到了初中甚至小学。‘双减’虽然减掉了部分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但并没有减掉家长的焦虑,压力层层传递到孩子身上。过于功利的教育环境,孩子们都在一条狭窄的赛道上相互竞争。因此当孩子发现他们达不到这个标准,他们对自我的价值判断会产生崩塌”。如果不重视不疏导,极易使他们的不良情绪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疾病。

(二)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相较于学校,家庭压力触发抑郁症的因子更为复杂。张跃兵等(2018)指出,家庭遗传、家庭结构、父母人格特征、家庭教养方式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① David Olson根据家庭的亲密度和适应性特点,将家庭分为16种形式,并最终合成了极端型、中间型、平衡型三类家庭型。其中最正常的四种形式被称为“平衡型”,要素包括“自由地分离,自由地联结,结构地分离,结构地联结”。这种家庭既联结稳定,又有开放的界限来确保有效沟通。最偏离正常的四种形式被称为“极端型”,要素包括“混乱地疏离,混乱地联结,僵硬地分离,僵硬地联结”。剩下的8种形式则被称为“中间型”。而杨光远、郭玥等

^① 张跃兵、刘霞、王爱芹、李荣琴、尚鲁宁:《情绪障碍儿童家庭环境影响因素及其父母的人格特征》,《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8年第7期。

(2019)调查了武汉某医院2017—2019年抑郁症青少年的家庭情况,发现患者家庭中有29.63%为极端型家庭,28.70%为中间型家庭,41.67%为平衡型家庭。^①湖北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武汉市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邓晓红认为:“抑郁症患者往往有家族遗传史。大脑中的多巴胺、5-羟色胺这样一些神经递质浓度偏低可导致抑郁。家庭环境中,比如父母的夫妻关系不和,父母对孩子的家庭教养方式不正确;社会环境因素包括生活中遭受了重大挫折等可导致抑郁症。”

(三)对抑郁症的错误认知环境导致对不良情绪的忽略

抑郁症不是娇气,而是一种疾病。易激发,缺乏兴趣和动力;不喜欢玩了,易哭泣;爱说消极的话,喜欢抱怨;难以入睡或好睡。这些都是抑郁的早期征兆。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李铁琛在面向武汉市中小学的公开课程里讲到,许多家长发现孩子出现这些问题后,认为孩子太过娇气,被惯坏了。其实,这是孩子抑郁的早期征兆,主要集中表现在青春期,更早的会表现在学龄期。当然,抑郁症不是情绪波动这么简单,也并不是所有不开心、情绪低落都是抑郁症。许多人面对抑郁症时,甚至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疾病。全国政协委员、青海民族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李莉娟说:“近年来青少年因抑郁症导致自杀的新闻并不鲜见,这与社会、学校、家庭对于抑郁症缺乏正确认知,对抑郁症发病原因缺乏了解,不能及时发现及早预防是密不可分的。”李莉娟调查认为,抑郁症发病原因非常复杂,有生理原因,也有社会原因。相较成人,青春期的孩子更容易受到压力的影响,就算没有遭遇什么特定的压力源,也容易对压力有过度的反应。

五、对策与建议

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都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例如,美国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强调个体化和多元化,提供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心理健康课程,内容涵盖情绪管理、人际交往、自我认知等方面,强调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提升自我认知和情感调节能力。英国注重预防和早期干预,学校通常会设立心理健康辅导中心,配备专业的心理健康教师,为学生提供定期的心理健康评估和指导,确保学生能够在出现心理问题时得到及时的支持和帮助。日本学校除了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外,还注重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和责任感,鼓励他们积极参与集体活动和社会实践。这些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各具特色,但都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和全面发展,注重预防与早期干预、个体化与多元化、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为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未来,我们可以结合国情和学生实际,探索适合我国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力支持。根据前面的分析,为了缓解我国中小学生心理压力过大的问题,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建设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教育生态势在必行

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关键在于建设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教育生态体系,树立教育“育人”观念,摒弃“育分”的教育模式。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近几年诸多关于中小学生减负的调研,折射出由学业、升学所产生的师生矛盾、亲子矛盾是中小学生的身

^① 杨光远、郭玥、李闻天、徐汉明:《武汉市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庭功能调查》,《医学与社会》2019年第10期。

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既要及时进行疏导、救治,更重要的是要让教育回归育人本位,对学校教育评价体系进行改革。在学生学科成绩之外,为学生提供更多发展兴趣和爱好的机会,让他们能有各种途径找到自己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强调要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症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扭转教育“分”化倾向。坚决改变简单以考分排名评老师、以考试成绩评学生、以升学率评学校的导向和做法。

(二) 树立青少年心理健康科学理念不能忽视

科学用脑和适当的自由度是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的基石,近几年几乎所有的关于中小学生学习减负的调研均显示大部分学生的成长犹如被设定了精确的程序,每天每个时间点做什么,被各种作业、培训安排得严丝合缝。超长的学习时间、压缩的睡眠时间、被剥夺的体育锻炼和休息时间,甚至进入中学阶段后连正常的吃饭和上厕所都在匆忙中进行。正在生长发育的脑部长期处于高强度的信息接受状态,得不到应有的休息,长此以往,必定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育。

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可以自由支配的、用于发展积极爱好以及休息的闲暇不是浪费而是必要,这种必要性体现在儿童成长过程中。虽然以接受外在教育内容为主,但是他们需要将其内化为自身的知识体系,内化的过程需要自由地思考、自主地吸收,伴随的必定是相对自由的可以思考的灵魂、一定合理的休息时间、玩耍时间和体育活动时间。由此可见,充足的睡眠、适度的闲暇劳作和足够的体育锻炼,是青少年科学用脑和获得其思想行为自由度的必要和必需,也是为青少年建设良好情绪发展、把控不良情绪爆发、避免产生抑郁症的健康心理防御体系的重要保证。

(三) 发挥家长积极引导作用

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父母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首先,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家长既需要加强自身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科学理念的建设,又要降低对其的关注度和期望值,在思想行为上面予以他们适当的自由度。其次,应该正确看待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心理压力,尽力避免使子女在童年时期遭受精神创伤;随时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留意孩子的日常行为方式,及时发现孩子行为上的异常,及时予以科学干预,降低抑郁发生率。最后,家长要有培养孩子稳定情绪内核的意识。了解孩子的心理特征,了解他们成长阶段的心理压力来源,理解他们成长过程的不易和痛苦、帮助孩子们学会倾诉表达释放不佳的情绪,让他们感觉不到成长过程中的精神孤单和无力,是社会转型时期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挑战。

(四) 构建和创新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构建和创新适用于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需要教育理念的更新、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社会支持等多种因素的效能叠加。政府方面,应加大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投入,包括资金、政策、人员等方面的支持,还应加强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监督和

管理,确保心理健康教育质量;教育主管部门应通过培训、引进等方式,培养具备专业素养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学校应该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设计具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同时,应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参与兴趣;加强学校与家长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共同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通过举办家长会、开设家长心理健康教育讲座等方式,提高家长对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鼓励社会各界参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通过邀请心理学专家进校园、开展社区心理健康教育等活动整合社会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心理健康教育服务;根据学校和学生实际情况,分阶段开展心理健康教育,逐步提高教育水平和覆盖面;完善心理健康教育评价体系,对教育效果进行定期评估,针对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教育方案,确保教育模式的顺利实施和教育质量的提升,更好地满足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个体化需求,达到心理健康教育的终极目标。

作者简介:

张玉,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学。

(责任编辑:陶秀丽)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非版权性的法律思考

杨异 何琦

摘要:在全球范围内,是否应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赋予版权保护存在着广泛的法律立场差异。尤其在我国,两个经典的案例呈现出鲜明的观点分歧^①,加剧了法律判定的不确定性。要深入探讨这一议题,必须从多维度的视角进行考量。需要回溯到传统的著作权法律关系中,挖掘版权制度的初衷与构建目的;理解其背后的技术框架、生成逻辑及运行机制;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所依赖的商业模式与收益结构。为满足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的持续发展和未来的应用需求,建议在现有的版权体系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并探索版权共享模式。同时,充分发挥法律的规制作用与政策的指引作用。最后,依托技术进步和应用,实现技术自身的完善与闭环,以确保法律与技术的和谐共生。

关键词:人工智能生成内容;ChatGPT;非版权性;法律思考

一、引言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内容的法律保护问题正持续受到广泛的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一种人工智能系统,能够产生文字、图像或其他媒体以回应提示工程。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短时间内(不是人类作者)产出的一系列内容,如文本、图像、音乐等,我们称之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enerated Content)。

早期出现的以生成对抗式神经网络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由于其无法生成媲美人类作者的作品,因此并未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关键节点是在2016年3月,由谷歌开发的围棋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对战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这一压倒性的胜利成为人工智能领域里程碑式的时刻,尽管AlphaGo并非生成式人工智能,但深受其强大能力震撼的学术界,仍进一步加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版权领域的研究,针对其是否符合版权法独创性要求进行了激烈的探讨。

另一个关键的节点则是在2022年11月30日,人工智能研究公司OpenAI上线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

^① 腾讯案肯定了Dreamwriter这类自动写作新闻软件的产出构成作品,菲林案则认为计算机软件智能生成的涉案文章内容不构成作品。

人模型 ChatGPT。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升级,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主导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前沿。受益于 ChatGPT 先进的语言模型,不仅展现出对复杂任务的深度理解和对话能力,而且能够生成包括文字、音乐和艺术在内的多种类型的内容。尽管 ChatGPT 具有先进的算法模型和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从而产生接近人类的创作成果,但关于其内容是否应当受到版权法的保护仍然存在较大争议。尤其在当前的技术背景下,传统的知识产权观念正在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程发生激烈碰撞,急需回到传统的法律角度对这一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性与非版权性之争

(一)各国的立法争议

全球范围内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应纳入版权保护呈现出三种态度,分别是肯定说、否定说和中立说。英国知识产权局肯定了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纳入版权保护的可能性,美国版权局和日本文化厅则持否定的观点,欧盟法律事务委员会及我国的司法机关却秉持着中立或模棱两可的态度。

美国版权局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秉持着一致的否定态度,但也存在一定的例外情形。首先,美国版权局在《美国版权局实践纲要(第三版)》中指出,版权法案只保护“建立在人类头脑的创造力之上的智力劳动成果”,对于那些“仅由机器生成的”“缺乏人类创造性投入或干预的”成果,版权局将不给予版权登记。紧接着,又在《版权注册指南:包括人工智能生成材料的作品》中,继续肯定其核心观点:“当人工智能技术决定其输出的表现元素,生成的材料不是人类作者的产物。”除此之外,依据智能技术现实发展的需求,提出了两种例外情形。一方面,在《版权注册指南:包括人工智能生成材料的作品》中肯定了智能技术的工具价值属性。“并不意味着技术工具不能成为创意的一部分,重要的是人类对作品的创造性控制的程度表达和‘实际形成’传统的作者要素。”另一方面,在“Zarya of the Dawn”案中提出了汇编保护,“劳工局还同意作品中图像和文本的选择和排列作为汇编受到保护”。

日本文化厅坚持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受版权保护的观点。日本文化厅与日本内阁在《关于人工智能与著作权的关系》中明确指出人工智能自主生成的任何东西都不被认为是受版权保护的作品。

英国知识产权局仍坚持“额头流汗”原则,肯定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版权保护的可能性。其不仅认为计算机生成物不需要人类作者,还根据 AI 的技术特性,下调了其生成作品的保护期限。

欧盟法律事务委员会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可以被视为版权作品或专利问题上持有审慎、中立的立场。欧盟首先表明了现阶段的人工智能生成技术还不足以让欧洲的版权法和专利法立即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然而,欧盟仍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积极寻求各种可量化的标准,如“自主智力创作标准”“四部检测法”等。

我国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问题上,尚未形成统一的法律观点。即我国现行出台的文件均没有对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给出具有结论性的评价。因此,仍需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关于作品界定最重要的因素(独创性)中去,在下文的法律逻辑板块予以叙述。

表1 各国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版权性问题的法律政策规定

机构或地区	名称	核心观点
美国版权局	《美国版权局实践纲要(第三版)》 (2021年1月28日)	作品是人类作者的产物
美国版权局	《版权注册指南:包含人工智能生成材料的作品》 (2023年3月16日)	同上
日本文化厅与内阁	《关于人工智能与著作权的关系》 (2023年6月)	人工智能自主生成的任何东西都不被认为是受版权保护的作品
英国	《版权、外观设计和专利法案》 (1988年11月15日)	1. 计算机生成物,是指在不存在任何人类作者的情况下,由计算机运作生成的作品 2. 完全由AI生成的作品,可能获得版权,保护期缩短为50年
英国知识产权局	《就人工智能对版权和专利制度的影响咨询意见》 (2021年10月29日)	不改变对于计算机生成物的法律规定
欧盟法律事务委员会	《关于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的研究报告》 (2017年2月)	要求为计算机或机器人制作的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制定“自主智力创作的标准”
欧盟委员会	《“人工智能的趋势和发展——知识产权框架的挑战”报告》 (2020年11月25日)	1. 人工智能不能让欧洲的版权法和专利法立即发生实质性的改变。邻接权制度可能会扩展到各个领域“未经授权”的人工智能生成物 2. 用四部测试法检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符合作品资格(文学、艺术、科学领域/人类智力活动/独创性/表达)
中国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 (2023年1月10日)	
中国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2023年8月15日)	

(二)各国的司法争议

美国的登记案和其法律政策规定保持完全的一贯性,即在人类对作品没有创造性的控制下,反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受到版权法的保护。中国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此则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判决思路。

美国版权局在“Zarya of the Dawn”更正版权登记案中强调 Midjourney(一款 AI 绘画工具)不是版权申请人控制和引导以达到她想要的图像的工具,而是以不可预测的方式生成图像。因此, Midjourney 的用户不是该技术生成图像的版权作者。正如最高法院所解释的那样,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的“作者”是“实际形成画面的人”,即充当“创造性或主脑”的人。另外,在“A Recent Entrance to Paradise”案中也再次表明了一直以来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的坚定立场。

中国实际的司法判决中,存在着显著的裁判观点分歧。首先,在“腾讯诉盈讯”案中,法官认同 Dreamwriter 软件(由腾讯财经开发的一款自动写作新闻软件)所产出的文章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文学作品。具体的裁判思路分为三步,参照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首先,找到判决的关键在于独创性。涉案文章是一篇股市财经综述文章,满足文学领域的表达和可复制性。因此,涉案文章是否构成文字作品的关键在于判断涉案文章是否具有独创性。紧接着,分别从外在表现形式和产出过程两步去论证独创性。一方面认为涉案文章的外在表现(股市信息、数据的选择、分析、判断

等)符合文字作品的形式要求,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另一方面论证 Dreamwriter 软件的自动运行并非无缘无故或具有自我意识,其自动运行的方式体现了原告主创团队相关人员个性化的安排与选择,其表现形式并非唯一,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在“菲林诉百度案”中,法官采用的裁判依据与上案相同,但却认为涉案文章的图形部分不构成图形作品。法官认为涉案文章中的图形部分是菲林律师事务所基于收集的数据,利用相关软件制作完成,虽然会因数据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形状,但图形形状的不同是基于数据差异产生,而非基于创作产生,不能体现菲林律师事务所的独创性表达。

表2 各国的实际判例和版权申请

地区	名称	核心观点
美国	《Zarya of the Dawn》更正版权登记案 2023年2月21日	作品中由 Midjourney 技术生成的图像并非人类作者的产物
美国	《A Recent Entrance to Paradise》驳回 版权登记申请案 2022年2月14日	不会“放弃对《版权法》、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司法先例的长期解释,即只有由人类作者创作的作品才符合版权保护的 法律和正式要求”
中国	腾讯诉盈讯案 [2019]粤0305民初14010号	Dreamwriter 软件的自动运行并产生的涉案作品可获得著作 权法保护 1. 外观上符合对文字作品要求,具有独创性 2. 作品的生产过程体现了作者个性化选择、判断和技巧
中国	菲林诉百度案 [2019]京73民终2030号	否认计算机软件智能生成的涉案文章内容能够获得著作权法 保护 著作权法只保护自然人的创作,不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

(三)我国学界的理论争议

我国学界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能否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讨论由来已久,可以分为否定派和赞同派,在此选取目前最前沿的研究。

完全否定派以王迁学者和冯晓青学者为代表。前者对学界现有的“独创性客观说”“拟制作者说”“创作工具说”“激励投资说”“权利与义务统一说”一一进行反驳,最后论述只有人的创作成果才能作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①后者认为“抽象”人工智能的内容之后,驱动人工智能进行“生成”的只是算法程序,具有对算法“独创”的依附,不符合“独”和“创”的实质要件,因此要避免先入为主地将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畴。^②

赞同派主要从表现形式、生成过程和人格属性进行论证。从立先等学者认为“虽然当前阶段的生成式 AI 在本质上仍属于人类创作作品的工具,在不构成版权例外等特殊情况,且满足作品构成条件下,应认定其生成式 AI 的生成内容构成作品”^③。吴汉东认为人工智能输出阶段的“生成内容”,具有作品的思

① 王迁:《再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政法论坛》2023年第4期。

② 冯晓青、潘柏华:《人工智能“创作”认定及其财产权益保护研究——兼评“首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侵权案”》,《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③ 丛立先、李泳霖:《生成式 AI 的作品认定与版权归属——以 ChatGPT 的作品应用场景为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想表现形式和人格主义要素,应受著作权保护。^① 杨利华等学者从过程视角(主观标准)看,认为人工智能内容生成过程符合人类创作的思维特征;从结果视角(客观标准)看,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有著作权作品的外观形式和信息消费功能,符合著作权法作品的本质属性。^②

综上,各国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法律政策规定、现有的判例、学者间的观点存在诸多争议和矛盾,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中国法律下是否具有可版权性,已成为一个紧迫的法律课题。

三、技术逻辑与法律逻辑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非版权性

技术逻辑决定着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本质属性,法律逻辑凝聚了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标准。厘清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这一新兴产物为何不具有可版权性,首先需要从技术逻辑层面,明确其背后的技术路线违背了传统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价值标准;之后,从知识产权制度的传统法律逻辑层面,从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及制度目标四个维度,深入探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非版权性的内在逻辑并给出积极的应对之策。

(一)技术逻辑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非版权性

分析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技术逻辑可知,用户仅仅在在线模式中的提问环节发挥作用,即只起到宏观上的调控和指引作用。由于算法的不透明性以及技术的不确定性,用户对最终的输出结果无法施加决策性影响,即用户无法预知输出内容的具体形态。如图1所示,ChatGPT的运行机制分为“离线—在线”的二阶段模式。在离线的预训练阶段中,ChatGPT研发团队从互联网中的多源语料库中整合了大量的文本素材。在对文本素材进行数据清洗、人工数据标注等初步工作后,该素材被用于ChatGPT的离线训练任务。ChatGPT离线训练完成后,开始运用于用户在线阶段。这个阶段用户输入文本提问,预先离线训练好的ChatGPT依据用户的提问进行在线计算,最后输出计算得到的正确概率最高的答案。概率输出的答案从根本上背离了自然人创作的初衷。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技术逻辑完全背离了版权法设立的初衷。从本质上来说,这种训练输出模式输出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它的表达只能满足独创性的外观主义,而背离了表达的核心——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基于某一思想和复杂的中文结构体系,构建多种表达形式,但这种表达形式是概率计算和优化的结果。以自然人的文学创作举例,文学创作并不是孤立的过程,而是与作者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其个人经验紧密相连的综合表达。以莫言老师创作的《红高粱》为例,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东北乡村社会背景下,抗日战争、家族纽带与人性的深层探讨,这是某些网络小说中所展现出的拼接式洗稿的写作模式所不可比拟的。

① 吴汉东:《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著作权法之问》,《中外法学》2020年第3期。

② 杨利华、王诗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客体性思考——兼论作品判定的独创性标准选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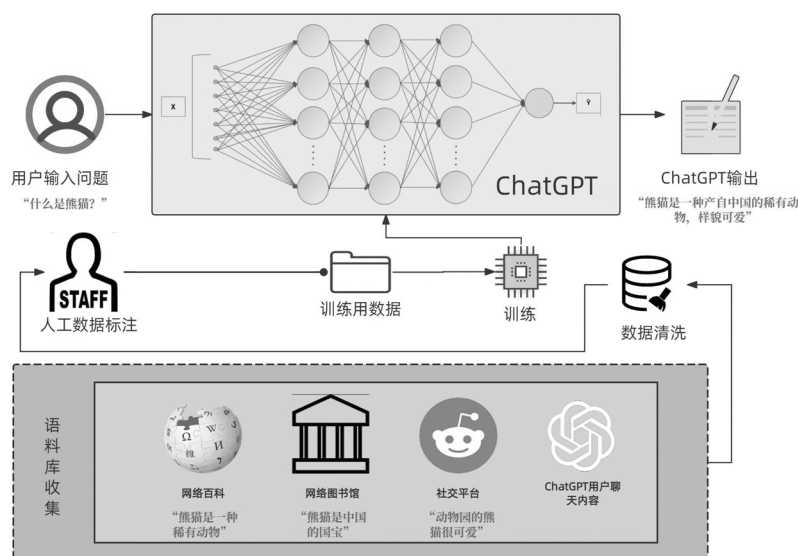


图1 ChatGPT 原理示意图

（二）法律逻辑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非版权性

1. 权利主体：对法律人格属性的根本违背

现阶段将人工智能拟制为创作主体，与自然人具有同等或稍弱的主体地位抑或是参考公司法人制度，从根本上违背了版权制度的法律人格属性。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九条至第十一条明确表明，现有的版权制度本质上是以自然人为核心建构的，包括作者的一系列人身权、财产权。先论版权制度中的人身权，人身权离不开作者的人格权益，包括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者完整权、发表权等，这些权利均体现了对作者人格、尊严、名誉等的保护，与权利人的地位密切相关。显然，人工智能缺乏正当的人身权法律基础，即与所创造的内容之间不具有深层次的、紧密的精神及道德联系，也不利于形成健康交流的文化生态和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因而不能作为权利主体享受相应的人身权利。再论知识产权制度中的财产权，这里主要讨论的是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即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放映权、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设置财产权的目的本质上是提供对权利人作品的经济保护，以鼓励个人或企业进行知识创新与创造，而人工智能不具有人类特有思想和情感，因而不具有被激励的可能性，更不具有设定以上权利的法律正当性。

另一方面，现阶段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人工智能本身的产出”，而不是“人类的创作”，也可以理解为“人工智能产出后人类的再选择、拼接物”。无论是自然人前期的文本提问、方向指引、主题归纳还是后期有选择性的归纳、编排行为，都不能决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最终的、具体的输出形式。简单来说，ChatGPT 通过分析和学习人类的文本数据，预测单词序列来理解语言关系和规则，用户虽能给出主题指令，但无法对机器的文字选择和组织进行创造性控制，是机器而非用户决定了输出内容的具体实现。^①

2. 权利客体的先决条件：对评判原则的非理性要求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仅能从客观上满足作品的独创性标准，即与人类作品相混淆，不能深刻印证评判

^① 朱鸿军、李辛扬：《ChatGPT 生成内容的非版权性及著作权侵权风险》，《新闻记者》2023 年第 6 期。

标准的内在逻辑。首先,独创性标准体现在“独”这一字上。作品必须是作者独立创作的,即使是多人合作的作品,每个参与者也必须做出独特的贡献,上文中已经论证人类做出的独创性贡献存疑。其次,独创性的程度。我国著作权法并没有对这一程度做苛刻性的要求,即只需要作品符合一定程度的创造水平,不是机械性的复制或简单的再现,就能符合独创性的要求。回归到人工智能的产出逻辑中来,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将 ChatGPT 定位为“智能搜索引擎+智能文本分析器+智能洗稿器”。^① 这个论断从根本上推翻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独创性标准的逻辑印证,即“智能洗稿器”的文字生成逻辑实际吻合打乱排序、同义替换的机械性复制。最后,独创性内容。独创性内容需要符合可保护内容,这就不得不提到“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仅仅保护“表达”而不保护“思想”。ChatGPT 的横空出世使得“思想与表达二分法”的适用价值被逐渐消解,原因在于“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建立在人们创作新作品能力有限的前提下。即使能吸取他人的思想,但具体创作仍受制于专业技能和效率的限制,不保护思想不会引起利益显著失衡。然而,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打破了这一局面,它能够快速吸收人类思想并无限生成新内容,挑战了传统上思想与表达的划分,^②因而对独创性标准提出了非理性的要求。

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库的增量迭代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持续增多,客观上、非理性地拔高了自然人的独创性标准。依据 OpenAI 发布的论文可知,训练 GPT-2 的数据总量仅 40GB,而训练 GPT-3 的数据达到了 570GB。此外,世界知名半导体产业分析机构 SemiAnalysis 透露,训练 GPT-4 的数据规模是 GPT-3 的 10 倍以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持续增多从本质上可以达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如果认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有可版权性,那么它将会充斥整个著作体系,并最终重塑出不相适宜的独创性标准。

3. 权利内容:与版权排他性的逻辑矛盾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同于以往传统手段创作出的作品,其流通性和共享性与版权制度的排他性存在本质上的逻辑矛盾。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

共享与保护的矛盾。生成式 AI 的作品只有在传播中才更具价值,将印刷技术条件下形成的版权规则套用于网络传播有可能阻碍公众的“创作表达自由”。^③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信息的流通和共享,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和共享,流通性极高。然而,知识产权制度的排他性保护意味着作品的使用和传播必须经过授权和支付相应的费用,这限制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自由流通和共享。

复现与保护的矛盾。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依托于智能预测技术,生成物诞生的初始也是数据库扩充的初始。智能技术不可避免地将刚刚创作的生成内容放入下一次的预测选择及 ChatGPT 模型自身的训练中,生成内容较弱的保密性和版权制度强烈的排他性无法调和。ChatGPT 的工作机制仍是一个“黑箱”,不能排除其在运作过程中会存储与传递相关数据的可能。^④ 正如作者储存在电脑上的小说文稿,在不经历出版的情况下,通常不会进入公众的视野之中,而智能生成内容可能在与使用者的对话窗口中大比例地复现出来。

与授权模式的矛盾。版权的排他性决定了权利人能够获得授权许可,并阻止他人未经许可的使用、复制行为。关键点在于目前的版权保护模式是以一一授权的方式展开的,传统的人工授权模式不具备足

① 王迁:《ChatGPT 生成的内容受著作权法保护吗?》,《探索与争鸣》2023 年第 3 期。

② 司晓:《奇点来临:ChatGPT 时代的著作权法走向何处——兼回应相关论点》,《探索与争鸣》2023 年第 5 期。

③ 丛立先、李泳霖:《生成式 AI 的作品认定与版权归属——以 ChatGPT 的作品应用场景为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4 期。

④ 黄日涵、姚浩龙:《被重塑的世界? ChatGPT 崛起下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新特征》,《国际安全研究》2023 年第 4 期。

够的人力、物力、财力与之相匹配,海量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具有被一一单独授权的现实可能性。

4. 制度目的:与激励创新的价值分歧

ChatGPT 一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背后有着适应其生态圈发展的商业模式及收益逻辑,因而不需要再额外得到版权制度的激励。即 GPT 现有的商业模式已经能够满足其对商业收益的期待,加之以版权保护在此属于劳民伤财的过度保护,既激励不到人工智能,也激励不到其背后的研发团队和使用者。

先论人工智能: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是算法、程序的演化,不是血肉构成的身躯,其不具有被激励的现实意义。

继续论背后的研发团队:ChatGPT 的运营者 OpenAI 在商业发展规划上,战略性地舍弃了将其生成内容版权化的产权收益模式。^① 2023 年 5 月 1 日,OpenAI 公司推出了每个月 20 美元的 ChatGPT Plus 付费订阅服务,订阅者能够获得更多的优先访问、更快的响应时间及更好的使用体验。OpenAI 预测,到 2023 年底,ChatGPT 将产生 2 亿美元的订阅收入,到 2024 年将产生 10 亿美元。除此之外,OpenAI 还提供了 ChatGPT 的 API 访问,允许开发者将 ChatGPT 集成到自己的应用程序或产品中,使用 API 需要支付相应的费用,根据使用量和访问频率来计算。值得一提的是,随着 ChatGPT 受众人群的扩增和影响效应的传递,OpenAI 公司的股价会不断攀升,其商业价值会不断凸显,后续可做出包括设置广告位等一系列的收益行为,因此研发者不具有被激励的必要性。

最后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者:部分学者认同使用者具有被激励的可能性,但却没有对责任的不对等承担未雨绸缪。有观点认为将著作权分配给人工智能使用者,能够促进作品的产生与传播,实现著作权制度的激励目标。^② 第一个要点是版权法所给的法律保护从很大概率上会引发被其他权利人追究侵权的可能性,权利义务应相统一,赋予权利的同时也会赋予具象的主体责任。如上文所述,人工智能使用者并不能在生成内容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甚至不能预料出生成的具体形式。换言之,基于算法的黑箱性、商业秘密和研发者的故意不披露,^③使用者并不知道人工智能在背后抓取的数据有没有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可能性,因此将使用者作为权利主体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第二个要点是激励可能具有不对等性。使用者的专业技能一般很难跟作家、音乐家、摄影师等相提并论,向人工智能使用者赋权很有可能导致版权的实际赋予者和目标赋予者错位,出现激励偏差。^④

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无法接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管是著作权制度还是专利权制度抑或是商标制度,其根本授权方式是审核制的授权方式,以人工智能现有的发展速度及创作规模来看,现有的审核方式和速度根本不能与之相匹配。

四、科技演进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非版权性的法律思考

(一)法律的预先规制:设置技术披露义务

法律的预先规制能够调和非版权性现实与智能技术扩张的矛盾,必须在版权审核制度中为权利人设

① 陈晨:《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问题——以 ChatGPT 生成内容为例》,《科技与出版》2023 年第 6 期。

② 杨利华:《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问题探究》,《现代法学》2021 年第 4 期。

③ 在 2023 年发布的 GPT-4 中,OpenAI 拒绝透露用于训练新一代模型的数据量。

④ 陈晨:《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问题——以 ChatGPT 生成内容为例》,《科技与出版》2023 年第 6 期。

置明确的人工智能披露义务。一方面,这是对先进国家版权经验的学习。美国版权局在2023年3月16日发布了《版权注册指南:包含人工智能生成的材料的作品》,其中的申报要求包括披露人工智能的存在和人类的实质性贡献。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预防自然人非法窃取并声称人工智能的输出成果为其原创作品,从而维护版权作品的认定与权益秩序。

因此,本文建议在版权申请的前置程序中设置明确的披露义务,具体有以下四点:

提前告知不履行披露义务的不利条件。不如实履行披露义务将存在整个作品被取消版权授权的可能性,恶意隐瞒或存在被行政处罚的可能性。

披露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利用(是与否)。

披露对智能技术具体的利用程度或人类实际的贡献程度。如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程序上百次的文本输入与调试,如对具体哪一项智能技术的使用。

设置弹性最低限度的使用比例。

首先,比例的份额。譬如可以设置人工智能技术参与创作的部分比例不超过整体作品的20%,且权利人需要对智能技术的输出拥有足够的控制权。根据技术的不断发展,可以弹性上调或降低这个比例。其次,比例的影响因素。由于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类型有着不同的独创性标准,可以根据现有的版权保护类型设定具体的比例。比如音乐作品需要在作品的旋律、和声及节奏上具有独创性,计算机软件需要在设计思路、算法设计、编程实现上体现其独创性,因而需要设置不同的使用比例。最后,例外情形。超出其最低限度使用比例可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认定为作品的例外情况,除非权利人付出了符合独创性标准的、可被层层证明的选择、再创作行为。具体参考春晚观点,即央视因将数量较多的节目编排形成了春节联欢晚会,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能够体现其选择和编排上的独创性,而将春晚认定为汇编作品。^①

(二)政策的指引:促进人工智能鉴别技术落地

规制一项技术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是开发和实施相应的反制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数据库的不断扩充,为版权制度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同时也衍生出了一系列的法律、道德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侵权风险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学生对人工智能技术过度依赖所引发的学术不端行为,部分自然人隐瞒智能技术的使用并申请版权保护的问题等。人类对智能技术的滥用容易扰乱版权市场,明确判定智能技术的利用比例能够更好地衔接现有的版权制度。其一,能够帮助明确著作权的归属。如果可以准确地检测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情况,就能够更清晰地确定作品的实际贡献度,有助于明确著作权的归属。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前阶段,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尚不具备被版权保护的资格。然而,哪怕是从技术的持续进步和深入发展的角度考虑,只要背后的自然人不对智能技术起到直接的支配作用,就需要完全否定其未来获得版权保护的潜在可能性。其二,能够促进技术的公平使用。如果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需要革新版权制度的那天,那么我们需要对使用智能技术的自然人和未使用者分别创设不同的独创性标准,既不阻碍技术的发展也不动摇制度的根本。其三,能够防止滥用和侵权。可以更有效地防止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防止抄袭、剽窃等行为。同时,这也有助于保护原创作者的法律权益,

^① 王迁:《论“春晚”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知识产权》2010年第4期。

避免他们的作品被未经授权的复制和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应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检测技术也在不断地发展。如 OpenAI 公司已推出检测器 AI Text Classifier,斯坦福大学团队发布了 GPT 生成文本检测工具 DetectGPT^①,但现有的检测技术精度不够,仍然无法准确辨别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占比。

人工智能反制技术领域的利润空间较小,缺乏相应的商业激励机制,应充分发挥政策和法律的指引作用助推人工智能鉴别技术的真正落地。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三)技术的运用:引入区块链技术

引入区块链技术,是固存人工智能技术使用痕迹的最优技术手段之一。区块链技术提供了一种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安全性高的数据存储和验证系统。^②

版权登记与时间戳:创作者完成作品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生成一个唯一的哈希值进行版权登记。使得作品拥有了一个不可篡改的时间戳,用以证明作品的创作日期和原始信息。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痕迹:区块链技术可以如实地记录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生成过程、参数和一系列相关信息,并留下不可篡改的痕迹。

智能合约与自动执行:智能合约可以自动检查新提交的作品与以往储存的作品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判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比例和潜在的侵权情况。

侵权证据及验证过程:如果出现侵权争议,可以使用存储在区块链上的哈希值和其他信息作为电子证据。由于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性和持续保存性,以上的证据具有极高的可靠性和法律效应。

跟踪与授权:除了固存证据这种常用的使用方式,区块链技术还可以用于跟踪作品的使用与传播流程,确保其在得到授权许可的情况下被合理使用。另外,智能合约能够自动处理版权许可费的支付与分配。

尽管在探索将区块链技术整合入版权制度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这需要大量的初步资源投入、细致的技术框架建设以及深入的使用导引。然而,基于其固有的特性,区块链技术无疑为版权领域带来了创新性的工具与策略,且其潜在价值亟待进一步的学术探索与实践应用。

(四)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最优归属:扩充公有领域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版权保护的潜在负面后果超出了预期的益处,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归入公有领域,能够在知识产权制度所倡导的“激励创新”与公有领域中的“促进使用”之间实现平衡,同时确保人类整体的创造基石得以持续地供给。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以秒为计算时间的创造力,刚好能够为公有领域供给海量的、碎片化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同时,将人类作者从无序、芜杂、繁重的基础工作中解放出来。智能技术能够充分发挥其工具属性帮助创作者更好地完成前期工作,如了解作品创作的历史背景、元素的梳理、特定物的检索等等,创作者能够更好地发挥其聪明才智或是实行一系列符合知识产权价值的汇编

① 刘智锋、吴亚平、王继民:《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对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影响》,《情报杂志》2023年第7期。

② 张雷、过晓星、张春霞、吴新平编著《区块链技术导论和开发指南》,科学出版社,2011,第160—170页。

工作,能够投身于更具智力创造性的工作中去。

正如彼得·德霍斯在《知识财产法哲学》一书中所提到的:“共有知识对于创造性活动至关重要。”即不管是艺术家还是科学家,拥有更多的可以公开使用的抽象物,在复杂的、多中心的任务的解决方面也将取得进步。多数学者也支持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扩充公有领域的观点,有学者甚至提出需要对“公有领域”这一常被视为异己性的存在,投入足够的法治关怀和保障。^①这不仅仅是口号,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视为公有领域的扩充还能够缓和一系列的法律争议。首先,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法律人格的缺失,将其归入公有领域,可以更好地规避这一问题。其次,关于权利归属的困惑。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一直是一个复杂的法律议题,将其归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团队、使用者还是其本身都存在较大争议。在实践层面,诚如具有典型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已经在用户协议中规定将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所有权归属于用户,因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法律责任也转移给用户。由此说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背后的研发者已经规划出符合其商业价值、社会运行规律的权利归属模式,将其纳入版权体系,将进一步地导致权责不统一的局面(责任过重)。综上所述,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置于公有领域比赋予其版权保护更兼具合理性和实用性。

五、结语

本文不断强调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非版权性,从多维度分析其不符合著作权保护的现实意义、经济价值与法律价值。从传统的版权法律关系视角进行解析,能够认识到核心问题在于“作者主义”的知识产权法哲学基础,一切都应该建立在以人为创造者的“作者主义”之上。版权法的核心并非为所有具有经济价值的成果提供保护,而是旨在鼓励原创性,通过赋予作者一定的专有权利,并为这些权利提供法律支持。仅有人类可以真正理解并受到版权法的激励,这源自其内在的创作驱动力。并非我们不认为版权法应顺应技术进步而适时修改,而是这种改变是倾覆式且完全背离立法宗旨的。将版权赋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仅贬低了真实作者的创作努力,还可能对版权市场产生深远的冲击,从而加重技术壁垒、助长商业垄断风险。这样的转变还可能为利益相关者设定不公平的基线,进一步抑制原创者的创作动力,并可能助长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内容抄袭、洗稿的行为。

展望强人工智能的未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议题可能逐渐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在那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整个版权制度都可能面临重大的挑战与变革。

作者简介:

杨昇,法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法律系主任,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民商法;

何琦,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法律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民商法。

(责任编辑:陈雯)

^① 赵丰:《智能生成内容利用下的版权制度挑战与因应——以 ChatGPT 为例》,《出版发行研究》2023 年第 3 期。

《民法典》视域下 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研究

胡可一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扩展了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确定了以协商和诉讼相结合的判定方式,重塑了关于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伦理价值。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家务劳动的补偿标准和计算方式不明确、缺乏对“承担较多义务”的评价标准、请求权方举证困难、请求权时间受限等堵点问题,导致法律在实践中的适用效果不佳、可操作性不强。本文从司法解释、举证责任分配、延长离婚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时间等方面提出优化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建议,旨在更客观认定家务劳动的价值,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指导和建议,维护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公平正义。

关键词:《民法典》;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司法公正

一、引言

家庭是天然和基本的社会单位,是由婚姻和血缘联结起来的亲属团体。家务劳动是实现家庭功能、家庭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家务劳动作为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必要因素,逐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时,女性独立意识觉醒并积极参与到社会劳动中,也颠覆了过去“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思想,男女在婚姻家务中分工出现对抗的情况。2021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在婚姻家庭编中对离婚家务补偿制度做出了相应规定,《民法典》生效后首例北京房山全职太太起诉离婚获取5万元的家务劳动补偿费进入大众视野,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该制度的广泛讨论。该案件是首次适用《民法典》新规“离婚家务补偿制度”并审理结案的案件。根据《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民法典》在颁布前后对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最大的区别在于,一是区别于过去将夫妻分别财产制作为

^① 夏吟兰:《民法典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完善的人权内涵》,《人权研究》2020年第2期。

适用前提,而采用夫妻共同财产制。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40条^①首次设立离婚经济补偿制度,适用前提是夫妻双方采用分别财产制,适用主体有限,并没有完全达到救助家务承担方的预期目的,^②《民法典》颁布后,直接在第1088条扩充了适用主体,明确离婚经济补偿适用于共同财产制。究其原因,婚姻对于感情维系、人口繁衍、文明发展等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每个配偶对家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家务劳动在商品交换社会中,虽然对社会而言没有经济价值,但是对家庭而言是有经济价值的,主要在于承担家务方为另一个方积累社会财富提供了无形贡献,对家庭财富积累的贡献与另一方是对等的,对家庭财产享有平等的所有权。^③因此,对原《婚姻法》第40条作出了修改,离婚家务劳动补偿的条件已不再是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④在《民法典》第1088条删除了“分别财产制”这一限制条件,扩大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⑤二是区别于原《婚姻法》程序空白,《民法典》设置了协商前置程序,明确可以对补偿方式、补偿标准和实践期限进行协商,充分体现了民法意思自治的原则。基于对婚姻家庭按照隐私性和复杂性的考虑,法院在没有明确的考量因素和计算标准时,通常采取大概确定的补偿方式,协商程序前置程序的设置能够保障双方当事人在离婚自由的前提下为自身争取最大的权益,^⑥《民法典》增加了程序上的具体规定,可以采取双方协议或者诉讼的方式,从而更具有可行性,^⑦也反映了我国立法取向更加重视家务劳动。

此次《民法典》重构了离婚家务补偿制度,是我国立法对女性家务劳动价值的重视,有利于构建夫妻双方“平衡共进”的家庭结构,建设平等和谐的新型家庭关系。本文将从立法、司法等方面解析家务补偿制度的存在价值,反思立法不足,并提出促进该制度的合理化、科学化建议,补足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基础理论、可操作性,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指导和建议,让制度发挥平衡夫妻双方利益、保护双方合法权益的作用,以实现公平正义的法治价值。

二、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适用概况

(一)含义

家务劳动是指家庭成员用于家庭内部事务的自我服务和相互服务的劳动消耗。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指的是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一方在家中承担了较多的家务劳动,另一方应当对其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以保障家务劳动较多的一方能够得到一定经济补偿的救济性权利,夫妻双方在离婚时,应当对家庭生活中付出较多劳动的一方给予经济补偿。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核心之一是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体现,

-
- ①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条: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 ② 王子骞:《我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司法适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法律系,2023,第1页。
- ③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第2067页。
- ④ 李格格:《家务劳动补偿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律系,2022,第1页。
- ⑤ 项定宜、杨思凡:《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价值及其困境化解》,《宁波工程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
- ⑥ 姜爱君:《离婚家务劳动补偿条款问题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财经大学法律系,2023,第7页。
- ⑦ 薛晨皓:《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应体现对家务劳动价值的尊重——兼评〈民法典〉对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修改》,《绥化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

《民法典》的颁布让在家务劳动中承担劳动较多的一方得到补偿,承担家务较多的一方也不局限于仅仅是女性,也同样适用于“家庭煮夫”。但是,在当前婚姻家庭关系中,女性在家务劳动主体中占比较大,女性仍然是人力资源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而这种承担人力资源再生产的劳动在婚姻关系中通常被认为是无报酬的。^①因此,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更多是用于保护女性权益,促进男女社会的实质平等。

(二)我国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立法变迁和特征

原《婚姻法》第40条规定,第一次正式提出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是我国首次以立法形式确定家务劳动的实际价值,在当时填补了我国离婚纠纷中精神和财产救济的法律漏洞,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忽视了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现实情况,将家务劳动补偿从主流的共同财产制中排除出去,极大地限制了该救济制度的适用范围,^②由于较多家庭难以满足适用条件,无法保障在婚姻中付出家务劳动一方的合法权益。而新颁布的《民法典》第1088条明确了行使离婚家务劳动补偿请求适用条件,直接扩大了适用范围,并且充分尊重了离婚双方当事人的意愿,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 适用范围扩大到夫妻共同财产制

《民法典》删去了原《婚姻法》分别财产适用的前提,对其适用范围作了适当的放宽,夫妻双方采用法定财产制时亦可适用。^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亦延续了民法典的立法精神,删除了旧法中离婚经济补偿只适用于夫妻双方实行财产分别制的情况,肯定了全职家庭主妇(主夫)的家庭付出。^④原《婚姻法》中对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夫妻双方分别财产制的情况不再适用。《民法典》放宽了离婚家务劳动补偿的适用范围,提升了该制度的司法适用效率,为承担更多家务、更多家庭责任的一方提供了完备的法律支撑。作出这一改变的原因是在司法实务中,我国绝大部分夫妻之间普遍采用共同财产制,使得原《婚姻法》中关于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非常狭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束之高阁,有大量审判人员甚至在一年中没有受理一例关于家务补偿的案件。这使得长期承担大量家务劳动而在社会经济地位中处于劣势的一方难以真正维权。而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范围扩展至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中,从法律角度对家务劳动行为表达了肯定的态度,认定家务劳动理应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责任,也更有利于婚姻期间对社会地位较低、经济地位较低但是对家庭贡献较大的一方获得相应的救济补偿。

2. 制度的适用基础条件为“负担较多义务的一方”

本文认为,对负担的各种家务劳动应当做扩大解释,不仅仅只包含《民法典》第1088条所列举的几个方面,还应当包括打扫卫生、收拾房屋、接送小孩、采购生活物资等一切属于家庭共同体的事务,这种付出不仅是基于双方婚姻法律关系,还基于社会道德伦理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女性和男性同样需要面临职业和家庭的选择,双方同样负担家务劳动义务。因此,法官可以根据大众的认知与家务

① 尚云琪:《解释论视角下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司法适用研究——基于对〈民法典〉第1088条的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法律系,2022,第4页。

② 吴晓芳:《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新增和修改条文的解读》,《人民司法》2020年第19期。

③ 冉克平:《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的体系、内容及其完善》,《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1期。

④ 杜玮淦、吴欣彤:《家务劳动经济价值获得肯定》,《南方日报》2022年11月7日第A08版。

劳动的本质与特点进行判断,^①要从社会普通大众对家务的普遍认知来确定对家务负担的多少,综合家务的质量、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综合考量。

3. 协商和诉讼相结合的判定方式

《民法典》第1088条新增了关于协商离婚家务劳动补偿的规定,突破了原《婚姻法》对行使请求权补偿的方式界限,其中也蕴含了“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的法律谚语,这也是告知夫妻双方出于意思自治原则可以行使权利,自行协商补偿金额,化解双方矛盾,当双方无法通过协商解决的时候,再采取法律强制力的介入,由法院判决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协商和诉讼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能够节约司法资源,妥善处理夫妻双方矛盾;另一方面又为矛盾激化做了制度铺垫,用法律手段保护双方合法权益。

原《婚姻法》虽然也体现了男女平等的立法考量,但是因为其适用范围过窄,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和我国婚姻家庭的实际情况相匹配,出现了法律制度不适用的尴尬情况。因此,《民法典》直接从制度上进行了完善,扩大了适用范围,并允许双方自行协商。可以说,《民法典》的颁布充分考虑了我国婚姻伦理家庭关系中的热点问题,并直接在立法上进行了回应,也是法律公平公正的价值选择。

三、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重要意义

(一) 社会价值:对抗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观念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在中国具有几千年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女性主义思想的崛起使得一部分女性开始反思家务劳动的价值,女性这一行为和思潮打破了传统的男女劳动分工模式,女性就业能力的增强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彻底颠覆了其在家庭中的地位 and 影响力。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确定,更加从法律价值取向明确了家庭关系的稳定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经营,而不是传统的家务活动是某一方责任的想法。立法者已经认识到传统性别分工不再适用于当前社会的价值体系,通过设立该制度肯定了家务劳动一方的劳动价值与从事较多社会劳动一方有同等的意义与地位,也有利于促使“主外”的一方意识到家务劳动的价值,并主动参与到家庭劳动中去。律法的制定与社会观念存在着相互适应、相互塑造的作用,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女性在维持家庭正常运转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被重视的情况,推动社会对性别平等的思考,改变传统社会观念,形成新型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

(二) 经济价值:为弱势方提供经济支持与保障

常年进行家务劳动的一方会逐渐降低劳动职业技能,往往在离婚后造成经济贫困和就业困难,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劳动性质的不同以及劳动投资对象的不同。从事家务劳动较少的一方,其有偿劳动往往依靠的是一份稳定的职业,离婚对其正常社交生活、获取薪水能力的影响极小。而从事家务劳动较多的一方,劳动投资对象就是自己的家庭,具备唯一特定性和薪酬“不定性”,夫妻双方一旦离婚,其劳动对象不复存在,劳动价值无法计算,离婚意味着“失业”。面对如今社会工作岗位竞争激烈,如果夫妻一方一直囿于家务从未进入就业市场,则其在离婚后更难以适应就业市场的竞争,加之如果没有专业技术和年龄优

^① 吴致滢:《我国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司法实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财经大学法律(法学)系,2023,第16页。

势,更缺乏与应届毕业生竞争的能力,同时由于缺乏经济条件支撑,在离婚时与配偶争夺子女抚养权时也会处于劣势。法律设定离婚家务劳动补偿的意义,也就体现在为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成本的一方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承认了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①帮助其能够在离婚后重新融入社会的物质保障,保护了“非双职工”家庭的弱势方利益。

(三)伦理价值:维护人格尊严

传统伦理价值观认为男性对外承担有酬劳动和女性对内承担无酬劳动,共同构成了家庭的普遍运行框架。事实上,这一理念无形中将女性放在了从属地位,同时也造成了社会普遍轻视女性家务劳动,认为家务劳动不产生社会价值,是一种理所应当的劳动,从酬劳来区分劳动价值无疑忽略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对女性的剥削也由此而来。同时,由于家务劳动的无偿性和市场封闭性,使得女性所付出的劳动无法在市场上产生价值,因此需要依赖男性的劳动报酬来维持生活,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处于劣势地位,逐渐丧失独立人格。家务补偿制度承认了家务劳动的工作价值,是法律对家庭伦理关系的一种强制性调节,充分体现法律对个体参与“社会价值创造”之外的劳动活动的认可,也体现了法律对个人在人格独立上的认可。

四、《民法典》视域下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家务劳动的补偿标准和计算方式不明确

一是补偿标准不明确。《民法典》第1088条未明确规定家务劳动补偿的标准,亦未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这给司法实践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实务中也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往往依据夫妻双方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女方在家务劳动中的付出成本、男方的经济收入情况、地区一般收入水平等进行综合判断。^②但是,这种判断的方式其实仅仅是根据当地的平均工资整体水平来判断,适用的因素较为单一,可能会忽视个案的公平正义,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最终造成同案不同判的不利后果。因此,目前《民法典》规定下的家务劳动补偿标准应用和实际情况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是一种片面的计算标准,忽视了对人的情感的付出的考量,无法体现《民法典》对家庭婚姻关系的利益平衡。

二是计算方式不明确。在徐某、梁某离婚纠纷一案中^③,法院认为已在分割房款时照顾被告,因此不再另行支持家务补偿金。法官在进行判决的时候,对金额的计算相对保守,或将补偿金额与实际夫妻共同财产折合计算的结果混为一体,并未对当事人的额外家务补偿的请求进行合理的回应,客观上造成家务补偿制度无法发挥保护弱势群体的作用,也无视了法律对社会的引导功能,违反了《民法典》确定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立法初衷。因此,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不足之处在于立法还没有对家务劳动的标准和计算方式进行明确,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可能导致案件的结果不公正,从而会影响法律制度的权威性。

① 李勇:《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女性主义分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

② 梁雅婷:《离婚家务劳动价值补偿制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法律系,2023,第18页。

③ 参见(2022)粤0113民初8754号。

(二) 缺乏对“承担较多义务”的评价标准

《民法典》虽然对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进行了修订,但是并未对“承担较多义务”进行认定,实践中的认定往往是基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证明。本文认为,条款中应当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对“较多”的认定,第二是对“义务”的认定。家务劳动承担较多的一方基于对其婚姻的信赖,婚姻关系又是一个凝聚感情、经济和性等多种因素形成的彼此信赖的生活共同体。^① 家庭内部的分工可能导致了责任分工的不同,一方当事人可能负责对外寻求经济支撑,另一方当事人负责对内维护家庭内部稳定,但是不能完全将在外获取收入的多少和在内照顾老人子女的价值进行同等比较。法律义务是由法律关系决定的,用收入、家庭责任分工的不同来衡量“义务”不符合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设定的目的。因此,实践中对“承担较多义务”的评价标准不一,评价方式也较为模糊,导致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是急需解决的难点问题。

(三) 请求权方举证困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当事人应当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在生活中承担了较多的家务劳动。婚姻家庭特殊的社会属性给调查取证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夫妻双方对于家务劳动的举证都存在无法证明产生了隐形家务劳动,例如为了照顾家庭被迫选择放弃自己的职业,为了接送子女放学选择工作强度小但是薪酬也较少的工作,或者为了照顾生病的老人小孩频繁请假,为了婚姻家庭付出的无形劳动往往被无视和忽略。这使得法院常常因为无证据驳回原告请求。例如,在姚某、郭某离婚财产纠纷一案中,^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未能提供证据,对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在笔者随机抽取的31份关于家务补偿的判例中,法院以未能提供充分证明为由驳回上诉的案件就有9例。从抽样案件中可知,举证困难是请求家务劳动补偿的一大障碍,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常常是无形的,并且双方在为家庭付出的时候并不会考虑到今后会有“对峙法庭”的一天,没有人会专门为非物质性的付出留下客观证据,也由于家务劳动在家庭生活中的普遍性,导致一般人也不会注意随时保存相关证据以备未来“可能”离婚时使用。因此,本文认为需要对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举证规则进行明确,才能为司法判决提供更加客观、直观的证据,为法官公正裁决奠定基础。

(四) 离婚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时间受限

《民法典》规定一般民事诉讼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为3年,而对于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请求权时间只局限于离婚时,一旦错过机会,离婚后即使向法院请求补偿也无效。在曲某、徐某离婚财产纠纷一案中,^③对于曲某所提出的补偿诉求,法院以该请求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且赔偿请求应在离婚诉讼中提出,在本案中不予审理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夫妻双方作为过去互相扶持互相包容的人,家务劳

① 吕春娟:《社会性别平等理论视域下女性家务劳动合理补偿之法理思考》,《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② 参见(2022)粤0118民初4239号。

③ 参见(2021)鲁1482民初2602号。

动不仅是劳动的一种形态,更意味着家庭成员感情的付出。它不像其他社会劳动一样是毫无感情的机械性的劳动,而是一种带有感情投入的劳动。^① 本文认为,离婚时夫妻双方有必要理清权利义务关系,首先,当事人在最后离婚阶段精神上已产生了一定的创伤,又同时忙于争夺子女抚养权、分割夫妻财产、处理债务归属等事务,大部分人都无法在第一时间作出对家务补偿维权的反应,加之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基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或者情面观念,在离婚时没有及时通过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维护合法权益,法院一旦判决后,当事人将面临诉求无路的尴尬境况,也不利于司法公正。其次,承担家务劳动较多的一方,可能在离婚后才重新步入职场,在面临竞争激烈的岗位时,才意识到是承担了家务劳动导致自身缺乏必要的时间、精力来提升就业能力。由此可见,家务劳动付出的影响在一定时间段后才能显现,如果一味将请求权时限限定在“离婚时”,无疑妨碍了弱势群体的维权需要。因此,请求权的时间应该合理进行延长。

五、国外立法借鉴

(一)美国

美国的离婚抚养制度核心在于对抚养责任的认定采取“过错主义”和“无过错主义”,《美国统一结婚和离婚法》中规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法院要考虑以下因素:①每一方对婚姻财产的获得所做的贡献,包括一方以操持家务的方式所做的贡献;②分配给夫妻每一方财产的价值……”该法律还规定了离婚后抚养费制度,进一步保护了付出家务劳动一方的权益。在司法实践中,美国各州的法官在确定抚养费金额时通常会考虑双方在婚前是否签有相关协议、配偶各自的收入情况与他们的就业能力、一方对另一方的协助、婚姻期间的生活标准、照顾孩子所需的花费、一方是否存在过错等,对这些因素综合考量之后,法庭会对弱势一方进行法律救济,通过抚养费制度来平衡夫妻双方权益。^②

(二)德国

《德国民法典》第1360条规定:夫妻双方相互负有以其劳动和以其财产适当抚养家庭的义务。家务处理交予夫妻一方的,该方以处理家务履行其以劳动抚养家庭的义务。第1570条规定:“离婚的夫妻一方,在因照料或教育共同的子女而不能期望其从业的时间和限度内,可以向另一方请求扶养。”法官在判决离婚时应当考虑婚姻存续的期间因从事家务而导致的学业或工作迟延和没能取得适当职业的时间等因素。《德国民法典》关于家务劳动的重大变革将家务劳动作为夫妻之间的法定义务,并且作为一种职业,与以财产供养家庭等价,直接从立法层面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

(三)日本

日本女性在婚后成为全职家庭主妇已经成为该国独特的传统。由于日本社会中通常是由妻子来负责家

① 李丽:《离婚时家务劳动的价值承认与法律保护》,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法律系,2014,第8页。

② 吴致滢:《我国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司法实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财经大学法律(法学)系,2023,第6页。

务劳动的,对于家务劳动价值的肯定就是对于妇女社会地位的肯定,肯定在婚姻中女方的地位便是对于女方付出的家务劳动的价值的肯定,一旦家务劳动有其自身的价值,妇女就应该享受家庭给予的回报,就应该获得相应的财富报酬。《日本民法典》对已婚妇女的法律保护发展至今已经比较完善。“法官在处理离婚案件时,应当考虑夫妻双方取得共同财产的数额及其他一切有关情况后再做决定是否分割财产。”在这一规定中,“其他一切情况”包括了婚姻存续期的长短、婚姻期间家庭收入状况、家庭各项费用数额、夫妻关系的融洽度、夫妻之间互相帮助的状态、婚姻期间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造成的金钱损失等。^①

从美国、德国、日本的立法中都可以明确,域外较多国家法律都对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给予了肯定,并纳入离婚时或离婚后的补偿性给付,给付标准都采用了综合考量的方式,为家务劳动补偿金的计算提供了明确的指引。通过对域外立法和我国《民法典》第1088条进行对比,我国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六、对我国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建议

(一)明确家务劳动补偿数额的参考因素

《民法典》第1088条将离婚家务劳动补偿适用范围扩大到夫妻共同财产制,也意味着家务劳动补偿金额的计算更为复杂,但是目前没有专门的法律或司法解释来对补偿金额进行明确规定。家庭作为伦理与经济相结合的单位,设计一个合理完善的补偿标准不仅有利于当事人维护自身权益,也可以防止法官过度使用自由裁量权。本文认为,夫妻双方应当首先基于意思自治,可以协商约定家务劳动补偿金额,如果没有相关约定,则应当从夫妻双方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家务劳动补偿的数额,例如:综合双方收入情况、一方在家务劳动中付出的时间精力、请求家务劳动补偿一方在离婚后的生活水平及困难程度以及婚内承担家务劳动对其事业及收入的影响等。这些因素的考量需要立法机关结合当前司法实务中所存在的案例进行提炼与总结,从而得出一份具有参考意义的标准供夫妻双方、执法部门、司法部门、律师等相关人员参考。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应当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对离婚家务劳动补偿数据的计算进行较为具体的规定:夫妻双方可以就家务劳动补偿进行协商或约定,协商不成或未约定的,可以参考以下几种因素:(1)双方收入情况;(2)一方在家务劳动中付出的时间精力;(3)离婚后生活水平及困难程度;(4)婚内承担家务劳动对其事业的影响;(5)离婚后再就业的难易程度。(7)其他可以作为参考因素的情况。

(二)优化“承担较多义务”认定方式

《民法典》第1088条对“承担较多义务”的认定还不够清晰,本文认为,应当明确“较多义务”的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明方式。依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原则,家务劳动补偿举证方往往较难举证,所以需要证据互相结合对比,并形成全面证据链,才能对“承担较多义务”进行认定。例如,夫妻一方如果经常洗衣、做饭、带孩子、照顾老人,则当事人手里应当具有购买生活物资、与孩子劳动沟通的聊天记录、陪同老人就医的支付记录等证据,要运用消费支出、出行记录等辅助证明“承担较多义务”。

^① 夏桂梅:《论我国夫妻家庭劳务价值的认定》,硕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法律系,2017,第7页。

(三)完善家务劳动补偿证据制度

如何对家务劳动付出较多一方进行证明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堵点,本文认为,应当从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和扩展证据来源来减轻当事人的举证难度。一是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在离婚家务劳动补偿案件中,不仅是请求方,另一方当事人也应当提交自身承担较多家务劳动的证据,只有对双方证据进行对比,才能更客观确定事实,如果另一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不如请求方提供的证据证明自己在家务劳动中付出了较多的精力,则法院可以从考虑认定请求方主张,判决另一方给付家务补偿。二是扩展证据来源。就司法机关来说,可以听取当事人近亲属、与夫妻双方有共同生活情况的人,以及居住地附近的邻居等相关证人、证言,以便从多方了解是否存在当事人对家务劳动确有更多付出的事实。当事人自己也可以保留并出示平时生活中的相关家务劳动照片、视频、消费记录等进行举证。

(四)适当延长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请求权时间

本文认为,可以将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请求时间确定为3年,并且该3年的时效应当为诉讼时效。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实质上是经济补偿,经济补偿请求权属于一般请求权,应当适用《民法典》以及《民事诉讼法》对一般请求权的3年的诉讼时效。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夫妻法律意识淡薄,双方往往在离婚后才提出家务劳动补偿,并且对于家务劳动的举证也存在时间不够、准备不充分的情况。因此,适用3年的请求权时效不仅有利于双方能够及时以法律的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还有利于在充足的时限内进行举证,为家务劳动补偿提供详尽的证据,为法官判案提供证据支撑,维护司法公平。

作者简介:

胡可一,西南石油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2022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为民法学。

(责任编辑:陈雯)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

——邓小平在武汉关于发展理论的思考探索和当代启示

熊俊潇

摘要:邓小平在武汉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著名论断并形成了关于发展的系列重要论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重大论断的思想基础。研究邓小平在武汉的思考探索,尤其是把邓小平发展理论同习近平经济思想贯通起来,同武汉改革开放史研究结合起来,总结历史经验,从中汲取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武汉实践的现实启示,提出重塑新时代武汉之“重”需做好“五篇文章”的建议。

关键词:邓小平;发展;武汉实践;新质生产力

一、邓小平与武汉的七次相逢:又逐春风到江城

邓小平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与武汉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多次来到武汉,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武汉都出现了这位伟人的身影。

(一)八七会议始相逢

1927年6月,23岁的邓小平第一次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①,当时的武汉是“略如纽约、伦敦之大”享誉海内外的“东方芝加哥”,是拥有“驾乎津门,直逼沪上”赫赫威名的中国大都会,是成为轰轰烈烈全国大革命中心的“赤都武汉”。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身份参加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的八七会议,并负责会议记录。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紧急会议,并在会上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著名论断,两位历史伟人在武汉第一次相会、相知。为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他在武汉把自己的名字由“邓希贤”改为“邓小平”,从那以后,这个名字一用就是70年,影响中国至今。据档案资料记载,最为人所熟知的“小平同志”这一称呼也来自武汉。1984年4月,邓小平亲笔圈阅了一封来自武汉的信,批示道:“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称呼,我很喜欢,酌重处理!”自此,“小平您好”成为跨越世纪、永不遗忘的亲切问候。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第32页。

(二)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7年8月,历史又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邓小平与刘伯承一起率领12万大军勇挑重担,以“站得住就是胜利”的英雄气概奋勇挺进大别山,揭开了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10月,刘邓大军挥师南下,在武汉近郊的黄陂、新洲激战,其中新洲李家集镇之战是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脚跟的三场战役之一,歼灭了大量敌军,创建巩固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直接威胁国民党军的战略后方,实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三)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来汉

1958年11月,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第一次来到武汉,协助毛泽东在汉召开中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为纠正“左”倾冒进错误作努力。其间,邓小平和陈毅一起视察武汉钢铁公司,为新中国的第一个钢铁基地建成投产而欣喜。据武钢厂志记载,1958年12月13日,当看到1号高炉出铁盛况、听说2号高炉即将动工的时候,他们高兴地说:“你们要多建几座大高炉,那时我们再来参观。”

(四)再进钢城

1973年12月,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首次外出考察,回京途中在武汉经留,再次视察了武钢。当得知全国最大的4号高炉仅用137天就建成,恰好与淮海战役时间相同时,这位当年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书记称赞道:“好!又一个淮海战役,是钢铁战线的淮海战役。钢铁工业要搞好兵团作战,但是一定要科学组织,合理施工,希望你们再打一个团结协作的漂亮仗。”他对武钢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搞建设,就是要有速度。生产要狠抓才能搞上去。武钢是新中国兴建的大钢都,地理条件优越,很有发展前途。”此时的武汉,除了武钢,还是武汉长江大桥、武重、武船等一批大国重器的铸就之地,是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一系列宏伟构想的谋划之地。

(五)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

1974年9月,邓小平陪同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多次接见外宾。武汉是除北京之外,毛泽东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之一,东湖宾馆甚至享有“湖北中南海”的美誉。正是在武汉,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把邓小平推到中央党、政、军领导工作第一线,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4年底,毛泽东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1975年1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六)长江三峡行

1980年7月,邓小平乘轮船顺江而下视察长江三峡,到达武汉。7月15日,他特地参观了八七会议会

址,对八七会议的筹备召开情况和白色恐怖下转移经历进行了回忆,还特别强调:“首先要讲八一南昌起义。八七会议是号召举行全国武装起义,会后在全国各地相继组织武装起义,虽然八一南昌起义在八七会议之前,但八一南昌起义也是体现八七会议方针的。”^①7月16日,邓小平考察武汉钢铁公司第二炼钢厂,这是他第三次进钢城,在参观从国外进口的一米七轧机设备时表示:“我们要学习国际上先进经验,但光跟在别人后边不行,要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你们要利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搞好新产品质量,多出钢材,出好钢材。”7月17日至20日,在武汉召开会议听取“六五”计划和一些长远规划设想,对三峡工程建设进行讨论,他表示:“修建三峡工程,对航运的影响不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不大,而对防洪所起的作用大,发电效益很大。因此,轻易否定三峡工程不好。”正是这一重要表态,加快了三峡工程的论证进程。

(七)南方视察首站

1992年1月18日,88岁的邓小平进行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南方之行,武汉有幸成为他视察南方的第一站。这一次是邓小平在武汉停留最短的一次,时间是29分钟。省委领导邀请老人下榻东湖宾馆,邓小平说只在车站作短暂停留,连休息室也不必进了。在武昌火车站,他谆谆告诫在场的省、市领导:“发展才是硬道理。”“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能快就不要慢。”“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并提出“三个有利于”的著名论断。在登车道别时,邓小平还说:“等你们更发展了,我一定会再来的。”以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二、武汉改革开放的四个10年:一部波澜壮阔的发展史

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中心问题,发展问题是邓小平论述最多的问题。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发展”一词就出现了558次。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时刻关心着武汉的发展,对武汉寄予殷切期望,特别是在武汉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著名论断,并就“为什么要发展,怎样推动发展”作出了系统阐述。回首武汉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深刻感悟到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巨大前瞻性和深远影响力。

(一)第一个10年(1982—1992年):“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到西方发达国家或周边快速发展的国家、地区出访考察。通过亲闻亲见,邓小平对现代化有了全新感悟,对中国与世界现代化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有了深刻认识,在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坦率地承认,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航程。邓小平提出:“对于我们的建设事业说来,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655页。

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①

武汉历史上就是国之重镇,是一座有“敢为天下先”基因的城市。从汉口开埠后的“东方芝加哥”,到洋务运动中的“汉阳造”;从新中国成立后刷新了多项共和国第一的众多“武字头”国企,到改革开放时期开风气之先的小商品市场,武汉曾一直处于中国经济的领头羊位置。在第一轮的改革开放浪潮中,武汉开了个好局,汉正街闻名天下,改革市长吴官正名噪一时。1982年,全国改革重点开始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此时武汉仍是全国最大的省会城市,经济总量在全国位列第四,仅次于京沪津三大直辖市。

开放是最大的改革。1984年,在中顾委全体会议上,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要达到在下个世纪上半叶实现现代化的新目标,离开对外开放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从全国最开始设立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到后期的大连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都没有武汉。没有开放这一强大驱动力,武汉很快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落在了后面,不断被其他城市赶超。1985年重庆、广州经济总量超过武汉,1987年杭州GDP超过武汉,1990年武汉竟被挤出了中国主要城市GDP排行前十名,1992年再次跌到第15位,地区生产总值仅为广州的一半。

(二)第二个10年(1992—2002年):“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

在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总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他希望经济尽可能快地增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②“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③“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④

1992年对外开放从沿海向沿江扩展,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武汉为沿江开放城市,相比深圳等沿海城市,武汉对外开放晚了13年。这10年,武汉市人民牢记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时的殷殷嘱托,埋头苦干,未曾有丝毫懈怠。从纵向比,武汉的经济发展很快,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10%,武汉市于2000年前就走完了前两步,即199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1996年又提前4年实现翻两番^⑤,武汉的经济排名终于没有再下滑。但是从横向比,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许多地方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增长率,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增长奇迹,相比较,武汉的速度就慢了。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武汉与头部城市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1992年武汉与上海地区生产总值相差858亿,到1997年相差2551亿,到2002年相差4328亿。另一项衡量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2年武汉在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中位列第14位,是居第1位的深圳市的一半。^⑥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41页。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63页。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56页。

④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5页。

⑤ 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指数,以1980年不变价格作为基年价格计算。

⑥ 根据各地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整理得出。

(三)第三个10年(2002—2012年):“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邓小平把发展看成一个动态的长期的过程。他在谈到经济发展时曾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之后,发展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从国际国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要有这个雄心壮志!”^①

城市作为区域的核心,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先后实施东部沿海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在国家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中,武汉一直被忽略。武汉在东南西北的夹击之中,在一轮轮的重大政策调整中几乎都落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中部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发展速度又比不上西部,频繁被指“中部塌陷”。面对这种不利局面,当时武汉的领导干部均在大声疾呼“武汉在哪里”,请求中央重视武汉在中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004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伴随着国家对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视,武汉开启强势逆袭征程,作为当时中部地区唯一的特大城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主动提出打造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目标,承担起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支点”角色。武汉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很强,在中国主要城市的GDP排行中一直保持在15名以内,相比之下,一些城市如哈尔滨、济南等早已被挤出20强榜单。2010年,《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获国务院正式批复,武汉被定位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同年武汉市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五千亿大关。但武汉不再是中部地区的唯一代表,2009年长沙位列大陆城市GDP第18名,2011年郑州进入20强榜单,这10年武汉的GDP年均增速只位列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第4位,落后于合肥、长沙和南昌。^②

(四)第四个10年(2012—2022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曾经语重心长地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而后不论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还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都表明,邓小平关于发展的观点和思想不仅得到了继承和丰富,而且得到了创造性升华、开辟了崭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等持续实现和推进,国家对各地均进行了布局,让更多城市迎来了发展机会。新时代10年是属于更多地区、更多城市的10年,也是武汉历史上发展质量提升最快、人民群众受惠最多的10年。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5次考察湖北武汉,在武汉擘画重大国家战略,以武汉为主场开展大国外交,为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指路领航,带领我们打赢气壮山河的疫情防控武汉保卫战,多次称赞武汉是英雄的城市,深情牵挂着英雄的武汉人民。这10年,是武汉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10年,2011年武汉市描绘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的美好蓝图,立志不仅要做中部的武汉,更要做中国的武汉。2014年用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7页。

^② 根据武汉、长沙、郑州、合肥、南昌、太原等6市统计局公布的每年GDP增速作平均计算。

5年时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翻一番,突破1万亿元大关。2016年武汉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在全国发展战略布局中的功能定位由“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上升到国家中心城市,实现城市发展能级一次质的飞跃。2021年吹响了“奋力打造新时代英雄城市”的嘹亮号角,全面开启武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23年武汉经济总量迈上2万亿台阶,实现发展能级新跃升。这10年,武汉经济发展实现量质齐升,经济总量重返并稳居全国城市第8,主要指标增速保持全国同类城市前列。城市功能品质大幅提升,摘掉了“大县城”的帽子,城市建设实现了脱胎换骨的深刻变化。

三、对中国式现代化武汉实践的启示: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邓小平曾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①生产力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转向质的提升。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和高度的理论自觉,先后首次提出“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从“发展”到“高质量发展”,从“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既有历史渊源的一脉相承,又有与时俱进的理论跃升,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发展,也是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继承创新,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

武汉作为中部重镇、九省通衢,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五次考察武汉,对武汉作出“中部重镇”“英雄城市”的殷殷期许,提出“创造新时代更加辉煌的业绩”“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大潮中勇立潮头”的殷切期望。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武汉来讲,“发展不够”仍然是最大的实际,“发展什么、怎样实现发展”是最迫切的任务,“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最现实的路径,是一次系统性、重塑性的战略机遇。

(一)教育、科技、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支撑

当今时代,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三者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邓小平高度重视教育、科技、人才,始终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

教育要“三个面向”。改革开放之初,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时强调:“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也正是这次会议,拉开了重启关闭10年之久高考之门的序幕,1977年冬天,570万年龄大小不一的青年走进了高考考场,1978年春天,27.3万名考生成为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3年邓小平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设计出发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②,这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精髓和灵魂,特别是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抓住了教育“要为什么服务”这一根本问题。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7页。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5页。

武汉一直是全国高等教育重镇。在1977年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时任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首倡恢复高考,被誉为“建言恢复高考第一人”,得到邓小平肯定。在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后,武汉高等教育也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逐渐聚集了一批中央、省属重点院校和市属高校。在巩固和加强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武汉地质学院、华中农学院等重点大学建设的基础上,加强建设湖北财经学院、湖北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等一批各具特色的院校。发展到今天,武汉市拥有92所高校、100多家科研院所、超过130万名在校大学生,高等教育实力与资源在全国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在全国排列第三,被称为“大学之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推动是一贯的。1978年3月,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首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1988年,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又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①的重要论断。他还亲自批准实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提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把对科技的认识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体现了党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和远见卓识,从此我国科技事业开启了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

“谁抢占了高科技这个前沿阵地,谁就能在21世纪立于不败之地。”武汉光谷的发展历程充分印证了这一重要观点。1976年,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赵梓森院士等科研人员突破核心技术,用“土法上马”拉出了中国第一根光纤。1983年,武汉市委、市政府敏锐地认识到新技术革命事关武汉发展战略,开始筹建东湖开发区。1988年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正式创建。进入21世纪后,光电子产业成为全球高新技术的前沿领域,为拥有国内光电子技术三分之一储备的武汉迎来了重大战略机遇。2000年,武汉地区的专家学者提议依托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设“武汉·中国光谷”。2001年,国家计委正式批复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立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此后,武汉光谷一路追光逐梦,逐步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光通信研发基地、中国最大的光器件研发生产基地、中国最大的中小尺寸显示面板基地以及中国最大的激光产业基地之一,习近平总书记肯定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在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独树一帜”,实现了从“一束光”到“世界光谷”的华丽蝶变。

人才是关键。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了人才问题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他多次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②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始终把人才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第一资源,以敢为人先的气度不断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集聚了一大批海内外高端人才,演绎了一个个创新创业的人才故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武汉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为创新涌动的“大学之城”提供强大人才支撑。截至2022年底,全市集聚两院院士81名、专业技术人才179万人,连续6年每年吸纳大学毕业生30万人以上。一批优秀人才扛起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发展重任,全球首款新冠灭活疫苗、全球首款232层三维闪存芯片等一批重大自主创新成果在汉产生。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74页。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80页。

(二)做好“五篇文章”,重塑新时代武汉之“重”

总的来看,武汉有责任、有基础、有动力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邓小平发展理论,武汉可以做好“五篇文章”,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努力全省乃至全国发展多作贡献。

扎实做好“创”的文章。每一次生产力的大解放都是由一次重大科技革命引发。正如邓小平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①“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②。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武汉科教资源丰富、人才智力密集,关键是要加快把武汉科教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胜势,加快建设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争创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以用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项目为载体推进科创供应链平台建设,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

扎实做好“智”的文章。邓小平在武汉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但光跟在别人后边不行,要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纵观近300年工业发展史,工业革命1.0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械化时代,2.0是以电能广泛应用为代表的电气化时代,3.0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时代。当前,人类社会正在加速迈入4.0智能化时代,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颠覆性前沿技术创新突破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无论是一年多前风靡全球的ChatGPT,还是目前火出圈的Sora,以生成式AI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改变世界。武汉在人工智能特别是在芯片制造领域有独特优势,应抢抓机遇,持续做强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未来网络等优势产业,以智能芯片为引领、以大模型为驱动、以先进算力为支撑,统筹推进通用大模型和垂直大模型研发应用,打造全国人工智能发展高地,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主动权。

扎实做好“运”的文章。1990年武汉机场择址新建,邓小平亲笔题名“武汉机场”,这在国内机场是独一份的荣耀,也倾注了邓小平对武汉发挥交通区位优势の深情厚望。武汉地处华夏之“中”,坐拥“天元”之位,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在改革开放初期,不沿边、不靠海,反而失去了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先发优势。但在新发展格局下,武汉是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空中丝绸之路交汇点,只要牢牢把握这个机遇,深度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把支点建强、把枢纽做实,就一定能加速迈向新时代“九州通衢”,从由沿海开放的“后队”迈向新时代内陆开放的“前队”。

扎实做好“绿”的文章。邓小平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还是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倡导者。他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③的发展要求,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绿色运动”。在经过40多年的发展后,生态资源已经成为当今最为稀缺的资源,生态赤字已经成为最大约束。现在,不管黑猫、白猫,促进“绿色发展”才是好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武汉应坚定不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以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为统领,以流域综合治理为基础,加快凸显大江大湖湿地城市特色;同时,抢抓“中碳登”落户机遇,打造有全球影响力碳市场,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74页。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79页。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1页。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全面优化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用地“四大结构”,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

扎实做好“改”的文章。改革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他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①。这些充满激情的谈话,至今看来都十分有益。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就是鼓励和培育人的创造性的生产力,需要人的创造力像雨后春笋一般从底下“冒”出来,冲破阻拦发展的桎梏。这与武汉城市精神高度契合,历史上武汉从来就不缺乏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要把城市精神内核转化为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驱动,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破除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有效激发,打造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示范区。

“知重负重”,是英雄的精神品格。知重愈明,则负重愈笃。邓小平在武汉关于发展的思考探索,让我们对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知其所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提供了科学指引,明其所往。武汉积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把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驱动,重塑新时代武汉之“重”。

作者简介:

熊俊潇,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二处四级主任科员。

(责任编辑:周阳)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2页。

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

实践动因、困囿及进路

——K 媒体田野调查带来的启示

杨轲

摘要:地方主流媒体在建设性舆论监督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基于 K 媒体田野调查,进行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关注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实践。研究发现,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凝聚多元主体,动员共同行动;监督范围拓宽,内容泛化延展;将跨媒介叙事嵌入传播之中;涉及对象多元,同构行动者网络;破除“流量至上”宰制,“帮忙不添乱”。内外部因素合力驱动的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面临现实困囿。未来,地方主流媒体应增强建设性舆论监督“在地性”,重塑公共服务价值;提升建设性舆论监督科学性、专业性、可读性;布局“人工智能+建设性舆论监督”新赛道。

关键词: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田野调查

一、研究缘起

1950 年 8 月 30 日,《人民日报》刊登《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一文,文章指出“必要时并组织读者集体力量,实行群众舆论监督,以达到批评的目的”^①。“舆论监督”概念首次出现。1987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舆论监督”一词。

在新闻传播实践中,负面事件更容易吸引流量,美国凯伦·麦金泰尔通过实验证明了这一点。部分媒体追求“流量至上”,为监督而监督,不仅未解决问题,反而带来诸多风险。

数字时代,舆论监督发生变迁,建设性舆论监督成为主流媒体新闻传播实践的现实取径。省(直辖市)、地级市、区县主办的主流媒体众多,是建设性舆论监督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前,建设性舆论监督以业界实践为主,学术研究较少。基于 K 媒体田野调查,本文对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实践进行考察。

^① 《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人民日报》1950 年 8 月 30 日第 5 版。

二、文献综述

(一)“多取其建设性”:从舆论监督到建设性舆论监督

经典传播学理论指出“监督是大众媒介的第一个功能”^①。“舆论监督”是公众通过舆论这种集合性意见形态,对各种权力组织和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自由表达看法所产生的客观效果。^② 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思想最重要、最核心理念和要素是“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③ 中国共产党舆论监督观内涵倡导积极、建设性舆论监督。^④

数字时代,舆论监督产生新变化。李沁等学者调研18家主流及市场化媒体,研究发现网络舆论监督成为舆论监督新形态,舆论监督运行机制及组织形态日益适应新媒体传播环境。^⑤ 第33届中国新闻奖评选文件将舆论监督报道描述为,“揭示社会存在问题、维护公平正义、促进时代进步的新闻作品。应事实准确充分,报道客观全面,富有建设性,切实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

“建设性舆论监督”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发展历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中均有其理论逻辑。我国“以正面宣传为主”指导方针以及“舆论监督”的新闻宣传思想工作路线,都能够凸显中国特色“建设性新闻”实践特点。^⑥ 中国语境之中,舆论监督、批评式报道大多基于建设性目的,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配合正面宣传。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由我国社会体制和媒介体制决定,应努力避免“扒粪揭丑式”监督取向,多取其建设性。建设性舆论监督既有利于培养记者的社会责任意识,也有助于释放媒体功能。^⑦ 学界从多个角度研究舆论监督的历史脉络、现实演化,并且辨析舆论监督与建设性舆论监督之间的关系。

(二)作为本土概念:建设性舆论监督区别于建设性新闻

西方新闻界注重负面新闻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建设性新闻是对这一现象的反思和回应,试图超越问题揭示,更加注重贡献解决方案。2008年,海格拉普在一篇新闻评论中提及“建设性新闻”。戈尔登斯泰德聚焦正能量等心理机制。研究表明,当信息带来积极情绪并减少负面情绪时,它将有助于增添福祉。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学概念,舆论监督统一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之中。“建设性”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对新闻批评、舆论监督等议题的思考与总结。坚持党和人民的立场是新闻工作者的思想纲领,树立“参与者”新闻职业观继而发挥主观能动性是新闻工作者的行动指南,三者是新闻工作

① 李延枫:《舆论监督:概念辨析与重新认识》,《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4期。

② 陈力丹:《我国舆论监督的理论与建构》,《新闻界》2004年第4期。

③ 沈正赋:《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思想的核心理念》,《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1期。

④ 丁柏铨:《中国共产党的舆论监督观:发展轨迹、基本内涵和未来走向——基于对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⑤ 李沁、刘入豪、塔娜:《中国主流媒体网络舆论监督的观念嬗变与机制重构》,《当代传播》2021年第6期。

⑥ 沈正赋、韦茜:《中国特色建设性新闻与舆论监督报道的关系建构》,《中国出版》2022年第18期。

⑦ 姜德铎:《论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学术交流》2015年第1期。

者参与社会治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层面,第32届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报道”获奖作品促进多方参与、聚焦社会治理,体现出建设性舆论监督的特征及趋势。^②

基于文献综述和田野调查,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1)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基本特征是什么?(2)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的产生动因、现实困囿及未来进路。

三、研究方法

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较为复杂,难以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全面考察。本文选取田野调查法,在“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实践中进行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

(一)选择研究现场

田野调查地点为A省省级新闻网站——K媒体。该网站成立于1999年,现已建成一报一网两微N号的全媒体传播矩阵,粉丝覆盖量超5000万,位列优秀地方融媒综合影响力网络媒体TOP10。K媒体坚持建设性舆论监督,将立足点放在揭示问题、解决问题上。在建设性舆论监督方面,K媒体并不尽然涵盖其他地区主流媒体实际情形。但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体制统一,各地主流媒体新闻传播实践虽有差异,但总体上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K媒体具有一定代表性。综上,K媒体适合作为田野调查研究现场。

(二)进入田野

K媒体办公地点设有门禁,仅限工作人员进入。研究者通过K媒体面向社会的公开招聘进入该单位。研究者角色为完全参与者,以新闻工作者身份完全参与到“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实践”中,研究者身份不为他人所了解,是一个隐蔽观察者。

(三)研究对象

本文以K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涉及的多个主体为研究对象,兼顾对K媒体整个组织的考察,这源于以下理由:首先,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涉及多方;其次,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并非个体行为,而是表现出整体性,是一种组织行为。

本文将受访者分为新闻工作者、网民、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此外,研究对象选取还考虑到年龄、性别、从业经验等异质因素,最终选取并访谈20位受访者(见表1),访谈过程并未透露研究目的。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所有受访者信息均已匿名。

① 余跃洪、芮必峰:《建设性新闻与建设性舆论监督——三论“建设性新闻”与我国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与发展》,《新闻春秋》2023年第2期。

② 张凌微:《建设性舆论监督: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向——以第32届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报道”获奖作品为例》,《中国广播》2022年第6期。

表1 受访者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段/岁	职位
新闻工作者				
1	A	男	20~30	短视频运营
2	B	女	50~60	记者
3	C	女	30~40	编辑
4	D	女	30~40	记者
5	E	女	20~30	记者
6	F	女	20~30	编辑
网民				
7	G	男	40~50	网民
8	H	女	40~50	网民
9	I	女	20~30	网民
10	J	女	20~30	网民
11	K	女	30~40	网民
12	L	男	30~40	网民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13	M	女	20~30	科员
14	N	女	40~50	副局长
15	O	男	40~50	镇长
16	P	男	40~50	副局长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17	Q	男	20~30	职员
18	R	女	20~30	经理
19	S	男	20~30	职员
20	T	男	30~40	经理

(四)收集数据

20位受访者中女性12人,男性8人。在建立互信关系后,对其中6人进行多次访谈,对其余14人进行1次访谈。访谈形式包含面对面沟通、电话沟通,访谈内容以日常聊天切入,将结构性问题打散在对话中,问题主要包含:K媒体媒介使用情况。建设性舆论监督具体报道所涉及事件或问题的来龙去脉。舆论监督、建设性舆论监督的认知与实践。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实践机理、特征、动因、困境及优化路径等。在面对受访者回答出现持续回避或跑题情况时,采取重复提问等方式纠偏。

田野调查时间为2020年7月至2022年8月,持续25个月,通过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获得经验资料,记录方式包含田野笔记、录音、照片及视频。

四、研究结果

(一)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基本特征

1. 本体特征:建设性融入舆论监督底层逻辑

(1)凝聚多元主体,动员共同行动

K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部门是网络问政平台,该平台联动省市县乡四级7000多家党政部门和单位,累计回复网民诉求47.8万余件,还利于民资金总额超12亿元,入选中国报业深度融合发展创新案例。2022年,K媒体与另一家媒体进行深度融合,在部门设置上融为一体,共同推出新闻客户端。K媒体网络问政平台建设性舆论监督力量得以壮大。此外,短视频等部门也进行建设性舆论监督,聚焦异地监督,转载与建设性舆论监督相关的社会热点新闻。

(2)监督范围拓宽,内容泛化延展

K媒体网络问政平台设置固定栏目定期推出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不仅揭示问题,更注重解决问题。记者D报道一县医院结果领取处窗口低矮,给他人造成不便。当地卫生健康局责成该院立即整改,通知医疗卫生组织机构对此开展排查整改。综合分析对多位记者的访谈结果,建设性舆论监督范围比舆论监督范围更广,聚焦社会公共事务,揭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随着监督范围拓宽,记者突破传统采编手段,创新运用社交媒体互动、在线社会调查等新手段获取广泛且深入的信息,并将其呈现在建设性舆论监督新闻文本之中,原有舆论监督的内容边界得以延展。

(3)跨媒介叙事赋能建设性舆论监督

不同于舆论监督较为倚重报纸、广播、电视等单一媒介,建设性舆论监督将跨媒介叙事嵌入自身传播渠道之中。数字时代,传播媒介具有不同特性,各自吸引着异质的受众群体。K媒体基于此,为报、网、端、微、屏打造差异化的建设性舆论监督传播形态。记者D称:“网络问政平台是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核心和关键。平台运用新模式、新机制、新技术,打通全媒体渠道,广泛地联结群众,畅通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渠道。”短视频运营A说:“网友反映一职业技工学校老师辱骂学生,甚至拿学生毕业证相威胁。记者经过调查核实后制作发布短视频,视频发布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抖音平台浏览量199.2万、4.5万点赞量、1万评论量、3.1万分享量,被澎湃、封面新闻、观察者网、后浪视频、中国商报等多家媒体转载。随后,该校发表声明澄清事实,辞退涉事老师,对相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

地方主流媒体以丰富的形式呈现问题和解决方案,提高报道吸引力和影响力。K媒体改变以往舆论监督量多面广、不痛不痒,看着很热闹、实际没分量的做法,以“时度效”为要求,在“建设性”上下功夫,创新舆论监督表现形式。

部分信息及新闻线索不宜公开。对此,K媒体建立舆情监测、分析、判断、预警、回应机制,了解群众所思所愿,定期分析研究网民留言,及时发现和掌握带有公共性、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通过日报内参、理政专报、舆情报告等报送给各级领导,推动问题切实解决。

(4)涉及对象多元,同构行动者网络

建设性舆论监督涉及多元主体,这些主体具有能动性,共同构成行动者网络。K媒体等地方主流媒体跨界协作,与社会组织、学术界、专业机构等合作,借助外部力量增强建设性舆论监督专业性。K媒体在建

设性舆论监督过程中并未局限记者这一方,而是协调事件或问题涉及的各方主体,寻求解决之道,将建设性舆论监督做深做实。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访者对舆论监督及建设性舆论监督中的行动者认知不一。田野调查中,研究者经常参与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采、写、编、发。实际情形是,建设性舆论监督对象及传播对象更加多元:建设性舆论监督以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为监督对象;对企业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涉及劳动者权益维护等议题;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机构也在建设性舆论监督视域之内。

(5)破除“流量至上”宰制,“帮忙不添乱”

建设性舆论监督不追求“流量至上”,而是在协调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中解决实际问题。记者 E 表示:“2020 年 8 月 18 日,‘一农村养殖场逃出数百条眼镜蛇’的消息在社交媒体平台‘刷屏’。我和同事迅速奔赴现场进行直播,及时联系相关部门调查核实,回应网民关切,全网实时直播浏览量超 1000 万人次,通过建设性舆论监督解决问题。”

建设性舆论监督已形成“曝光—回应—解决”良性循环。网民 G 表示:“反映问题之前本来不抱希望。但是仅用 3 天,我们村五保户老人便被安排住进养老院。”网民 K 表示:“小区不动产证迟迟不能办理,求助之后,‘难产’5 年的不动产证终于办下来了!”群众反映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被建设性舆论监督推动解决。

做到“帮忙不添乱”。K 媒体舆论监督报道不能停留在问题表面,而是由表及里,解释问题原因,提出解决方案。当然,不是所有问题都会被解决,针对这种情况,K 媒体网络问政采取长期关注的做法,积极推动问题解决,做到“帮忙不添乱”。

2. 对比特征:从舆论监督概念衍生、发展而来

建设性舆论监督属于新闻舆论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属于舆论监督。“建设性舆论监督”这一概念从“舆论监督”衍生、发展而来。依据多位记者、编辑访谈内容,舆论监督和建设性舆论监督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表 2 所示):

表 2 舆论监督与建设性舆论监督对比

对比项	舆论监督	建设性舆论监督
协调主体	公民	主流媒体
监督对象	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	各个主体
监督内容	违法违纪等权力滥用行为和失德言行	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社会各方事务中出现的违法违纪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现象
实践逻辑	批评、建议、揭露	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
情感倾向	负面性,甚至破坏性	积极性、建设性
形式及语言	严谨、深刻	灵活多变

协调主体产生变迁。舆论监督主体以公民为主;建设性舆论监督由主流媒体主导,发挥媒体功能,协调各方广泛参与。

实践逻辑存在差异。舆论监督意在揭露问题、曝光不当行为。记者 B 认为,“建设性舆论监督强调为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并促进问题实际解决”。

报道议题范围不同。建设性舆论监督对象更广,倾向于关注纷繁复杂、关涉大众的社会问题。记者 E

说:“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和舆论监督、民生新闻等有所区别,前者关注的社会问题更加宏观,不局限于生活琐事。”

情感价值取向不一。舆论监督报道和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的前提是遵循新闻专业主义原则,表现出“理性、中立、客观”的形式与内核,但是记者编辑并不会完全不掺杂情感及价值取向。相较而言,舆论监督负面性更鲜明,甚至带有破坏力;建设性舆论监督倡导积极地解决问题,强调稳中求进。

形式及语言有区别。舆论监督主要通过传统媒体报道和评论实现,如报纸、电视、广播等;新闻语言以书面语为主,整体风格严谨、深刻,用语考究。建设性舆论监督以跨媒介叙事为主;新闻语言融入口语、网络用语,富有创新,语言贴合受众。

(二)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动因、困囿及进路

1. 内外部因素合力驱动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

(1) 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外部因素

数字时代信息不对称“陷阱”仍然存在。信息分散、可变、多样,分布不均衡。地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如果未获得监督与曝光,百姓将难以获取相关信息,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建设性舆论监督接近、调查事实真相,对事实进行监督、分析和呈现,将之公之于众,提升信息清晰度与透明度。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反映的社会问题呈现在社会面前,使得多元主体“可见”相关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地方社会忌惮舆论监督的威力。作为一种在地化调试,建设性舆论监督较好实现舆论监督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T表示:“2021年初,我公司所经营的饲料等生产物资运输困难,种畜、雏禽、鸡蛋、肉鸡等运不出去。随后,K媒体工作人员联系我了解情况。”记者E表示:“我们分别采访反映人、社区街道办、酒店、专业人士等多个主体,得知确实存在养殖场原料物资断供、活禽等运输通道不畅等情况,提出建立有效沟通协调机制、简化民生保障企业通行证办理流程等建议,保证疫情防控和生产生活‘两不误’。”

群众权利意识提升,持续关注媒体曝光的社会问题。地方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关注度增加,百姓希望了解问题本质、解决方案,并且参与社会治理。网民L说:“当代社会,大家获取信息的手段和渠道很多,门槛降低,比之前更加关注公共事务,而且可以便捷、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

(2) 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内部因素

建设性舆论监督能够平衡媒体采编与经营、上级管理与媒体发展之间的张力。K媒体是“事业性质、企业化运营”,既需要做好采编,也得搞好经营。K媒体注重建设性舆论监督实践,将其与正面宣传相统一。

作为一种稳妥的提升媒体影响力的策略,建设性舆论监督在规避舆论监督破坏性带来的监管压力的同时,还能在同行竞争中脱颖而出。K媒体提供有深度、专业的建设性舆论监督,有利于建立媒体公信力和专业形象,引起公众关注和讨论,提升媒体知名度,为媒体经营业务提供前提条件。

2. 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面临现实困囿

(1) 部分建设性舆论监督沦为相互博弈、相互妥协的产物

地方建设性舆论监督对利益相关方具有挑战性,这些主体会施加压力。多位受访者表示,“建设性舆

论监督虽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但是部分报道在各个环节均面临被‘毙掉’的风险,还有一些报道即便已发布,仍被撤稿”。在建设性舆论监督中,多个主体相互博弈:①媒体作为建设性舆论监督主要实施者,追求知名度和竞争力,以获取更多流量和经营收入。然而,媒体会面临来自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压力,影响建设性舆论监督客观性、公正性。②政府、企事业单位通常是建设性舆论监督对象。它们会试图通过控制媒体或施加压力来减少负面舆论造成的影响。③公众对媒体信任度、支持度直接影响建设性舆论监督效果。④经济利益相关方包括广告主、投资者等。这一主体试图通过广告投放或其他方式影响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⑤非政府组织也会与媒体合作,通过建设性舆论监督传播信息、推动社会议程。不同主体基于利益和权力相互博弈,影响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最终形态。对此,媒体需要在多方利益博弈中审慎思考,进行沟通、协调,制定策略达到最优解。

(2) 建设性舆论监督有“先入为主”之嫌,侵蚀新闻专业主义原则

地方主流媒体部分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存在扭曲负面事件的现象;不能切中要害、对症下药,解决方案难以满足个性化、多元化要求;异地建设性舆论监督受制约;人才流失严重且青黄不接;地方主流媒体自身资源限制建设性舆论监督“更上一层楼”。

(3) 置于众声喧哗之中的建设性舆论监督存在舆论失控隐忧

事实存在多个叙事版本,意见纷繁复杂,置于众声喧哗之中的建设性舆论监督同样面临舆论失控风险。公众对建设性舆论监督报道各执一词,舆论主体脉络显现多极化趋势,逐渐偏离事实真相及核心议题,建设性舆论监督反映的社会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3. 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未来进路

(1) 增强建设性舆论监督“在地性”,重塑公共服务价值

在媒体融合过程中,地方新闻网站等主流媒体模仿平台公司“跨界接合”“再造平台”,将电商、社交、短视频等功能及技术可供性集于一身。然而,在此过程中,部分主流媒体特有的正面宣传、舆论监督、网络问政等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也没有区分人民、群众、用户、粉丝等概念之间的区别。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在地性”是使媒体自身融入报道对象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为公共服务作出贡献。其一,地方主流媒体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地域文化,信息灵、反应快、接地气。其二,专业性强。与自媒体相比,有记者、编辑、把关人等专业人员。其三,公信力强。从业人员长期接受媒介伦理与法规教育,有严格管理制度、专业记者团队、强有力社会资源作保障,具有权威性和严谨性。

(2) 提升建设性舆论监督科学性、专业性、可读性

深入调查是提高建设性舆论监督专业性和深度的重要手段。建设性舆论监督应揭示事件全貌,透过现象看本质,提供准确、全面、深刻的事实及意见;采集各方声音,丰富信息来源,包括专家学者、社会组织代表、受影响群体等;多维分析和评估问题,确保报道客观性和权威性;优化记者、编辑专业技能及素养,提升舆论分析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全媒体表达与传播能力。

(3) 布局“人工智能+建设性舆论监督”新赛道

人工智能可用于舆情监测和分析,发现潜在新闻线索,提供准确、全面信息;大数据分析能帮助媒体了解读者兴趣;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创造沉浸式、互动的报道形式。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等4家省级文化企业共同成立传播大脑科技公司,构建浙江省一体化全媒体传播投放引擎和智能中台,实现媒体和文化业务的跨界融合。《纽约时报》依托 Jigsaw 开发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推出人工智能评论审核

功能,Jigsaw 将获得的匿名评论数据作为回报。2024 年普利策新闻奖 45 名入围者中,有 5 人在其作品中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流行,普利策委员会在 2023 年初开始讨论人工智能政策,并未考虑限制使用人工智能,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妨碍新闻编辑室运用创新技术。

五、结语

建设性舆论监督是舆论监督的组成部分,其以中国新闻传播业界实践为主,鲜有实证研究。研究运用田野调查,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考察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实践。研究发现,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凝聚多元主体,动员共同行动;监督范围拓宽,内容泛化延展;把跨媒介叙事赋能嵌入传播渠道;涉及对象多元,同构行动者网络;破除“流量至上”宰制,“帮忙不添乱”。这一概念产生于舆论监督,但两者在协调主体、实践逻辑、议题范围、情感倾向、形式及语言方面均有差异。内外部因素合力驱动的地方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面临侵蚀新闻专业主义原则、相互博弈妥协的产物、舆论失控风险等现实困囿。地方主流媒体应增强建设性舆论监督“在地性”,重塑公共服务价值;提升建设性舆论监督科学性、专业性、可读性;布局“人工智能+建设性舆论监督”新赛道。

研究建设性舆论监督兼具实践与理论价值。就实践而言,建设性舆论监督不仅能够及时发声、客观呈现、理性引导,还能激浊扬清、荡涤积弊、解决问题。建设性舆论监督发展的关键在于突破媒介中心主义,与其他监督形成合力,在与其他监督的贯通融合中推动新闻传播事业作为一种积极力量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与发展。就理论而言,建设性舆论监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和理论中有其实践脉络和理论逻辑。作为本土概念,深入考察建设性舆论监督,推动其与舆论学、建设性新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等中外新闻传播理论形成有效对话,这对于发展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意义。

作者简介:

杨轲,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闻实务、新闻史。

(责任校编:林丽)